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ext Scan Input Form - Title Page

<b>Work:</b>	W1PD88989	<b>ImageGroup:</b>	I2PD18757
<b>LCCN:</b>	n/a	<b>ISBN:</b>	n/a

<b>Title:</b>	དཀར་མཛོེས་ཁུལ་རིག་གནས་ལོ་རྒྱུས་ཀྱི་དབྱེད་ཡིག་ <sup>( 15 )</sup> dkar mdzes khul rig gnas lo rgyus kyi dpyad yig (15)
<b>Author:</b>	n/a
<b>Descriptor:</b>	written in chinese
<b>Original Publication:</b>	dkar mdzes khul rig gnas lo rgyus kyi dpyad yig;deb bco lnga pa/ dl 15 ji
<b>Place:</b>	dar mdo/
<b>Publisher:</b>	srid gros dkar mdzes bod rigs rang skyong khul u yon lhan khang
<b>Date:</b>	1997
<b>Volume:</b>	1
<b>Total Volumes:</b>	1
<b>TBRC Pages:</b>	2
<b>Introductory Pages:</b>	n/a
<b>Text Pages:</b>	n/a
<b>Scanning Information:</b>	Scanned at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Chengdu, China.



ཁོ་རྒྱལ་གྱི་ལོ་རྒྱུས་ལྟར་ལྷན་སྒྲིལ་བྱས་པའི་ཡི་གེ།

# 甘肅州文史資料

དེ་བུ་བཅུ་ལྔ་པའི་དུས་ཀྱི་

第十五輯

ཨ་ཁོ་རྒྱལ་གྱི་ལོ་རྒྱུས་ལྟར་ལྷན་སྒྲིལ་བྱས་པའི་ཡི་གེ།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自治州委員會 編



# 甘孜州文史资料

##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主任：卢凤鸣

编委：洛桑桃格

汤青宏

邓俊康

责任编辑：李昆璧

责任校对：

## 目 录

吴忠将军在甘孜..... 邓昌银(1)

踏遍青山人未老

——甘孜州高原丘原云、冷杉更新技术研究推广情况记实

..... 刘建邦(41)

回忆叔父罗洪则拉二三事 ..... 罗洪拉姆(60)

甘孜县粮食生产概况 ..... 邓昌银(63)

忆炉霍大地震 ..... 王宜之(99)

甘孜地区森林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 刘建邦(102)

人物春秋

——降央伯姆 夏克刀登 刘家驹 格桑泽仁传略

..... 邓俊康 李昆璧(123)

旧西康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三青团..... 高秉鑫(146)



# 吴忠将军在甘孜

邓昌银

## 一、戎马倥偬 17 年

吴忠，原名吴光珠，字宝山。1919 年 10 月 21 日出生于四川省南江县第九区（木门镇）小龙坎文家沟吴家村（解放后划归苍溪县）。1933 年 3 月，年仅 14 岁的吴忠，响应中共川陕省委的号召，在家乡木门镇参加了中国共农红军。先在新兵团十一师三十三团，后改编入红四方面军三十九军九十师二六八团。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1 月，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剿”前夕任班长，不久升任排长。1934 年夏，参加了万源保卫战。1935 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 3 月，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嘉陵江战役，并随军长征。1936 年进入甘孜县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进，在利到达陕北。

吴忠长征在甘孜期间，是红军大学随军政治队学员。红军在甘孜休整建立康区红色政权的日子里，吴忠有机会接触了当地群众，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为吴忠将军十四年后重返甘孜，建立进军西藏的前哨基地，参加指挥著名的昌都战役奠定了基础。他在《打开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的一战——昌都战役》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的亲身感受：“我是重来旧地，14 年前，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成员，就曾大体沿着这次的行军路线到过甘孜，并住了三、四个月之久，往事历历，有些还是 14 年前的样子，看后倍感亲切。”吴忠

将军作为昌都战役一位著名指挥员，在甘孜胜利完成后方基地的建设和准备工作，积极参与前线指挥，取得昌都战役的辉煌胜利，是和吴忠长征时期在甘孜的革命实践分不开的。

1937年初，吴忠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调前方云阳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先后任排长、副连长。不久又调到绥东游击大队任大队长，经常深入敌后，牵制和打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主力部队作战。1939年冬，吴忠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大队任中队长。1940年7月，随队参加了对顽军石友三部的第二次反击作战。之后，又调任该师三旅八团，先后任副营长、营长，参加了反击日伪军“大扫荡”的斗争。1942年“9·27”，日伪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大扫荡之后，吴忠任昆张游击支队支队长。他率游击支队连续取得赵坝村、四柳树村、陈庄、李官屯四次战斗胜利之后，又在东平、汶上、梁山地区生俘伪军政人员四、五百人，从而打开了昆张地区的局面。1945年5月，吴忠调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第五团先后任副团长、团长，参加了阳谷战役和冀鲁豫三路大军对日伪军展开的反攻作战。

抗战胜利后，吴忠任第七纵队二十五旅五十八团团长。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8月中旬，二十五旅五十八团在三纵一部配合下，奉命对吕庄之敌发起攻击，全歼敌一八一师师部及五四三团，为开辟豫东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在刘、邓指挥下，参加了巨野战役，于10月5日至6日在章缝集打了一场恶仗。在激烈的战斗中，一颗流弹打中了吴忠颈部，顿时血流入注，昏迷过去，醒来后仍坚持指挥战斗，连续击退敌人多次反扑，牢牢守住了我军突入部队所占领的阵地。我军纵队主力向章缝集

发起总攻时，吴忠等立即率配合对敌内外夹攻，全歼敌十一师三十二团 3000 多人。1947 年 3 月中旬，第一纵队奉命合并成立新一纵队，吴忠被任命为二十旅副旅长，迅即投入鲁南战役，并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9 月，吴忠受任中原野战军二十旅旅长。1948 年冬淮海战役期间，吴忠旅奉命在豫皖苏军区等部配合下，胜利完成阻击黄维兵团，确保我军全歼徐州守敌的任务后，随即参加了纵队合围，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连克王庙台、杨庵、小马庄等地。尤其是攻击小马庄的战斗中，吴忠率领的五十九团始终担负主攻，为配合中原野战军速歼黄维兵团于双堆集地区做出了积极贡献。1949 年 2 月，二野奉命组成第五兵团，吴忠被任命为该兵团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协同华东野战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及攻占上海等战役。之后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贵阳、成都等战役。

## 二、请缨进藏做先锋

1949 年底，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大的战役已经结束。十八军奉命进驻川南地区，吴忠师长率五十二师受命驻扎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驻防地区的条件是全兵团最好的，一些人认为十八军过去大仗打得多，吃苦多，这次驻防是野战军首长的照顾，心里非常高兴。1950 年新年刚过，大家兴高彩烈，一路欢歌笑语，人人脚下生风，一天三、四十公里的行程。1 月 7 日，全师进抵犍为县境，再有三、四天就可以到达宜宾了。不料当晚突然收到军部转来野战军首长一份急电，命令部队立即停止前进，

两日后北返乐山集结,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情况来得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议论纷纷,种种揣测在部队中流传。更多的想法还是认为,全国已经解放,无大仗硬仗可打,到哪里都一样。虽然也有猜想,可能会接受新的任务,一定是西进解放西藏。更多的人还是认为,十八军南北转战,跑遍大半个中国,劳苦功高,理应休养生息,现在不会安排新的任务。

1950年1月2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式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5月开始行动,10月之前解放全西藏。1月7日,西南局和二野领导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并拟定了以十八军为主,以张国华军长为统一领导核心,筹划进军和治理西藏。1月10日,党中央转来毛主席自莫斯科(1949年12月中旬,毛主席去苏联访问)来电,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7日报告。1月15日,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接见十八军军、师两级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决策和有关指示,然后深刻地论述了解放西藏的重大意义,宣布了西南局和野战军为实现这一任务所作的计划、决定,勉励十八军的同志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在军内反映十分强烈。问题比较多的还是军内干部,部队从建立革命武装到万里长征,8年艰苦抗战,3年解放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年征战劳苦,很多人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都没能解决,都希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或成家立业,或与家人团聚,过上舒适太平的日子,厌战情绪非常浓厚。一些个人问题较少的青年干部,则对执行新的任务无所谓,他们觉得西藏是个鲜为人知、富于神奇色彩的地方,革命军人骑马持枪走天下,到

那里见一见世面也是好事。但无论哪一种人,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进军西藏虽然没有大仗硬仗可打,但地域广阔,人口分散,高寒缺氧,后方补给困难,是件苦差事。吴忠师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师领导班子成员对进藏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有个人问题和个人想法。但是,作为领导干部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同统一祖国的大业相比,一切个人利害得失,都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全师一万多双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必须给全师官兵做出好的样子。”这时候的吴忠师长,思想斗争同样是十分激烈的。但是,十多年的戎马生涯,造就了他一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高尚革命情操。

1950年1月底至2月5日,吴忠师长用了几天时间,组织召开了全师各级干部会议,全力投入做好部队干部思想转弯子工作。广大干部毕竟长期受党的教育,有良好的思想基础,经过几天思想工作,多数人的情绪明显好转,许多人都表示,牢骚归牢骚,行动是行动,参加革命多年,千山万水,千难万险都闯过来了,难道今天走到四川就不跟党走了,革命荣誉都不要了。谁叫我们是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呢?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境界不够高,但讲得很实在,增进了彼此情谊,增强了吴忠师长对全师干部的信任,坚定了赴藏作战的决心。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师上下的思想认识,2月5日至10日,全师在师部驻地竹根滩召开了排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张国华军长到会作了长篇讲话。张军长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公与私、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鼓励大家肩负起革命军人的光荣使命,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此后,全师又集中一段时间,由上而下逐级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

思想认识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在此基础上，部队迅即抓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上级为五十二师充实了兵员，全师达到 1.16 万多人，还更新补充了装备，。接着，又组织了全师投入以适应高原为主的军事训练，只等一声令下，立即挥戈前进。

1950 年 2 月底，吴忠师长代表全师指战员向十八军首长表示决心，请缨先行。3 月 4 日，军首长发来一份代电令，命令指出，由于川西土匪猖獗，征粮、修路受阻，严重影响进藏的准备工作。为保证部队如期完成进藏任务，除军主力于川西加紧剿匪、修路和配合地方党委开展工作外，决定由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分别组成先遣支队，各由一名师领导干部率领，争取 4 月中旬分别进至甘孜、巴安（今巴塘县）地区，建立进军西藏的南线和北线基地。先遣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藏区的政治军事情况和兵要地志，民情风俗，为上级机关进军西藏制订政策提供依据，了解进军沿线地区粮秣供应能力，采购、储备部份粮食、柴草、牦牛，吸收并训练一批藏族青年，向藏族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修筑道路桥梁，制造渡过金沙江需用的船只。命令还决定将十八军工兵营配属五十二师先遣支队，指定五十二师先遣支队由吴忠师长率领，待命出发。

3 月 29 日，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从师部驻地夹江县出发。从夹江取捷径经洪雅至雅安不过 100 公里，但由于不通公路，不得不绕道新津、邛崃、名山，整整用了三天时间，于 4 月 1 日抵雅安。在雅安与天宝同志率领的进藏工作队会合。天宝同志是西康藏族人，1935 年红军长征途经西康，他参军北上，解放战争时期在内蒙工作。西南局决定吴忠和天宝二同志分别担任先遣支队临时党委正

副书记。天宝同志熟悉西康情况，临时党委组建后，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朝夕相处，天宝同志对部队进入西康藏区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吴忠师长经常向他请教有关藏族历史、文化、政治、民情、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成为吴忠师长的好顾问。

先遣支队在雅安又进行了物资补充，并接收了一批由兄弟部队调来的骡马。4月4日，部队成多梯队陆续离开雅安西进。雅安以西因受地形、道路、宿营和供给等条件的限制，大部队行军极为困难。部队行军除武器装备外，还有御寒装备，另外考虑到沿途补给困难，要尽量多带口粮，个人负重一般在40公斤左右，差不多等于过去在内地行军负荷的两倍。高原空气稀薄，气候恶劣，行军难度比内地更大。在攀越近3000米的二郎山时，许多人已感到相当吃力。几天之后，当部队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时，强烈的高山反应开始向部队袭来。许多人感到头痛、恶心、气喘不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两腿发飘。有的人走着走着便不由自主地扑通一声坐在地下，如果不靠其他人搀扶便很难爬起来。路上比较沉闷，谁也不想讲话，没有在内地行军那种人欢马叫的活跃气氛，只能听见一声声粗浊的喘气和指挥员偶尔发出的鼓励催促声。考验不过刚刚开始，部队还将遇到更多预料不到的困难和考验。

### 三、和平解放甘孜县

1949年岁末，成都战役的枪声沉寂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全军覆没，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12月9日通电起义，饬令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和公

共财产，听候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接管。甘孜县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地方上层、宗教界人士，在光明与黑暗的两条道路面前，作出了明智的选择。1950年1月12日，西康省第四督察区驻甘孜行政公署专员范昌元在孔萨大楼，县长贺伯勒在麻书大楼，国民党二十四军驻甘孜营营长杨仁山在关帝庙，国民党甘孜县党部书记在香根庄房分别召开会议，商讨执行起义通电事宜。1月14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布告全县：“值此起义期间，为确保全县社会安定，一律不准寻仇报复和冤家械斗，违者严惩不贷。”1月底，甘孜县旧政权党、政、军和宗教、上层人士派出以土司孔萨益多为代表的欢迎队，去康定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

孔萨益多一行离甘后，甘孜解放已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各种社会势力及其头面人物都为自己的前程去留忧心忡忡。国民党驻甘孜部队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此前，国民党九十一军随从副官张崇智，随九十一军军长黄某曾来甘活动，黄某离甘后，张崇智留甘孜处理黄某安排的善后事宜。因未给二十四军驻甘孜营长杨仁山和行政公署专员范昌元送钱送物，引起杨仁山和范昌元冷眼相待，双方积怨很深。张崇智在甘孜孤立无靠，无钱挥霍，顿思歹念，企图杀死杨仁山以控制军权，求得投靠解放军的政治资本，或聚敛钱财另谋生路。在张崇智主谋下，伙同裁缝李某、国民党甘孜县警察局巡视员彭子祥，策动杨仁山部下排长郑家有、杨营六连中士孙焕章、专署警卫连中士严开福、杨营某排排长李克云，并上士3人，中士4人，士兵4人，约定2月4日晚杀死杨仁山。当晚深夜12时许，向杨仁山寝室投下手榴弹一枚，手榴弹爆炸，但未伤人。事败后，兵变成员大部分逃跑，张崇智、李克云等人被抓获。部分被扣押

在杨营监禁。2月5日下午,主谋张崇智被枪毙,李克云吞鸦片自杀。此为名噪一时的“杨仁山事件。”张崇智等人出于个人恩怨,能策动众多杨营属下士兵参与谋杀杨仁山的行动,究其原因因为杨营士兵受杨仁山盘剥虐待颇深,士兵们长期领不到薪饷,连应发的服装也不给。士兵们生活十分困苦,特别是家有妻室儿女的士兵难以维持生计,士兵们在饥寒交迫中痛苦挣扎,还被杨仁山强迫挖金种地,收获一律归杨仁山私人所有。杨营士兵大部分吸食鸦片,民众讥讽曰:“杨营士兵两杆枪”(一杆烟枪、一杆步枪)。杨妻经营鸦片又从中盘剥士兵,使其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他们得知解放军已抵达康定,不久即将来甘的消息后,想乘机打死范专员和杨营长投向解放军,终被张崇智等人所利用,加上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遂导致彻底失败。此时杨仁山已执行刘文辉通电起义,士兵们在杨仁山宣布起义后受张崇智等人诱骗,必然被范昌元,杨仁山等人抓住把柄,以“兵变”论处。

吴忠师长率领的一五四团先遣支队4500余人于1950年4月4日从雅安出发,给过20多天艰苦行军,于28日到达甘孜。当日下午,部队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3路纵队威武雄壮,英姿昂然地步入甘孜县城,受到甘孜县3000多各族群众热烈欢迎。包括国民党行政专员在内的一些旧军政人员也参加了欢迎仪式。4月的甘孜,仍然寒气袭人,朔风透骨。为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尽量不烦扰群众,吴忠师长率众顶风冒寒,露天住帐篷扎营。只是为了支队部便于开展工作,吴忠师长接受了当地旧政府和接待人员的安排,和天宝同志住在一个头人家里,住宿、办公条件也不过是楼上住人,楼下是牲畜圈,卫生条件很差。部队刚住下,国民党公

署专员范昌元便偕同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前来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汇报了他们执行刘文辉通电起义情况，表示今后愿在新政权领导下，为部队进藏和地方建设尽心尽职，努力工作。

5月12日，在甘孜县中山广场举行了甘孜县和平解放军民庆祝大会，5000多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参加了庆祝活动。当时，甘孜县全县总人口35307人，城区总人口仅3789人，能有如此众多的群众参加庆祝活动，反映了受尽苦难的藏族群众渴望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说明进藏部队在入甘后短短的14天时间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爱戴，表明了部队坚决进军西藏，解放受苦受难的百万藏族同胞的信心和决心，为争取群众、建立巩固的进藏前哨阵地奠定了基础。

## 四、共度难关

五十二师先遣支队既是一支准备进藏作战的部队，又是一支地方工作队，不但要为大部队进藏作物资准备，还要修筑公路、机场，协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任务十分繁重。甘孜县西距金沙江240公里，江西岸的昌都地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西康省所辖，但既无政权组织，也无一兵一卒，实权操在土司、头人和寺庙之中。以东的地区，国民党统治也十分薄弱，属于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所控制，给部队进藏准备工作带来更大困难。基于这种特殊情况，进藏工作必须得到当地上层僧俗人士的合作，并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扎根于群众之中，以取得广大藏族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由

于地广人稀、补给线长，对昌都地区缺乏了解等原因，先遣支队决定由一五四团政委杨军率该团二营进驻位于甘孜县西北、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便于及时了解江西岸情况，为尔后进军西藏准备条件。

部队安营扎寨不到 10 天便面临着供给困难的严峻考验，出发时靠肩背马驮的粮食吃完了。川内后方距甘孜县最近地段的雅安也在 600 公里以上，国民党欺世盗名所修筑的川康公路，宣布建成之日亦即废弃之时。补给主要靠空投，各级领导和部队都对空投寄予很高的希望，但空投效果却不理想。青藏高原素称空中禁区，年青的人民空军飞行员，驾驶着缴获的美制 C—46 运输机，不顾飞机陈旧，飞行性能差，又缺乏高原飞行经验的严重困难，冲破高原天险，胜利地进行了空投。但由于飞机载重量小，数量有限，又受高原气候和通讯保证等条件的限制。部队到达甘孜的 20 天中，只有 6 架次空投成功，共投下大米 2.3 万斤，不足 4500 人及 1400 匹骡马两天的需求。为了不加重群众负担，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部队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坚决不向当地群众征粮。为了应急，以 1.56 万块银元，在旧政府和当地头人帮助下，采购了青稞 13 万斤。这笔钱，当时在川内足可以买几十万斤大米。

粮食的缺乏，迫使部队节食。5 月 1 日是部队进驻甘孜的第 4 天，为了节约粮食共度难关，吴忠师长毅然决定，每人每天只发一斤青稞，磨成面便只剩七八两了。吃不饱便组织大家挖野菜，捕捉麻雀和草地老鼠。但喇嘛们便放出风来，说这些小东西是神物。为了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吴忠师长又下令禁止捕捉。大约有一

个月时间，部队都是在这种半饥半饱状态中度过的。部队除坚持训练外，还要抢修公路和机场，干的都是力气活，必然影响部队的情绪。上级原决定在公路修通前派一个空军师为部队空投，每人每天可加半斤肉食，可是现在连青棵也填不饱肚子，使领导干部在部队面前也难于做好思想工作。但是，尽管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部队仍然秩序井然，军心稳定。也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够战胜诸如补给困难等一切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和吴忠师长在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模范形象和崇高威望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吴忠师长曾任这个团的团长，官兵对他非常了解。在1946年的章缝集战斗中，部队曾将吴忠团长（当时为五十八团，后改为一五四团）的英雄事迹编成歌曲，在部队中传唱，称赞他是机智勇敢的指挥者，为他后来带好这支部队不畏艰险转战南北创造了条件。

为了战胜眼前暂时的困难，共度难关。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等主要领导干部除积极做好全体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外，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生活上毫不特殊，保持和发扬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此鼓舞士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5月中旬的一天，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决定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加强部队管理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的宿舍里召开。大家来得很早，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还没有吃早饭。由于粮食极度紧张，吃不饱饭，同志们情绪很不好。有几个营级干部紧绷着脸，见了首长也不敬礼，一屁股坐在地上，背朝着师长一声不吭，态度很冷淡。吴忠师长非常理解同志们，表现得极为宽宏大度，高兴地招呼同志们坐下。人们陆续到齐，吴忠师长和

天宝同志开始吃早饭，警卫员送来一盆开水、一碗炒面、一盘野菜。师长和天宝同志各往自己的搪瓷缸里倒进半缸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再拌点野菜，三下五除二，一顿饭便吃完了。同志们对官兵一致的生活看得十分真切，气氛也不再那么沉闷了。会上，同志们无所顾忌，争先恐后发言，有些话虽然相当尖刻，但讲完后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吴忠师长指出，目前的粮食问题，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但上级机关非常关心我们眼前的困难局面，而且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吃不太饱，这同 1936 年红军在甘孜时，既要筹集粮草，又要同强敌作战的艰难处境相比，我们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吴忠师长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无论在战时或是平时的和平环境中，都要做下级和战士的表率，不管遇到什么险恶和困难局面，都要刚毅沉着，坚定乐观，积极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只要干部队伍不乱，部队就不会乱。会议在和谐宽松的气氛中结束，鼓舞了同志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5 月 28 日，先遣支队在旭日里广场召开了排以上骨干分子大会。会前，吴忠师长要求排以上各单位把历年艰苦征战中获得的锦旗都送到指挥部，开会时全部悬挂在会场。目的在于总结工作，表扬先进，鼓舞士气，克服困难。会上，吴忠师长总结了进入甘孜一月来，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对一月来在进藏准备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予以表彰，严肃地批评了当前部队由于缺粮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认真分析了当前出现一些情绪的主客观原因。着重指出，当前部队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客观上是由于缺粮，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些同志对进军西藏缺乏牢固的思想基础。当前，如果我们只强调后勤供应的解决，而不注意强化斗志，并树立正确的苦乐

观,就不能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吴忠师长指着一面面奖旗,历数它的来历和光荣业绩,耐心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语意深长地要求大家牢记我军宗旨,发扬革命传统,共度当前的难关,随时准备迎接新的考验。通过革命传统教育,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能振作起精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艰苦的进藏准备工作。

## 五、军民鱼水情

部队安营扎寨以后,如何争取群众,发展良好的军民鱼水关系,以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是为进军西藏作好战前准备的又一重要课题。吴忠师长凭借他1936年长征时期在甘孜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及先遣支队抵达甘孜一月以来的实践经验,经过分析总结认为,甘孜是一个特殊的军事天地,行军打仗都不同于内地,不但生活习惯有所差别,语言不通,难于交流和勾通军民关系,而且风俗、信仰较之内地差异很大。过去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天下,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今天在新的特定环境,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固然重要,但更要学习实践、贯彻执行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才能完成进军西藏的光荣使命。吴忠师长联系长征时期自己在甘孜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向同志们指出:“藏族群众质朴、豪放、待人热情,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心存疑虑。虽然15年前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但是那时部队是流动的无后方作战,几万人马的给养要就地解决,对群众确实是一个沉重负担,加之斗争又很残酷,这中间难免因政策界线不清而发生一些问题,这些都给敌人的挑拨离间以可乘之机。”为了做好群众的宣传

工作,使部队扎根于群众的土壤,多次组织指战员学习部队进入康区以后的政策、纪律,要求人人严格遵守。部队不但做到了过了大渡河以后就不住民房,在甘孜安营扎寨以后,也长期住在帐篷里。工兵营帐篷不够用,就在飞机场周围斜坡地带挖土坑住宿,近似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官兵住的猫耳洞。而且还制订了不进寺庙、不乱借群众用具、不征用民工等严格的纪律。当时群众中曾流传着十八军一战士打死了一只乌鸦,因违犯了军纪,受到了极为严厉惩罚的故事。部队处处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不但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军风军纪比起红军长征时期更加严明,很快赢得了新汉人、“金珠玛米”(解放军)好的美称。

为了进一步发展军民鱼水关系,建立巩固的前哨基地,支队部吸收了8名懂藏汉两种语言的当地青年,组成“通司”班,每次下乡开展社会调查都有一至二名翻译,从而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同时吴忠师长还向干部战士提出了人人都要学习藏民族语言,把它作为“生活高原化、军事康藏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提倡学习藏话以后,很快便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新景象。干部战士都主动用刚刚学到的半通不通的藏话,比比划划、指指点点地向群众宣传政策,交流感情。藏胞们虽然似懂非懂,但从他们惊异、兴奋的表情和不时伸出姆指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感到这支军队是可亲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有的藏胞家附近住有部队,开始时不大放心,外出把门锁上,后来,亲自感觉到解放军的确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人民军队,外出不但不锁门,还请战士们帮他们看家。有的藏胞见部队住在帐篷里,一定要把他们请到楼上去住。三连小炮班战士宋茂之在雅砻江中放木排,不慎把借用排长的卡宾枪掉进江里,部队

多次组织人员潜水捞、顺流找，都不见影子。半个月后，藏胞葛洛在下游的河滩发现了它，爱枪如命的葛洛，拿着这支精巧的卡宾枪反复摆弄，爱不释手。人民军队在甘孜的爱民行动感动了他，这位身材魁梧的藏胞满怀激情地把枪送到了指挥部。他说：“枪再好再可爱，也没有解放军好、也没有解放军可爱，解放军对我们太好了，我若不把枪送回来，就没良心了。”吴忠师长亲自接待了他，并把丢枪战士宋茂之找来，让他接过葛洛交还的枪，同葛洛合影留念。飞机空投的物资，经常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难于找回。一次，一位藏胞翻山越岭送来两只空投下来的小铁皮桶，里面装满了银元。象这样送还空投物资的感人事情，竟有数十件之多。

部队从康定到甘孜，行程 380 多公里，一路上不派“乌拉”，不侵扰群众，深得群众拥护，行军路上，有的小喇嘛紧跟不舍，坚决要求参军。在甘孜住下来后，也多次出现当地青年、小喇嘛要求参军的动人情景。许多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找到国民党县政府，要求废除“乌拉”差役。5 月初，国民党二十四军杨仁山营接到西康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开赴大邑接受整编。杨仁山过去一贯欺压百姓，“乌拉”差役十分繁重。5 月 13 日，杨仁山营从甘孜出发，也只得雇请民工，不敢再派“乌拉”。过去凡诉讼之事，群众都找土司喇嘛断案，很少找政府解决。现在，许多群众有了诉讼之事，都直接找部队解决。吴忠师长百忙之中也多次接待了因诉讼来访的群众。例如，兰州天兴隆号甘孜分店店主敏子俊，残酷欺压剥削雇工马只巴和董纯男，二人不堪虐待，找到部队控告店主的恶劣行为。吴忠师长亲自接待，并将此案移交国民党甘孜县警察局处理，并派出民运干事王某监督处理，使敏子俊盘剥雇工之事得到妥善解决。

吴忠师长在教育、鼓励先遣支队指战员为群众多做好事，使部队取信于民，争取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和信任的活动中，注意总结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做到有的放矢，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1950年8月底，正是收割青稞的季节，干部战士纷纷奔向军营附近的乡村，帮助群众收割青稞。一次某班战士帮助一户群众在一块地里收割青稞，走来几个喇嘛，正忙于收割的藏胞急忙放下镰刀，向为首的喇嘛弯腰低头，对方好象根本没有看见，只是指使随行的喇嘛把已经割下捆好的青稞抢走。帮助收割的战士火了，上前一把扯下。可是主人不但不反抗喇嘛的行为，还毕恭毕敬地请喇嘛把青稞拿走，而且对战士流露出一不高兴的神情。事后他们才了解到这里人人信教，他们笃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他们今生受苦是因为前世有罪，要想来世好，今生要修行。喇嘛能够为他们超度来生。吴忠师长通过这件事例要大家引以为戒，要求大家多了解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提高政策观念，不要急躁盲目地去做一些超越群众觉悟的事情，使部队受到了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加深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提高了部队的政策水平。群众也更加热爱部队，使甘孜这块天地成为部队扎根于群众的土壤。部队刚入康不久，寺庙大量收集囤积藏洋，一时间市场上藏洋缺乏，商人也因迫于寺庙压力拒收银元，给部队购物造成很大困难。吴忠师长召集寺庙喇嘛和当地商人召开座谈会，寺庙喇嘛迫于形势表示停止收集囤积藏洋，并且在会上发言：市场上拒用大洋是不对的，不能给解放军为难。从而改变了市场上拒用银元的状况，使部队能将空投的银元在市场上采购所需物资，适当缓解了空投不足的困难。

## 六、厉兵秣马甘孜城

1950年6月，先遣支队进驻甘孜已一月有余，空投的粮食、副食和其他物资逐渐增多，还空投了一些银元。上级也允许驻甘孜、巴塘两个先遣支队就地采购部分粮食和副食品，以补充后勤供给的不足。甘孜的6月盛夏如春，是部队训练备战的大好时机，吴忠师长决定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建立巩固的后方，只等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投入战斗。

经过观察研究，吴忠师长很快发现，甘孜藏族同胞虽然都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空气稀薄，生产方式落后，生活水平很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农奴制度，使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他们却身体结实，剽悍强壮。牧民们在冰天雪地里，一件皮袄裹住身体，倒头便睡也不觉寒冷，除长期以来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外，还与他们的饮食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主要食品是牛羊肉、糌粑和酥油。牛羊肉不但蛋白质含量高强壮身体，而且使人能抗御寒冷，不易饥饿，富于营养。糌粑携带方便，在条件差的野外，烧上一锅茶，就可以调和着吃。在不得已的应急情况下，即使是冷水或江河水，调和糌粑照样充饥。对部队行军打仗非常方便，是因地制宜的后勤保障条件。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作战，密切军民关系，吴忠师长向全体指战员提出了“生活高原化、军事康藏化”的训练要求。

指战员们遵照吴忠师长生活高原化的指示，就地购买了一些牦牛、青稞、酥油等食品，以调整饮食结构。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做起，每人每天吃适量的酥油糌粑，并以此作为适应高原生活的一项

训练任务。大家在师长和各级领导带领下，很快习惯了这种生活，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大家纷纷反映，爬山、劳动都不象过去那样喘气了。为了防止部队在冬季行军打仗发生冻伤，部队又采购了一些羊毛发到连队，要求无论官兵都要学会织羊毛袜子，每人至少准备一双。真正做到人民军队走到哪里哪里安家，“南泥湾精神”在部队发扬光大。

我军战前准备工作尽管困难重重，然而众志成城，在解放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这一坚定信念鼓舞下，全军上下齐心协力，保证了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吴忠师长率领的先遣支队与师主力虽然关山阻隔，但一直与五十二师保持紧密联系。留驻川西眉山地区的师主力，以主要力量投入川西地区的剿匪作战。当年7月，全师在眉山、彭山、蒲江、洪雅、丹棱地区一带共消灭土匪9800余名，彻底扫除了我军进军西藏的障碍，使我军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全力投入了进军西藏的战前准备。7月2日，师部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副师长陈子植同志作了《坚定意志进军康藏高原》的动员报告。部队一片热火朝天，准备工作做得既有声势又扎扎实实。特别是广大官兵，冒着盛夏酷暑进行军事训练，情景极为感人。为了增强高原上负重行军能力，许多战士偷偷地小腿上绑上沙袋，在背包里装进几块砖头，每天不知要流多少汗水。

筑路大军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斗，于8月末修通了雅安至甘孜的公路600公里。先遣支队重点抢修了从甘孜到金沙江边200多公里的公路，使汽车可以通到雀儿山下。西南军区支援进藏司令部和军前线指挥部组织了一部分轻型汽车和胶轮大车，甚至把军、师

领导乘坐的吉普车也组织起来，不通汽车的路段就用骡马、牦牛，采用分段联运的办法，向金沙江边输送了 20 万公斤粮食。早在 6 月间吴忠师长就派出干部到康北牧区的石渠县，经过两个多月工作，共采购牦牛 14400 头。将其中 9300 头编为 5 个运输队，拟在战役发起后取捷径直奔昌都，其余 5100 头分配给各参战部队随军行动。

做好康区藏族上层人士的争取团结工作，是进藏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吴忠师长深刻认识到，康区上层人士不但在本地区有着广泛影响，而且同西藏地区的上层人士也有着密切联系。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于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争取西藏上层人士，帮助与支持我军进军西藏，都具有重要意义。先遣支队进入甘孜地区后，在吴忠师长、天宝等同志领导下，全面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一些有名望的上层人士纷纷向人民军队靠拢。其中，如统治康北 5 县的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都积极为我军筹集了大量粮草。甘孜县麻书土司属下百姓在麻书保正根嘎降泽号召下，凡有余粮，全部卖给解放军，以备进藏军需。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还担任了军管会副主任职务。据 1950 年 11 月初不完全统计，在康定军管会领导下，康定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支援进藏人民解放军的物资有木柴 1500 多万斤，马草 500 多万斤。在公路未修复前，粮食供给困难情况下，帮助进藏人民解放军购买粮食 200 多万斤、牦牛近 2 万头。组织牛骡帮 10 万头，为进藏人民解放军运输军需物资 7 万余驮（每驮约 120 斤），酥油 2 千余斤。

为保证部队渡过金沙江，深入昌都等地摆开战场，吴忠师长命

令一五四团政委杨军，负责组织内地和当地雇请的船工在邓柯造船。仅一个多月时间，便造出可载 25 至 30 人的木船 10 多只。参战部队还准备了一些橡皮舟和牛皮船。与此同时，甘孜县各族群众踊跃支前，投入到声势浩大的支前工作中。早在先遣支队还未进驻甘孜的 2 月 27 日，西康田粮处军事代表杨玉才就电令甘孜县国民党旧军政人员执行刘文辉通电，起义后“征集粮草，务必把支前工作放在头等重要地位，努力完成。”2 月 28 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庚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扩大到全县各乡长、保长参加，安排部署了征集马料和烧柴等问题。3 月 13 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请求康定支前委员会批准，委任朱倭、阿都、贡隆、扎科各乡保长，以便于完成支前任务。3 月 28 日，康定支前委员会电令甘孜：“解放军 2 月 24 日到康定后，田中田残部出逃，伤令即调民团严密防堵，遵照具报。”4 月 23 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召开各乡长、保长会议，传达解放军一万余众和各种车辆及大量马匹已到康定，正积极准备出关等指示精神，命令“马料和烧柴按前定数额增加一倍征集，若有延误，按军法论处。”

4 月 28 日，解放军进驻甘孜后，遇到后勤补给的严重困难。6 月 3 日，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电令甘孜：“十八军驻甘孜部队粮食困难，公路不通，运输不及，请向各土司、寺庙等说明情况，借粮 15 万斤，以济燃眉。候我军粮运到后，如数归还。”6 月 4 日，康定支前司令部通知甘孜：“备烧柴 200 万斤，此事关系解放西藏伟大事业，尽速快办为要。”6 月 5 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立即召开各乡长、保长会议，先遣支队后勤科黄科长等人受吴忠师长指派，到会作了讲话。会议决定备柴 200 万斤，限本月 7 日去扎科砍伐，14 日运至县

城和绒坝岔。6月6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召开各寺庙代表会议，决定筹借粮食300双市石，以备军用，限24天之内交清。6月14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召开各乡保长会议，讨论为解放军代购驮牛500头，鞍垫200套及组织运输人员25名。7月21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布告：“白利、林冲、贡隆、扎科和打金滩各乡，在扎科所砍烧柴，为解放军专用，不准任何人私卖私买，本府为查禁起见，特当赏奖密告者，对密告者予以十倍之柴薪重赏。以上三点，无论汉康，仰一体照例勿违。”7月23日，国民党县政府召开各乡、保长会议，讨论为解放军办理皮口袋1000根，组织制作藏式皮靴工人200名。7月31日，国民党县政府向先遣支队和甘孜支前司令部汇报支前工作。至此，全县共征集粮食1273.3双市石（青稞），代购驮牛500头，皮口袋1000根，鞍垫200套。组织制作藏靴人员200名，运输人员25名。8月27日，解放军五十二师供给处和甘孜支前司令部通知：“后续部队到达后，每日需烧柴6万斤，马草7万斤，嘱如数准备，按日供应。”8月25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召开各乡、保长会议，特邀解放军五十二师供给处和甘孜支前司令部人员到席，讨论大军到后的柴草供给问题。

10月6日昌都战役展开后，支前任务更加繁重，工作也十分紧迫。10月8日，国民党甘孜县长贺伯勋向军事代表徐达文、冀怀义申请保留旧政府人员20名，继续办理支前工作，并组成甘孜县支前委员会，由县长贺伯勋任支前委主任，秘书长陈文瀚任支前总务组长，财粮科长龙治中任支前总务副组长，警察局长汪宗玉任支前购储组长。直至10月下旬，十八军派骑兵一团政委徐达文任甘孜县军代表，正式接管国民党甘孜县政府。此前，甘孜县支前工作

一直由国民党甘孜县旧政府人员办理。在短期内能筹办如此多的军需粮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以吴忠师长为代表的先遣支队进入甘孜5个多月来,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建立了真正的军民鱼水关系,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得到全县各族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的结果。

## 七、与格达活佛情深谊长

距甘孜县城西14公里的白利寺,座落在雅砻江畔,寺内住持格达活佛在西康以至藏区都有很高的声望。他出身贫苦,博学多才,对藏族劳苦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受群众拥戴。1936年春夏,红军长征路经甘孜,在甘孜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人民政府,格达活佛被推选为副主席,他和朱总司令以及红军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交谊很深。他思想开明,勤于政务,拥护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政治主张,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红军在甘孜驻扎期间,他主持的白利寺,支援红军的物资就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军马15匹,牦牛19头。红军离开甘孜继续北上后,经他保护转移的红军伤病员就有200多名。西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当选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和平解放甘孜,并在甘孜建立进军西藏

的前哨基地，使格达活佛高兴万分，立即从白利寺赴甘孜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交谈中，格达活佛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认为西藏只有回到祖国大家庭里才有光明的前途。他说，甘孜是西藏的前哨，昌都是西藏的大门，在甘孜建立进军西藏的基地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并表示一定要为甘孜县地方建设和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贡献。

大约在5月10日前后，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专程前往白利寺回访了格达活佛，格达活佛并全寺僧众出门迎接。往事历历，彼此都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格达活佛拿出他珍藏的朱德同志照片和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为保护白利寺签署的布告：

查白利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  
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  
得侵扰，切切此布

公历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

吴忠师长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活佛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希望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向朱总司令报告，批准他的请求。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考虑到格达活佛前去西藏的安全问题，劝

他一定要慎重考虑。但格达活佛言词恳切,表示决心已定,义无反顾。

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从白利寺返回驻地后,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障,邀请他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格达活佛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向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表示:“我真怀念朱总司令,当年朱总司令率领部队离开甘孜北上时曾对我说,最多再过15年,我们还要回来,今年刚好15年,朱总司令就派你们来了,朱总司令真是一位活菩萨呀!我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并要求先遣支队部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明确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行,即使出发如果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勉为其难。格达活佛收到朱总司令同意他去西藏的电报后,非常高兴,立即着手行前的准备工作。

在格达活佛为去西藏进行准备工作期间,吴忠师长为了使格达活佛尽可能地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方针,以便于格达活佛入藏后,能有针对性地向西藏当局进行宣传。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于7月3日到白利

寺住下，安排天宝同志详细地讲解了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关于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解放后，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的地位职权不变；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十项政策。一起研究了格达活佛入藏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应急方案。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指出，格达活佛此行肩负着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重任，而西藏又有帝国主义势力插足，不但要和西藏地方势力周旋，还须提防帝国主义势力的暗算，风险一定很大。况且，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吴忠师长决定由先遣支队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建议送给他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袭扰，格达活佛则比较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以卵击石，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入藏，估计西藏当局不敢对他轻举妄动。在吴忠师长坚持下，格达活佛才接受了先遣支队送来的卡宾枪。

格达活佛临行前几天，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住在白利寺，和格达活佛形影相伴达7天之久。由于天宝同志是经党长期培养的一位优秀民族干部，既有民族地区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又与格达活佛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可以理论联系实际，准确生动地阐述党的政策方针。为格达活佛前去西藏作了理论知识和政治素养方面的培养和准备。

格达活佛即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当地群众极为关切，每天都有几十上百群众来到寺内，载歌载舞，祝福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

意；歌颂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甘孜；祝福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扬鞭起程，当地群众夹道相送，许多群众失声痛哭，好象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一些年长的群众，手摇转经筒，为格达活佛祈祷祝福。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活佛并辔而行，十里送别。

格达活佛经过15天的艰苦行程，于7月24日到达西藏门户昌都，受到英国驻昌都电台台长、帝国主义间谍福特的监视和重重阻挠，不能前行。滞留昌都期间，格达活佛克服重重阻力，广泛接触了昌都地区僧俗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扬我军进驻甘孜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帮助藏族群众致力于发展生产和地方建设。前往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府”，找到西藏边使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交换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格达活佛的行动遭到昌都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破坏。拉鲁·次旺多吉向拉萨当局报告了格达活佛的活动情况和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拉萨当局立即作了三条指示，一是不准格达活佛继续西进；二是不准东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动。8月13日，格达活佛冒着风险到昌都电台接洽发报事宜拟用电台直接与拉萨地方政府协商，并计划致电拉萨友人，以祖国统一、民族利益为重，明辨是非，为西藏和平解放出力。电台台长、英国特务福特设下圈套，假献殷勤，在茶内投毒“款待”，格达活佛饮茶中毒，并被软禁在福特家里，连随行人员和亲信子弟都难以接近。但他仍然念

不忘西藏的解放，强支病体，想尽一切办法与秘密见到的人员说：“解放军和藏族人民是一家人，我们应帮助解放军实现解放西藏的共同愿望。能为解放西藏出力，我虽死而无悔。”话语中充满着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忠心赤胆。8月22日午前，藏族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格达活佛毒发身亡，以身殉国，终年47岁。福特一伙为了掩盖罪证，把格达遗体秘密焚毁，其随员均被押往拉萨。贴身随员热勒在押往拉萨前，偷偷找到两名格达活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得到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全体官兵无不义愤填膺，誓以解放西藏的革命行动为格达活佛报仇。

## 八、为解放西藏运筹帷幄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和帝国主义势力坚持分裂中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制造西藏“独立”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份派出一个谈判代表团，却绕道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企图拖延时间，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由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其扩充的大部及

征调的部分士兵共约 8000 人，部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将和谈代表团故意滞留印度的同时，却企图与我先遣支队建立某种“对话”关系，借此摸清底细，以决定他们的应付策略。6 月 8 日，吴忠师长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送来的一封信：

甘孜：

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  
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  
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  
示，藉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 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 4 月初九日

信中词语，到也文雅恭敬。可是他的原则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称为中藏关系，把金沙江作为彼此边界，自称“西藏边使”，完全以两国外交关系的言词交涉，看了令人又生气又好笑。吴忠师长诙谐地对天宝同志说：“这家伙明目张胆地闹独立，就凭他这一封信，我们就出师有名了。”一五四团团长沙晋武和政委杨军同志在邓柯也先后收到拉鲁和藏军三代本主官牟霞的来信，都是一个调子。经支队指挥部报请西南军区审查批准后，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分别写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据西南局制订

的“十条”精神，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明白昭示：我各路大军业已准备就绪，正待命西进，昌都地方政府和驻昌都地区藏军有协助我军之责，希望他们认清形势，顺应潮流，择善而行，共襄义举，为早日完成统一大业而努力。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的信，既批驳了拉鲁等人的谬论，措词也比较委婉，体现了待之以理，以理服人的精神。信送出后不见对方回复，估计对方与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决心已定，没有必要再回信了。

先遣支队在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领导下，在向敌方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用兵之道。把了解敌情作为战前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开展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吴忠师长认为，对藏军这个新对手，过去知之甚少，首先是要深入了解藏军的基本情况。进入甘孜以后，组织力量多方搜集资料，对藏军的军队素质、装备、编制等进行了分析总结，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情况。

通过综合分析研究的第一印象是藏军的素质普遍较低，战斗力不强。历史上沿袭形成了藏区兵民不分，遇有战事临时征集，缺少正规的军事训练。官兵除步兵武器射击技术较好外，其他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都很低下。藏军的高级军官都出身贵族，不少人不学无术，平时作威作福，打仗贪生怕死。士兵是世袭的，因而很多是“胡子兵”。不仅军官携带家眷，不少士兵也有妻儿随军。是一支封闭式的地方武装。6月8日，支队调查人员从由拉萨来甘孜，准备去瞻化（新龙）的喇嘛降泽登巴口中获悉，西藏地方政府已征调 60

岁以下的男子当兵，准备与中央武装对抗。但如此仓促扩充素质不高的兵员，只不过滥竽充数而已，并无实际作战能力。民国以来，藏军除在二三十年代同川军和青海的地方武装交过手外，别无战事，缺少正规的作战经验。除藏军外，西藏各地还有土司、头人掌握的地方武装势力，平时冤家械斗较多，但从未参加过正规作战，其装备更差。虽然可以作为藏军的后备役，但难以统一征调指挥，更谈不上有什么作战经验。

藏军的编制为代本、如本、甲本、定本、居本六个梯级结构。清朝乾隆年间，西藏才决定组建正规军，当时规定总兵员 3000 人，共设代本 6 人，每个代本统领 500 人；代本以下设如本 12 人，每个如本统领 250 人；如本以下设甲本 24 人，每个甲本统领 125 人；甲本以下设定本 120 人，每个定本统领 25 人；再下就是居本，每个居本统领 12 人，总兵力仅相当于我军一个团。这种编制近 200 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很难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营、连、排、班进行比较。我军进军西藏前夕，藏军招募扩编为十几个代本，总兵力增加较多，但代本以下的各级编制人数仍大体保持 100 多年来的规模。部署于昌都地区的兵力大约 8000 人，在数百公里的宽大正面组织防御，间隙很大，难以组织有效防御。至于武器装备更无法与我军相比，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式步枪，另外每个甲本有一挺老式轻机枪，与我军装备有很大悬殊。

掌握金沙江以西的战区情况，是作好战前准备又一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比之于了解西藏地区藏军素质、人员编制、武器准备

等更艰巨复杂得多。有时还要组织一定规模的侦察力量深入敌方，并为此付出代价。昌都属藏东高山峡谷地区，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高寒缺氧，地形地貌极为复杂，既有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也有海拔虽高但地势平缓的草原，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一些河谷地带或较低的山谷，成片的原始森林无边无际，深不可测。这里的河流虽不很宽，但多数落差大，水流湍急，吼声震天，难以徒涉。还有高原气候多变，本来是风和日丽，万里晴空，转瞬间却狂风骤起，天昏地暗，雨雪交加。夜间在山上滴水成冰，白天谷底在阳光照射下人却又汗流夹背。吴忠师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总觉得这些复杂恶劣的自然条件，将给部队的行军、作战带来许多困难。昌都之战是我们在陌生地区同一个陌生的对手之间的军事较量。尽管我们作了极大努力，但同以往我们在内地作战相比，在“知彼”方面是令人很不满意的。

在康藏高原的特殊地形条件下，与藏军这个特殊对手作战，应该采取什么战术，这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为此，吴忠师长决定分批集训了营、连、排三级干部。集训中，为了解决一些同志认为在战术上突破对方坚固防御十分困难的错误相法，在分析了这次作战的特殊性后，向先遣支队指战员们指出：我军在兵力、装备、指挥、技术等方面都占有全面优势，而藏军最大的优势则是地形熟悉，对自然环境适应力强，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速度快于我军，单兵战斗力较强。同这样的对手作战，关键的一着是要抓住他，不能让他逃脱。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坚守，我们都求之不得，消灭他的

办法是很多的。如果让他跑掉或溃散，我们将被迫在更深远的纵深作战或分散搜剿，那不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难以在中央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解放全藏任务。因此，就战役目的而言，我们应将藏军主力聚歼于昌都地区；对每次战斗，则力求全歼。吴忠师长当时对昌都战役的战略战术的指导是非常精辟的。昌都战役使吴忠师长军事才能得到高度发挥。这在10月6日至10月24日的昌都战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为了查明金沙江以西藏军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方面的情况，一五四团二营进驻邓柯后，曾多次派出侦察小组过江侦察，每次往返时间为三、五日，深入数十公里。6月22日，二营一个侦察排在距江边约20公里处，与数百藏军遭遇，发生激战，我方包括增援部队共牺牲、失踪25人，伤26人。这是我军第一次与藏军交手，也是我军从进入甘孜地区到昌都战役发起前的5个多月中，战前准备过程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对于这次战斗的失利，吴忠师长作过沉痛的反思，他说：“派小分队过江侦察是我同意的，这是我决策上的失误。”“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它必然引起西藏当局的惊恐不安，对和平解放西藏产生疑虑。”后来，军首长也批评吴忠师长等指挥员过江侦察不利于争取西藏当局。客观一点讲，这是昌都战役前因时因事而论的一种战略失误。但从全局分析，昌都战役已经不可避免，不经过战斗较量，西藏当局就不能认识到我军是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也不会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吴忠师长总结这次战斗的意义和影响时曾经说过：“这股藏军以数百之众乘马攻击我仅有

30余人的步兵侦察排，在侦察排指挥失当（吴忠师长曾批评侦察参谋指挥失误）的情况下，仍未获得全胜，且本身也遭到不小伤亡，可见藏军战斗力的确是不强的。”

## 九、挥戈跃马赴昌都

1950年8月31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9月上旬和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两次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在帝国主义挑唆指使下，西藏当局对中央警告仍然置之不理。西藏地方当局这一系列表现，说明他们执迷不悟，已下定决心与中央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善良愿望和耐心等待，只能被看作软弱可欺，看来只有以打促和，先打而后和了。昌都是西藏的门户，西藏当局又在这里摆下重兵，在昌都地区进行一场军事较量便不可避免了。

西南军区和十八军首长对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是：这次战役是一场军事仗，也是一场政治仗，其目的是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条件。因此，不打则已，打就要打一场歼灭战，要通过这一仗彻底打破西藏当局的幻想。7月24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指到达甘孜。7月8日和24日，吴忠师长在甘孜

先后两次上报了对当前藏军情况的分析、判断和对用兵的建议。报告中，吴忠师长提出了南北呼应，正面牵制（进攻）与大迂回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他建议：“以进驻巴安（巴塘）之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先行渡江，威逼宁静（今芒康），诱使昌都藏军主力南下增援，使其陷于深山峡谷之中。此时，我五十二师主力则自邓柯渡江，直插类乌齐、恩达，切断藏军由北线西撤的通路，或渡江以后以一部迂回类乌齐、恩达，另一部则直取昌都，待南下增援的藏军主力发现我军企图时，为时已晚，我则可收南北夹击之效。”吴忠师长提出这一作战计划的根据是：“我军大举渡江后，昌都藏军有可能凭险顽抗，而且更有可能将主力西撤拉萨，其西撤通路主要有南、中、北三路。北路经恩达、洛隆、边坝、嘉黎、大昭到拉萨。南路是南下邦达，经八宿西折到拉萨。三条通道比较，北路地势虽高而较平缓多草，便于大部队特别是骑兵运动。中路地势高，比北路复杂，却是人烟稠密的产粮区，是马帮常走的道路。南路有很长一段处于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之间，山高谷深，地势险要，部队离开道路即难以行动。根据道路情况，昌都藏军更有可能沿北路或中路西逃。”吴忠师长提出的战略战术是经过进入康区 5 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受到军首长高度重视，在后来的昌都战役得到应用。

8 月 26 日，西南军区下达了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

8 月 28 日，五十二师主力于眉山举行隆重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到会检阅了部队，并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以后的几天部队便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等同志率

领，在驻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分批乘汽车沿着刚刚修通的雅安至甘孜的公路，浩浩荡荡向西挺进，9月中旬，先后抵达甘孜地区与先遣支队会师。十八军军部设孔萨大楼。此时部队士气高昂，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便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金沙江。

9月25日，张国华军长到达甘孜，传达了毛主席要求我军于10月份占领昌都，以促使西藏当局早日派出代表团赴京谈判，争取明年进军拉萨解放全藏的指示。吴忠师长向张国华军长汇报了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以来的基本情况和对执行西南军区、十八军军部战役计划的意见。张国华同志随即由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同志陪同，检查了部队战前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还拜访了在甘孜县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征询了他们对我军进藏的意见，了解了他们支援我军的能力。张国华同志最不放心的是我军后勤运输能力，当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等人向他保证马上就可以动员三万头牦牛，把向昌都运输的主要任务担当起来之后，即下定了实施战役的最后决心。

9月15日，军前指在甘孜召开作战会议，针对藏军以昌都为枢纽沿金沙江布防北重南轻的特点，根据西南局报请中央批准的关于“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右翼（北线），迂回昌都以西，迫使敌军聚集昌都而歼之”的原则。张军长宣布：我军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基本战役布势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北线集团由五十二师和军直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五十四师炮兵连以及已于7月下旬自西宁进

驻玉树的青海骑兵支队组成，统由五十二师指挥，使北线集团成左、中、右三路配置。

右路为一五四团及青海骑兵支队，担任战役迂回任务。一五四团自邓柯渡江后，紧随骑兵支队南下，佯作欲经黑河进军拉萨，待过囊谦后，即向类乌齐、恩达疾进，切断藏军西逃通道，并阻止丁青藏军东援。

中路为五十二师师直部及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直炮兵营，继一五四团于邓柯渡江后，经郭堆、生达南下，直取昌都。

左路为军侦察营、工兵营并配属五十四师炮兵连，担任正面箝制任务，于岗托渡江向昌都方面缓进攻击，不使昌都守军逃跑。待我中、右两路部队逼进昌都，切断藏军退路后，配合围歼昌都守军，并以一部迂回昌都南面，阻歼南逃藏军。

昌都战役部署形成北线和南线两个作战集团。南线由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和云南一二六团（欠一个营），一二五团三营组成。主要任务是配合北线集团作战。北线集团担负了主攻任务。吴忠师长不但统率了五十二师，还担负指挥了五十四师炮兵连和青海骑兵支队、军直炮兵营、军侦察营等重要指挥任务。此时，吴忠师长已作为北线集团总指挥，承担了昌都战役主要作战任务，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而完成任务的关键是要切断藏军退路，即要抢在藏军撤退之前占领类乌齐、恩达。从金沙江边到恩达行程约 500 公里，战线很长，迂回任务重，后勤补给困难。执行这一任务的重大问题还在于我军对开进作战地区的地形及其它自然条件心中无底，对藏军

的布防情况也不甚了解，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而打乱我军的行动计划。但是，吴忠师长对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多年的征战使吴忠师长对自己部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有了全面的了解。有康藏人民强大的支援和军队后勤补给作为坚强后盾，任何困难也吓不倒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

9月18日，吴忠师长在甘孜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这是战前的誓师大会，也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作战会议。张国华军长到会讲话，师长指着墙上的地图，给各团下达了作战任务。

9月20日，集结于甘孜及其附近地区的五十二师主力和军直参战部队，在吴忠师长率领下向邓柯方向开进。吴忠师长身着戎装，挥戈跃马，迈向西去的征途。此时的吴忠师长心潮起伏激荡。这位年仅31岁，英俊潇洒的师长，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向欢送的人群挥手道别。

## 十、结束语

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展开。五十二师师长兼先遣支队政委的北线集团指挥员吴忠，率军一举突破金沙江防线。连克囊谦、类乌齐、恩达等重镇，并于18日同正面攻击部队一道，解放了昌都，歼灭藏军5700多人，打开了进藏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1952年，吴忠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胜利回国后，历任解放军机械化师师长，第四十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吴忠指挥部队连克高平等6城，为捍卫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吴忠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2月26日，吴忠在海南逝世，终年71岁。

## 关于《吴忠将军在甘孜》一文的撰后语

1994年5月，从苍溪县政协编辑的《吴忠将军》一书中，阅读到吴忠将军所写的回忆录《打开西藏和平解放大门的一战——昌都战役》，书中史实与甘孜县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新政权建设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在甘孜县过去的史料中，有关吴忠将军和先遣支队的历史史迹都疏于记载。此间，因参加甘孜县地方志编纂，在埋头于县档案馆查阅史料中，查得十八军一五四团于1950年在甘孜县开展社会调查的大量资料。如果把吴忠将军和先遣支队在甘孜期间的革命史实、一五四团的社会调查以及当时甘孜县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带来的深刻变化整理、汇集成篇，载入甘孜县的历史史册，无疑将成为甘孜县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基于此目的，笔者决

定以吴忠将军在甘孜期间的回忆录为主要素材,撰写《吴忠将军在甘孜》一文,查阅、参考并引证了以下历史资料:

《吴忠将军》:“吴忠生平简介”,苍溪县文史资料第九集。

《甘孜会师》:中共甘孜县委党史工委编印,1988年打印件。

《甘孜兵变经过》:“一五四团 1950 年社会调查资料。

《甘孜县宗教调查》:一五四团 1950 年社会调查资料。

《甘孜县人口调查》:一五四团 1950 年社会调查资料。

《甘孜县商帮调查》:一五四团 1950 年社会调查资料。

《我们到甘孜后对于自然变化的了解认识》:一五四团 1950 年社会调查资料。

《雪山草地不会忘记》:杨·益西平措。1991 年 6 月 11 日《四川青年报》。

《为和平解放西藏献身的格达活佛》:周锡银《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

《甘孜县政府志》:甘孜县政府办公室 1990 年初稿。

此外,还参阅了大量有关资料,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笔者认为,该文的写作态度是严谨的,一切以史实为据,凡史料记载不尽一致之处也多方查证,力求准确可信,没有杜撰求全或生编硬造之行迹。

# 踏遍青山人未老

——甘孜州高原丘原云、冷杉更新技术研究推广情况纪实

刘建邦

## 前 言

1983年甘孜州科委下达的攻关课题——《甘孜山原丘原云、冷杉更新技术研究》(简称“高更试验”),历时5年完成各项研究和3个企业局10个林场,面积60000亩的中间试验,并取得圆满结果。成活率比传统技术提高10—21%,为国家节约资金214.8万元。1988年在成都经专家组鉴定,认为这项研究成果在这一地带更新技术研究方面居领先地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89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年州科委列为重点推广项目,“八五”期间推广7.5万亩,保存率在“七五”的基础上提高5—8%,再为国家节约资金300万元。此项技术为生产单位所接受,推广成果1995年荣获甘孜州科技进步二等奖。10年来的试验、推广,经受了生产实践的检验,证明该项技术的确在营林生产上能发挥很大作用,促进了营林生产的发展,取得了科技兴林的效果。“八五”期末甘孜州更新跟上率达到100%,比“七五”期提高了21.8个百分点,到1995底全州人工更新有效面积达82.8158万亩,活立木蓄积量(人工幼林蓄积量)17.82万立方米,更新跟上采伐,结束了30

年更新欠帐的历史。1996年8月在全州科技大会上,《甘孜山原、丘原云、冷杉更新技术研究及推广》成果被授予甘孜州科技进步特等奖。

作者在甘孜州从事林业生产管理、科研近40年,对全州林业生产的发展、兴衰比较了解,并主持该课题的研究工作(课题组长),对课题的论证、研究方案的制定、实施、阶段总结、课题鉴定都曾亲自参与。几年来课题研究人员围绕“高更技术”,撰写论文30余篇,先后在《国际林联论文集》、《林业科学》、《四川林业科技》、《甘孜州科技》、《甘孜林业科技》、《四川森林生态研究》等书刊上发表;并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了30余万字的《迹地生态与营林更新技术》专著,而且载入了《甘孜州林业志》的科技教育篇(1994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林业科技发展史》。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遵照州政协文史委员会所嘱,将亲身经历,写成一篇回忆录形式的文字资料,献给广大读者!我想,对今后甘孜州林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营林更新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 一、试验前甘孜州营林生产概况

我是1956年到甘孜州农林处工作的,1961年成立州林业局后,转到林业局工作。1962年困难时期精简机构,州林业局撤销,又到丹巴林业局(企业)营林处从事营林生产管理。由于这一地区属高山峡谷区,水热条件较好,森林采伐后迹地更新不是十分困

难。1979年普查时,丹巴林业局更新有成效面积已达7.6万多亩,更新跟上率达75%左右。当时营造的人工幼林,现在树高已有14米,最大的胸高直径达30厘米,森林已经得到恢复。

在丹巴林区工作十年,1971年道孚局上马又调道孚林业局(企业)营林处工作,一干又是十年。这段时间开始与山原地区的森林和迹地更新打交道。但是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差,冬春干燥、低温、热量不足,严重影响幼苗的成活生长,迹地更新成效很不理想。一块林地,第一次植苗更新后,还要一次、两次进行重更,或者多次补植,才能见效。成本高,效果不好,一年复一年,更新欠帐越来越大。据1979年普查,采伐迹地是39034亩,更新有效面积22234亩,欠帐1.6万余亩,更新跟上率仅56.96%。

1980年调州林管局工作(后合并林业局),主管营林科室工作。从全州的营林工作看,问题更多,地方营林更新才开始起步,州属6个森工企业到1985年,采伐面积448137亩,迹地更新337834亩,荒山造林4560亩,更新跟上率仅75.38%,欠帐11万多亩。因此,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十分关注,认为森工企业“只砍不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其实森工企业建局时,同时建立了营林更新专业队伍和管理机构,有的企业叫营林处,有的叫营林科,各有营林职工三百或二百人不等,并有计划的开始采种、育苗、更新造林。营林职工付出的劳动并不比森工职工少,或者说更加辛苦。海拔3000多米的林区,山高坡陡,空气稀薄,徒手步行许多人尚感到不适,何况还要进行较重的体力劳动。采伐工人在一块林地

· 上进行采伐作业，树砍完了，木材运走了，就结束作业；而营林工人就不一样，森工采到那里，他们就清林、更新、重更、补植，十年八年的抚育工作，都要到那里生产劳动，一直到幼林成长起来成林后才能了结。有的营林工人在林区爬山二、三十年，才爬出一座座翠绿的青山，一道道清澈的溪流，一幅幅山青水秀的图画。

回到州里工作后，我到过炉霍红日、翁达河西，那里海拔高，接壤草原，森林生态系统十分脆弱，采伐后生态环境起了变化，更新更加困难。翁达河西林场 1972 年采伐以来，共采伐面积达 14496 亩，虽更新后又经多次重更、补植，而可望成林的仅 11.3%，还有 12000 多亩已无法恢复森林，早已沦为牧场；炉霍林业局红日林场七林班，采伐后更新、重更、补植 11 次之多才达到更新质量要求。如此等等，这给林业科技工作者带来很大的压力。每次参加省里的营林生产会议，甘孜州的更新总是比其它地区落后，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同时也激励我们奋发。当时与一些同志商量，一定要很好的研究，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为甘孜州的营林更新扬眉吐气，打个翻身仗。

## 二、“高更试验”的蕴酿与思想准备

1982 年我已调甘孜州林管局（后合并为林业局）负责营林更新科技工作。鉴于企业的更新工作跟不上，地方小型采伐企业更新起步又晚，种苗、更新设计等都得从头开始，内心深感不安。回想在学校时，导师们常用林业老前辈、老专家梁希教授（中央林业部部

长)的名言来教导我们：“要黄河流碧水，赤土变青山。”可是在甘孜州从事林业工作已 20 来年，大雪山东西坡变成了荒山秃岭，大渡河、雅砻江开始流着混浊的水。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甘孜州人民将骂我们是历史的罪人。至少也说我们是没有出息的人。

全国科技大会以后，我们都感到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林林总总，都不再计较，知识分子好像枯木逢春，总是想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一点实事。一个偶然的时机我们同王金锡(原在甘孜州林业局工作，后考上研究生离开，现任省林科院生态研究所所长)、侯广维(原甘孜州新龙林业局营林科科长、现省林干校高级讲师、副教务主任)、史立新(省林科院高级工程师、实干家)、许金铎(道孚林业局营林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后任州林科所所长)等同志碰在一起，谈起了高海拔地区的营林更新技术问题，彼此均有同感，大家信心十足，愿迎着困难上，下定决心，来一次大协作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于是一起提出了初步研究方案。后来在州科委、州林业局以及道孚、炉霍、翁达等林业企业的领导和支持配合下，列入了州科委的攻关课题。

1983 年就到 3 个企业局选定试验地点，组织协作力量，抽出一批具有高中文化、责任心强的青年工人组成 40 多人的科研队伍，并特约四川省林业学校高级讲师廖光瑶参予树种抗旱性差异的研究。同时也得到谢国成、乔光辉、施天云等各企业的部分负责同志的支持配合，并一起参加试验。在几个试验地均建立气象观测哨，在道孚局建立化验室，并对参加土壤、植物生理、生态、数理统

计的科技人员进行了培训；连续5年坚持各种试验观测，取得气象、植物生理、土壤分析、幼苗生长量、生物量、植被等40多万个数据。气象观测人员每天上山3次，起早摸黑，风雨无阻，累计行程达7000多公里；省林科院、省林干校同志，每年进山2—3次，每次都要工作一月半月，累计行程12000多公里，在野外工作经常在10小时以上，中午两块干馍、一壶开水，就是一次美好的“试验午餐”。如果没有无私的奉献，没有创业敬业的精神，是很难做到的。他们“志在青山、情系林海”，是革命英雄主义的体现，付出的劳动，为甘孜林区营林科研起到了奠基作用。

### 三、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1963—1971年间，各企业成立有科研组，开展了塑料大棚育苗、移床培育、高山松直播、插枝护苗等试验，取得一些效果。外地一些专家、学者，也来作过一些考察。但他们没有条件较长时间地蹲下来研究，无法深入地进行探讨，交通、自然条件太差，生活艰苦，一些人愿去阿坝，而不来甘孜，实际情况了解很少，闭门造文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有鉴于此，使我们认识到，科学试验不进行改革，跑马观花、浮在面上，老一套办法是搞不出明堂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实践，才能弄清“高更”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时作者在州林管局营林科负责，较多地接触全州的营林科技工作者，也有机会结识大专院校、林业科研单位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有的是师兄、师弟关系。

由于有共同的理想和语言,组合起来,工作中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计得失,故能坚持5年之久,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后来又合作完成《迹地生态与营林更新技术》专著的出版。

针对长江上游高山高原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迹地更新困难,林业科学基础研究薄弱等现实情况,在探索本区营林更新技术时,确立以更新树种生物学特性、生态学特性的定位研究与营林更新技术田间试验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案,以期筛选适合于长江上游高山高原区的最佳营林更新措施。在具体制定设计方案时,考虑到当地森林分布的特点、目前的营林生产水平、以及试验地的水平梯度(经、纬度)和垂直梯度(海拔高度)的差异。要求试验结论在理论上科学价值,在更新生产上有指导意义。最后确定在四川省甘孜州高山高原林区迹地更新困难的比较典型地带的翁达经营林场的河西,炉霍林业局的红日,道孚林业局的喇嘛沟,作为研究试验点。并分别在翁达河西海拔3800米处,炉霍红日海拔3620米和3770米两处,道孚喇嘛沟3700米和3900米两处的采迹地上布设试验地5个,每个试验地面积1500m<sup>2</sup>,横山设置,并围上两米高的铁丝网围栏,以防牛羊践踏,影响观测数据。每个标准地均是经过多次更新失败的8—10年的老采伐迹地。

### (一)第一阶段试验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1、提高迹地更新保存率的技术试验。选择目前营林更新生产中的主要技术措施,进行更新树种(A),栽植方式(B),更新苗木等级(C),更新季节(D),荫蔽方式(E)等5项技术措施(因素)试验,

并分别在 5 块试验地安排 5 因素 4 水平共 16 种组合措施的正交试验。每个试验地面积  $60 \times 25(\text{m}^2)$ ，共设 3 个重复区；每个重复区设 15 个小区，另设两个对照小区，每个小区面积为  $3.3 \times 6.6(\text{m}^2)$ ，栽 32 窝苗木。此外，每个试验地还设有一个取苗区，备作土壤及生理分析、生物量测定、生产效益分析之用，安排内容与第一重复区相同。

每年冬苗木停止生长后进行各个小区的苗木质量年终调查，包括苗木全高、当年高生长、基径、冠幅及苗木质量评定，然后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进行计算，评价各种试验组合方案的优劣。

## 2、更新树种物候期及生长规律的研究

试验选择了本区最主要的更新树种川西云杉、鳞皮云杉、鳞皮冷杉，进行物候期生长规律的系统定位观测，了解更新树种在迹地生境条件下，林木内部变化在外部形态方面的反映，探索其生长发育节律的周期性和最适生长的生态条件。

物候与生长过程观察分苗木和杆材(约 5m 高)两部进行。

在各试验地选 1 重复区的 2、8、13 小区(鳞皮云杉、川西云杉、鳞皮冷杉)的 30 株苗木挂牌，每隔 2—5 天观测一次，记录树液流动、芽萌动、出叶、抽梢、顶芽形成的始期、盛期、末期和高径生长量等项目。林木杆材观测，在试验地附近分树种选择 5—10 株处于杆材期树木作观测株，挂牌编号，每隔 2—5 天观测一次，记录树液流动、芽萌动、出叶、展叶、抽梢及顶芽形成的始、盛、末期，以及高径生长量。此外，每年在取苗区选取一定苗木测定生物量，计算迹地

苗木生产力。

### 3、迹地小气候研究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迹地小气候变化规律,探讨迹地小气候对苗木成活及生长发育的影响。分别在5个试验地内,各设一气象站,按中央气象台颁布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进行每天3次的常年观测,观测项目有1.5m百叶箱温度、湿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量、蒸发量、地表温度、地表最高最低温度,地下5cm、10cm、15cm、20cm温度的观测,另外还结合试验的具体要求,增设了0.2m高处百叶箱的观测,以研究更新苗木生存空间的气温、湿度的变化规律,并在各标准地每隔10天分层次(地下5cm、10cm、20cm)取一次土样,分析土壤含水率的季节变化。

### 4、苗木受害及死亡的研究

研究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危害苗木成活的气候因子太多,故增设了此项研究,目的是探讨危害更新苗木的主导环境因子、危害程度、致死原因,为提高更新质量提供理论。每次霜日后,对指定小区内的苗木进行调查,记录霜害程度、死亡及成活数,并结合气象、土壤的观测进行分析,并在旱季在取苗区抽取各类苗木测定其各项抗旱性生物指标,包括旱季苗木含水量、需水程度、蒸腾速率、自然饱和亏等。

### 5、迹地土壤变化及土壤生产力综合评价研究

土壤为苗木生存的根本。要提高苗木的更新成活率,还必须弄清楚迹地土壤理化性质,不同年代迹地土壤动态演变规律。除对各

试验地的土壤剖面进行详细调查外,还在不同类型的迹地上设立调查样方,调查植被组成、数量及总生物量。并挖取土样,带回实验室,进行理化分析,研究迹地土壤水热条件变化,有机质及土壤肥力动态变化,进行土壤生产力综合评价。

## (二)第二阶段的试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了对各单项试验及筛选出的最佳营林更新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试验和论证,以便在大面积生产上进行推广时有把握地取得成效,于1986年开展了如下方面的研究:

1、单项更新试验:①不同树种的对比试验;②不同更新季节的对比试验;③不同荫蔽方式的对比试验;④丛植方式对比试验;⑤最优组合措施的对比试验。

2、中间试验:根据各试验地筛选出来的两种最优组合方案,编制营林更新技术草案,在道孚、炉霍、翁达选择相应的地段,进行100公顷的中间试验,分别选用鳞皮云杉和川西云杉的Ⅰ、Ⅱ级苗,采用单株栽植,分两次春季更新。

在中间试验地区布设标准地进行观测,仍采用更新质量指标,逐年评定更新质量,实行更新效果的动态监测。

## 四、最佳更新组合技术方案筛选

为了筛选并制定一套适合于高山高原区采伐迹地最佳营林更新技术方案,我们总结了生产上常用的各种技术措施,开展以正交试验为中心的营林技术试验。经过连续4年(1984—1987)的野外

试验和定位观测,筛选出一批表现较好的更新技术措施。其技术指标达到一次更新后4年保存率达90%以上,超过设计要求一次更新后3年保存率达70%的预期目的,超过了生产上补植后3年达到80%的规定指标。

由于各地林业生产技术水平、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等差异,提出几种可供比较选择的技术措施方案。其中最佳理论综合措施方案,它比所试验的16种组合措施效果都好。确定此方案的原则是:①筛选的技术措施因素应是能获得较高质量。②这一措施应兼顾幼苗的高生长。③筛选的组合措施中,若某一措施因素不显著,则应选择最低成本水平措施。

## 五、“高更”成果的推广应用

为了尽快把“高更技术”推广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1990年州林业局成立了“高更推广课题组”,由彭基泰同志(副局长、高级工程师)任组长,亲自组织开展推广工作。州科委作为推广课题下达给州林科所,由许金铎(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刘大建(副所长,工程师)和州林业局营林科的同志具体负责推广实施,负责技术指导。

推广区以雅砻江流域为主,包括新龙、道孚、炉霍、雅江、理塘、九龙、甘孜等7县的采伐迹地和新龙、道孚、炉霍、力邱河4个州属林业企业的高海拔林区的采伐迹地。大部分海拔在3400—4000米的沟谷地带,年均温仅2.88—4.73℃,年均日照时数2000—2500

小时,年均降水量 600—700 毫米,降水集中在 6、7、8、9 四个月,干湿季分明,晚霜期仅 50 天左右,无绝对无霜期。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应用先进的更新技术,才能突破这些难以恢复森林的禁区。

为保证推广措施顺利进行,把“高更技术”交给广大营林职工,从州林业局到县林业部门、林业企业,层层办培训班,组织学习“高更技术”。结合各地实际,选择制定更新技术措施,制定验收管理办法,设置标准地,观测推广区苗木成活、生长情况。在实施过程中州林科所、州林业局营林科组织技术指导小组,深入现场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推广质量。

在“七五”期间推广面积 6 万亩,成活率提高 10—21% ;“八五”期间,推广 7.5 万亩,保存率比传统更新技术提高 5—8%。更新一次获得成功,1995 年全州首次实现更新跟上采伐。

## 六、成果推广后获得的效益

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提高了迹地更新幼苗的成活率与保存率,减少了重更、补植的工资,种苗、工器具损耗,后勤服务等费用。1979 年对全州人工更新幼林普查,迹地更新有效面积仅占更新作业面积 43.4%,其中大部份还要经过重更、补植;炉霍林业局在红日林场海拔 3700 米的更新迹地上作过定位观察,其结果是:云杉更新当年成活率 85.1%,第 2 年保存率下降为 52.3%,第 3 年再下降为 36.8%,第 4 年下降到 25.8%。即是说初次更新时,每亩植苗 250 株,4 年后只剩下成活苗 64 株了,这叫更新失败。所以 1980

年以前,迹地更新一次成功的极少,大部份重更两次以上,并多次补植才能见效。有的采伐迹地,重更、补植达 11 次之多才获成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七五”和“八五”期间,在全州推广 13.5 万亩,成活率比传统更新技术提高 10—21%,保存率提高 5—8%,共节约更新资金 500 余万元。

生态效益:长江上游高山高原区的森林是中国西南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上游水源涵养林的主体,对维护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平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更试验推广成功,加速了森林的恢复,培育了后续资源,不但为国家创造森林财富,而且有利于生态平衡,缓解了因森林砍伐、垦荒、烧山、修公路等使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也减轻了水资源的锐减和水土的流失,从而避免导致土地资源中的 N 肥、P 肥、K 肥的流失,而使土壤贫瘠,生产力下降。

1989 年 9 月,随省林学会组织的省内外林业专家考察团,考察了丹巴磨子沟 30 年前已经采伐的迹地更新生态变化情况。沿革什扎河而上,沿途水草丰美,荞麦粉红似锦,玉米林立,茎干一人多高,苹果园中果树结实累累,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革什扎河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已不是当年采伐时遍地残枝木屑,溪流混浊的景象。经过近 30 年的营林更新,云、冷杉人工幼林已茁壮成长起来,一片葱郁,最大的幼林胸高直径已达 23 厘米,高 12 米,森林生态环境已基本恢复。

森林环境资源的价值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据中国林科院研究,认定森林的环境价值远远超过其木材价值。从计算的3种森林环境价值(即涵养水源、保护土壤、固定二氧化碳和提供氧气)的价值看,森林环境效益为立木价值的3倍多。例如甘孜州从1958年建立丹巴、康定等森林工业算起,到1990年(包括各县小型企业),为国家提供木材1632万立方米,实现工业总产值9.4亿多元,实现税利3亿多元;反过来说,在森林未恢复之前,我们损失的环境资源是40亿元左右。森林采伐后,要及时更新,恢复森林,到几十年后成林成材,森林恢复,我们的环境效益才又可得40亿元的补偿。可见森林生态的作用是何等重要。

社会效益:森林环境恢复后,山青水碧、鸟语花香,空气新鲜、污染减少,给人们带来了一个舒适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给人以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有益于人类的身心健康,会使自然界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也能反映一个地区建设的成就和精神面貌。

## 七、专家和生部门对“高更技术”的评价

“高更试验”的论文在国际、国内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过许多交流,先后在国际和国内省以上刊物就发表过论文20多篇,有《迹地生态与营林更新技术》专著出版,发行全国。近年有国内许多专家来州考察,因此影响较大。许多领导、专家都作了评价。这项成果还得到州委领导的肯定和编入四川省有关营林更新技术规程。

蔡霖生:(四川农业大学林学系教授)

对高山营林更新研究,现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从迹地生态角度出发,从原来的定性认识,开始走向数量化。从影响更新质量的5个因素分析,树种占主导,其次是更新季节,这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建议升级为省管的课题。也建议,从阶段成果来看已摸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瓜,要使这个瓜长得更大更成熟,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1986年课题鉴定时,蔡先生(注:四十年前我在四川大学时,蔡先生教我们的森林学)指出:这一深入系统的研究和理论探讨,不仅为制定高山高原地区更新技术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丰富了森林学内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这一地带的更新技术方面居领先地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最近蔡先生写信给我说,看到你们《迹地生态与营林更新技术》一文的出版,不胜感激和欣慰!……,你们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同类研究的空白,是高原山原地区30多年来迹地更新技术的全面科学总结和升华。

管中天:(省林业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这个课题选择非常准确。从长远来看,我们的林业,应该还是在西部,首先资源在西部,占我省70—80%,所以现在把高海拔森林更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很有见识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但对甘孜州林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对我国高海拔地区更新造林问题的研究也有意义,是整个高山地区长期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这个课题的研究路线是正确的,首先是三结合,比过去搞得

好。过去搞了一半往往研究不下去,就是没有很好地与生产结合,也没有和科研、教学单位结合。

方法可行。从过去高山更新研究的定性走向定量,是先进的……。

杨钦周:(省林业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这个课题选准了,对将来解决川西高山林区的更新,会有很大作用的。由于难,大家都感到很棘手,这个课题的研究,正好给高山更新带来了一个好的开头。这不只是技术问题,针对山原地区是带有战略意义的,对高山生态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个课题的特点:通过课题研究,对高山更新方法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0年代对高山更新属一般的、概念性的考察,从典型样地的调查,从简单的数学分析;到60年代以后我们开始有了应用数理进行研究,那时还停留在成活率、保存率上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搞;至于说从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这方面搞,在高山地区这次还是个开端。就是说从土壤化学元素、气候、热量、水分方面作定量的研究,这是一个开端。并为今后打下了基础,也为高山飞播提供了技术资料。

银春台:(省林业厅副总工程师)

高海拔更新研究协作组,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成果。主要表现在:课题设计比较周密,在短时间取得了大量观测数据,对多种更新最佳技术措施的组合,进行了选择,以及对物候、生物量、地球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高度。我非常赞同这样的作法,也

很支持。

这个试验的成功，在四川高海拔地区和澜沧江、雅鲁藏布江以及西北林区都具有普遍的实际意义和科学价值。

陈瑄：（四川省林业学校校长、高级讲师）

高海拔地区更新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它弥补了我省高山更新研究方面的不足。高山更新有3个阶段：一是解放前有些林业工作者进行了一些高山林区的考察，写了一些报告，这些报告中针对更新的还是很少的；二是50年代我们高山更新做了些工作，1966年省林科所总结了有关高山更新方面的材料，以后进展就不快了。今天我们有机会参加这个会，看到了高山更新方面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展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有现实的意义。

唐广义：（省林业厅科教处高级工程师）

这个课题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更新课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四川的高山林区的更新问题，在外国都很注意，特别是高山森林采伐后，森林到底能不能恢复，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研究这个课题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这个课题规模相当大，5个点分布在3个局，跨越3个县，参试人员（包括季节性的）将近100人。组织这样大的队伍来开展这个研究，别的课题是少有的。而且主研人员多是在林区工作多年有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师或高级讲师。

第三、很正规。按科研的特点，进行了正交试验，过去采伐更新

的研究,规模都没有这样大,也没有这次正规。

第四、这个试验很艰苦,和我们在别的地方不一样,海拔高,气候条件差,交通、生活条件也比较差,我们这个科研组已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在高山搞科研,还准备坚持搞下去,这一点,值得钦佩。

第五、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是很显著的,两年的更新保存率达到 97.8%,是过去没有过的。

第六、基础资料比较全,从气候、土壤等各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基础工作抓得比较扎实。

1989 年中国林学会组织邀请云南、辽宁、黑龙江、北京林大以及四川的有关科研、教学、生产部门的专家、教授共 25 人,组织高山森林经营学术考察团来甘孜林区考察,在其报告中称:“甘孜州林业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长足的进展,是来之不易的。特别是高海拔林区的育苗、迹地更新成就,是我国高山森林经营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也是西南高山森林更新史上具有创造性的光辉的一页,这项成功无论在生产实践上还是高山采伐经营学理论上都有重要价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项成果已经在甘孜这片热土上全面推广(在省内外,其他地区已有推广试行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很多生产单位所接受。

甘孜州委刘发生书记在 1996 年全州林业工作会议上指出:营林更新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更新跟上采伐,经历了将近 10 年的时间,是推广塑料大棚育苗、狠抓营林更新科学试验成果的推广,才

取得这样的结果。

1996年甘孜州林业局邀请州人大、州政府有关领导考察甘孜北路几个重点林业县,在其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了科学育苗,科学造林,州、县企业的更新比翼双飞,更新跟上率都达到了100%。并要求,各企业要继续推广应用塑料大棚育苗技术和“高更技术”,真正做到科技兴林。

1996年州林业局彭基泰副局长在全州林业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推广应用现有的林业科技成果,在高海拔地区及更新困难地区广泛采用“高更技术”,提高更新造林成活率和3年株数保存率。

四川省林业厅1994年10月颁发的《四川省国有林业企业更新造林技术操作规程》中,吸取了“高更试验”的一些成果,在规程中形成了具体条文,如“窄带清林,适用于高原丘陵区和高海拔地带……”以及“越冬假植”、“秋季更新”、“插枝荫蔽”、“人工更新造林质量指数的评定”等,以应用于全省性的技术规程指导营林更新生产。

---

作者简介:刘建邦,合江县人,50年代中期毕业于四川大学林学系,高级工程师;第六届州政协常委、《甘孜林业科技》主编,“高更技术”课题组长。

# 回忆叔父罗洪则拉二三事

罗洪拉姆

敬爱的叔父罗洪则拉在 1987 年 6 月永远离开了我们，使我这个从 1953 年起就跟在他身边读书，朝夕受到他照顾、教育的侄儿悲痛万分。叔父离开我们已经十载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我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激励我前进。

## (一)

1956 年 3 月，九龙县的民主改革工作开始，决定先在三区进行试点。由于三区与九龙县城距离较远，为了工作方便，九龙县的民主改革办公室就设在了当时西昌专区所辖的冕宁县城内。当时我的叔父罗洪则拉担任县民主改革办公室主任。

1956 年 8 月，学校放暑假，我就到了冕宁县城叔父处度假。记得有一天晚上，九龙三垭区上（当时区驻地在三垭）派人送信，报告说：三区朵洛乡的罗洪达尼上山叛乱。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民主改革办公室主任的叔父，马上决定他亲自去三区朵洛乡山上说服罗洪达尼。当晚我叔父带着两位同志骑马赶赴朵洛乡山上。经过两天两夜的艰难行程到达目的地，叔父以自身的影响和威望，向罗洪达尼讲明党和政府民主改革的政策，通过艰苦的说服工作，把罗洪达尼动员到了冕宁，以进一步做工作，其他几个参叛人员则说服教

育后让其回家。这样就避免了一起叛乱事件，避免了损失。

## (二)

1957年，我叔父任九龙县县长。九龙崇山峻岭，交通十分不便，全靠人畜运输，到自治州首府康定出差开会都是骑马，晓行夜宿，十分艰苦。直到1977年8月，营九公路才全线通车。是全国最迟通车的县之一。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县政府也买了几匹马供县领导出差骑乘。记得有一天县政府的秘书长王保平对我叔父说：现在政府买了公用马，罗县长你就可以把你私人的马卖了，骑政府的马。我叔父回答说：政府现在钱不多，买的马少，我还是骑我自己的马，包括我的通讯员也骑我的马。公家的马就给其他的领导骑。就这样一直到1961年调甘孜州政协任副主席，我叔父在九龙县工作11年，都是骑自己私人的马。

## (三)

1962年7月，我从九龙中学读完初中，8月份接到甘孜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到康定州政协叔父家，准备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到甘孜师范报到。

有一天，原来州政协的陈邦耀对我说：西南民族学院要招收几个甘孜州民族界的爱国上层人士的子女去读书，条件是要招收初中毕业的，你应该争取去……。我听了以后就动了心，当时叔父家

的子女没有初中毕业的，我应该争取去。于是我就给叔父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读书，这次有这样好的机会，你就把我报成你的儿子送到西南民院去读书可以吗？我叔父是这样回答我的：共产党培养教育我多年，共产党相信我，把我提到州政协当副主席，我不能向党说假话。你已经考上了甘孜师范，就安安心心去读书。叔父给了我200元钱，我也就去甘孜师范读书去了。

从甘孜师范毕业后，我也一直工作、生活在甘孜县，退休定居也在甘孜县。甘孜县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可是在叔父身边生活、学习的情景，受到的教诲将永世难忘。

1996年9月

# 甘孜县粮食生产概况

邓昌银

甘孜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南缘,东经  $99^{\circ}15'$  至  $100^{\circ}25'$  北纬  $31^{\circ}23'$  至  $32^{\circ}53'$ 。全境幅员面积 7553.63 平方公里,最低海拔 3325 米,相对高差 2443 米,属高原季风气候。早在公元前时期,就有“白兰”诸部落居住于河谷地带,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唐宋以后到明末清初,随着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地势低、气候适宜、灌溉方便、土地肥美的雅砻江流域,逐步建立起粮食生产区域体系。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的发展。1987 年甘孜县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 82 个粮食生产基地县之一,1990 年被列入青稞商品粮基地县,粮食生产在州内占有重要位置。

## 粮食生产的资源结构和制约因素

### 一、土壤资源

甘孜县土壤资源丰富,主要土壤类别为冲积土、山地褐土、山地棕壤土、亚高山草甸土、高山草甸土、高山寒漠土。除高山寒漠土因地势太高无法利用,高山草甸土可供畜牧业利用外,其余各类土壤都可供农耕。以山地褐土为主要农耕地,占土类面积的 5.15%,分布在海拔 3325 米至 3600 米的山地寒温带半干旱气候区。耕地土壤由冲积土、山地褐土等土类组成,具有平坦连片,土层深厚等

特点。据全县 56 个农耕地土壤抽样化验结果表明,农耕地土质适中,不过酸、不过碱,质地中壤的耕地占 90%,有机质平均含量 2.33%;氮平均含量 0.166%;碱解氮平均含量 120PPm;速效钾平均含量 6PPm;褐土养份含量基本类同。总的趋势是:有机质氮、钾含量中等,严重缺磷。

## 二、耕地资源

全县实有耕地约 19.6 万余亩,占全县 113.04 万亩总面积的 1.8%,人平占有土地 200 余亩,人平占有耕地 4 至 6 亩,居全州首位。地处雅砻江沿岸的高山宽谷区,包括庭卡、拖坝、斯俄、色西底、呷拉、柯则、生康、南多、贡隆、仁果、卡攻、来马、昔色 13 个乡,人口约 2.53 万,耕地面积 15.553 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79.35%,人平占有耕地 6.51 亩,是全县人均占有耕地的 1.55 倍,粮食产量占全县的 76.53%,农业产值占全县的 75.57%,是全县主要产粮区。与色达、炉霍、德格接壤的高山峡谷地带,包括扎科、四通达、夺多、泥科四个半农半牧乡,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的 10.87%,农业产值占全县的 13.87%。地处城区的甘孜镇,人口密度大,人平耕地 3.47 亩,比全县人平占有耕地低 1.5 亩。

全县农耕地的总趋势是:单位面积产量低,增产潜力大。由于人少地多,耕作粗放,生产水平低下,加之缺乏肥料,导致单产低的农耕地亩产只有几十斤,产量高的也在 400 斤左右徘徊。

## 三、气候

甘孜县地处内陆,地势高,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大,出现不同的气温带,形成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雨量少,干雨季分明,气候干燥,

太阳辐射强,无霜期短的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气候特点的基本情况是:年均气温  $5.6^{\circ}\text{C}$ ,年绝对最高气温  $31.7^{\circ}\text{C}$ ,年绝对最低气温  $-28.9^{\circ}\text{C}$ 。最热月均温  $14^{\circ}\text{C}$ ,最冷月均温  $-4.4^{\circ}\text{C}$ 。年均日照 2640 小时,冬季干冷,夏季温湿,冬长夏短,降水量极不均匀,冬半年降水量只有 71.2 毫米,而夏半年降水量达 563.4 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89%。年蒸发量 1654.70 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2.9 倍。干旱是全县农业生产的主要自然灾害。气候寒冷也给农作物生长带来一定影响,年均无霜期只有 73 天,无绝对无霜期,每年出现 10 次以上大冰雹。由于典型的高原气候,有利于一年一熟的豆麦类作物,特别是喜凉耐寒的青稞等农作物的生长。

#### 四、水资源

县境内地表水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但受限制因素也很多。主要是地形复杂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制约了农业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系发育在年均降水量 635.5 毫米情况下,平均地表径流量 23.9 亿立方米,每亩地可占有地表径流量为 215 立方米。雅砻江以及支流达曲河、泥曲河三条主要河流与 50 余条溪流组成树枝状水系。河谷幽深,河床陡峻,水流湍急,河域面积宽阔,年际变化均衡。全县积雨面积 8400 平方公里,地表总产水量 24 亿立方米,平均每亩面积产水 217 立方米。但由于土壤含沙量重,渗透力强,蓄水能力较差,农作物经受不起干旱。

#### 五、干旱

干旱是甘孜县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历年出现的两大旱情是春旱和伏旱。据解放后 32 年的气象资料统计,出现旱灾的

有 20 年,其中大旱为  $6/26$  年 = 31%。旱象发生概率为 54%,以春旱为最严重。因土壤含水量极低,土壤干旱与大气干旱并存,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

春旱一般发生在 4 至 6 月。1972 年自春耕播种后到 6 月 4 日的 44 天中,仅降雨 26.4 毫米,是历史同期降水量最少的一年。1983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 日,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蒸发量为 169.4 毫米,旱情长达 63 天。严重受旱农作物达 3.84 万亩,只能收回种子或无收的占受旱作物的 27%,全县粮食总产量较 1982 年减产 11.4%。1986 年全县遭受春旱作物 4.0845 万亩,占粮食作物播面的 31%,造成无收的 440 亩,死苗 30% 以上的 1.268 万亩。1987 年春旱面积 6.2701 万亩,占粮食作物播面的 49%。只能收回种子的 1.256 万亩,颗粒无收的 5.431 亩。

伏旱一般发生在 5 至 6 月麦类作物分蘖拔节期。1958 年 5 月下旬到 6 月,连续 38 天伏旱,造成全县粮食总产量只有 914 万斤,平均亩产仅 76 斤,是解放以来粮食产量最低的一年。

## 六、洪灾及泥石流灾害

甘孜县雨季集中在每年的 6 月至 8 月,降雨量 300 毫米以上,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50%。为洪灾及泥石流的发生创造了条件。雅砻江沿岸及其小溪流两侧低洼地段被洪水淹没或冲刷不乏其例,危害虽然是局部地域,但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

1965 年 6 月中旬以后,连日下雨,江河猛涨,山洪暴发,沿雅砻江和山溪两岸低洼地段农作物被淹没或受冲刷,受灾 789 亩。1975 年 6 月 28 日,雅砻江流域城区段发生洪灾,淹没和冲走耕地近 2000 亩。1981 年,洪水和泥石流冲毁农作物 66 亩。1982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30 日的 26 天中有 14 天下雨,总雨量达 180 毫米,暴雨

成灾。6月10日一天内暴雨夹雪,降雨32.1毫米,沿雅砻江一带地势较低的河坝、打金滩、雅桥、斯俄乡等15个生产队的2632亩农作物被淹没或冲毁,基本无收。1983年,昔色乡暴发泥石流,80亩农作物被毁。1984年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灾,雅砻江沿岸、东谷区的鲜水河洪水猛涨,7个乡的33个生产队3665人受灾,淹没农作物5235亩,冲毁1233亩,损失粮食117万斤,73户农民住房倒塌。1987年6月25日以后连续6天降雨,山洪、泥石流造成河水改道,冲毁耕地6546亩,其中206亩颗粒无收。一般性的洪流灾害每年都有发生。

## 七、霜、雹灾

甘孜县受西北高原寒流影响,寒冷霜多,无霜期仅37至134天。一般降霜都发生在7至8月的麦类作物扬花结实之际,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由于高空寒气流与地面温度反差大,每年7至8月又会发生程度不同的雹灾。

1952年6月7日和7月20日两次霜冻,540亩农作物减收3成。1980年5月11日和6月2日两次特大霜冻,3万亩农作物的禾苗毁损15~37%。1982年8月12日和13日连续两次霜冻,受灾作物3.7794万亩,估计损失粮食440万斤。1987年9月以后,多次早霜袭击,受灾农作物2.4万亩。1988年霜灾面积3594亩,损失30%以上。1989年霜害面积1654亩。预防霜害是稳粮促收的重要任务。

民国三十年(1941年)8月,绒坝岔区仁达村连续两次受冰雹袭击,损失200袋地约600亩粮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24日午后2时许,朱倭乡突然狂风骤至,冰雹如鸡蛋大小,殃及靠山地亩,受灾面积1051.5亩。1965年5月到6月,先后数次冰雹,

成灾面积 7820 亩,占全县粮食作物播面的 5.58%,其中损失 60% 以上的 4171 亩。1966 年 7 月 15 日,四通达、夺多两个公社的部分生产队遭冰雹袭击,1844 亩作物受灾。1973 年正当收割之际,泥巴沟公社的章达、昌古生产队遭受冰雹,成灾 840 亩,其中 563 亩青稞全部掉穗。1984 年,东谷、绒坝岔等区遭冰雹袭击,殃及 1.441 万亩,占全县粮食作物播面的 11.2%,成灾 4274 亩,其中 1856 亩无收。1987 年,冰雹毁损 1683 亩农作物的 80%。1988 年,冰雹虽未造成重灾,但成灾面积达到 1.1352 万亩。1989 年雹灾面积 8276 亩。1990 年雹灾面积 2.4949 万亩,占全县粮食作物播面的 17.6%,其中特重灾 4476 亩。

## 八、病、虫、鸟、兽害

甘孜县粮食作物病虫鸟兽害种类多,分布广,已发现的有病害 30 种,虫害 28 种,鸟兽害 7 种。

病害以坚黑穗病和散黑穗病为主,分布较为广泛,危害普遍。以拖坝、城区、生康等地危害最为严重,主要在麦类作物抽穗期危害青稞。其中,坚黑穗病危害率 6~33%,散黑穗病危害率 5.5~21%。其余如丝黑穗病、锈病、云纹病等危害率一般在 0.1~2% 之间。30 种病害中,除黄矮病曾在 1981 年全县范围内流行外,其它无流行记载。

虫害以金龟子、叩头虫、地老虎危害严重。据 1960 年在拖坝调查,每亩总虫数达 1.8 万头,其中金龟子 9334 头,占总数的 57.8%;地老虎 4000 头,占总头数的 26.1%;叩头虫 1334 头,占总头数的 8.4%。它们分布广泛,适应性强,对农作物根、苗、种子都有危害,平均危害率 20.8%,重者达 34.9%,轻者也达 11.3%。叶穗害虫危害率一般在 0.1~0.6% 之间,但流行趋势强。1981 年,全县

麦蚜虫合并黄矮病流行,减产粮食 331 万斤。1984 年,全县比较向阳的拖坝、生康等 8 个乡的 1.1216 万亩冬麦作物发生流行,占冬麦播面的 4.5%。青稞潜叶蝇是 80 年代后期发现的虫害,但流行趋势严重。1989 年全县 5 区 1 镇的 156 个村的青稞发生潜叶蝇流行,危害面积 7.1925 万亩,成灾面积 3.9654 万亩。1990 年再次发生大流行,但由于农业部门在防治研究及推广应用方面成效显著,未造成大面积粮食减产。

鸟兽危害以麻雀和野鸽危害最为严重,尤其是麻雀,群聚群飞,繁殖力强,啄食播下的种子和成熟后的麦类作物。据调查,危害率达粮食收获量的 6.9%。其它如山耗子,对作物的损害也很严重。

## 九、杂草

甘孜县农作物杂草危害种类繁多,以野油菜、燕麦草、灰灰菜为主。禾本科、蓼科、豆科、菊科以及其它杂草都对农作物生长有一定危害。据州农科所 1965 年 6 月在拖坝乡 4 个合作社的不同海拔高度的壤土、砂壤土和重壤土地块中,进行的农田杂草分布调查资料证实,野燕麦对粮食作物危害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在海拔 3570 米的重壤土中,每平方米的平均密度达 712 株。野油菜的危害仅次于野燕麦,在同一海拔的重壤土中,每平方米的平均密度达 508 株。灰灰菜每平方米的平均密度为 119 株。除草增粮,加强田间管理的任务十分艰巨。1965 年,州农科所在拖坝小学附近开展野燕麦对青稞作物的影响调查的资料证实,如果每平方米燕麦密度达到 519 株以上,青稞亩产只有 232 斤。在无燕麦地块中,青稞亩产则可达 401 斤。

## 生产关系的变革

### 一、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生产关系

解放前，甘孜县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劳役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技术相当落后，生产工具极为简陋，普遍使用“二牛抬杠”犁地，木锤碎土，镰刀收割，连枷脱粒，广种薄收，轮歇地占去很大面积。贫苦农民每年春耕时节向土司头人、寺庙借种下地。农业生产中的封建意识浓厚，禁忌很多，求神念佛，打卦下种；男不背粪，女不犁田，马不耕地，猪羊散放，忌用人粪。这些都严重地禁锢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压在农奴头上的大山，孔萨、麻书、白利、东谷四方土司以及封建寺庙是全县最大的统治集团，藏族劳动人民受着残酷的压迫剥削，农奴无人身自由。农奴制度在甘孜形成土司头人（农奴主）与差民（半农奴）、科巴（农奴）、娃子（奴隶）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土司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辖地内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对属下平民可以生杀予夺。就是国民党官吏有所施为，也要商得土司同意，否则难于推行。为维护落后的农奴制度，镇压劳苦大众的反抗，土司头人以及寺庙拥有武装，有刑法，有监狱。头人是次于土司的统治者，拥有一定特权，差巴是载入土司户籍的百姓，由土司赐给房屋、份地，在土司辖区内居住耕种，不得任意迁徙，土地不得买卖，土司可以随时收回。科巴是地道的农奴，地位低下，不能入土司户籍。一般情况下，农奴主给科巴两袋地约六市亩的份地和两袋约160斤的种子，由科巴终年不息地为农奴主无偿耕种，稍不遂意即遭鞭苔，有时随主人外出当娃子使唤。娃子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完全依附于农奴主，没有人身权利，任凭主人买卖、抵押、馈赠、陪嫁，鞭打虐杀，终年在主人家里过着非

人的生活，象牛马一样，是主人会说话的工具，同牲畜加在一起计算主人的财富。农奴的儿子生下来就是农奴。

清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公元 1905 年至 1911 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以武力“改土归流”，先后强制收缴了孔萨、麻书、林葱、白利、东谷土司的印信号纸，取消土司制度，没收土司头人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土地权为国家所有，同时废除土司头人粮税差役特权，另行订出新的粮赋、牲畜税，差役章程。但新出台的田赋税额均高于“改土归流”以前，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民国元年（1911 年）清政府垮台后，土司制度复辟。民国七年（1918 年），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将原没收土司的印信号纸以及财产发还，并给他们委以“总保”、“保正”等职，土司制度复辟。从此，土司制度一直维持到民主改革以前。

## 二、建国后生产关系的变革

### （一）解放初期的生产关系

1950 年 4 月 28 日，甘孜和平解放，农业生产仍以户经营，土地为土司、寺庙所有。据对拖坝、麻书、足窝、斯俄四个村 138 户的调查，其中有差巴 38 户，人平耕地 4.3 袋；花户 33 户，人平耕地 1.07 袋；科巴 32 户，人平耕地 1.05 袋。使用土地数量最多的是差巴。少数差巴土地特别多，以租佃或请人帮种等形式收租放利。又据如西点的调查，差巴有耕地 2119.5 袋约 6598.5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69%，农村主要生产资料集中在差巴手中。

1956 年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两年多时间里，没收地主富农土地 3.4 万余亩，牲畜 1500 头、房屋 1 万余间，还没收农用物品生产资料折合人民币 200 多万元，废除高利贷 4 万多元，废除农村各种封建特权几十种。80% 以上的农户基本上解决了生产、生活上的困

难。

1958年冬至1959年春继民主改革后进行了以“反违法、反特权、反叛乱、反剥削”为内容的“四反”运动，没收寺庙土地1.1365万亩，房屋9006间，粮食193万斤，各种牲畜1418头，茶叶4.0592万包、黄金1139钱，大洋29万元。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了土司、寺庙特权势力，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据1958年统计，全县有耕地面积14.3865万亩，其中地主富农占有1.187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5.23%；中农贫雇农有耕地10.838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5.77%；寺庙有耕地1.031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0.97%。

## （二）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运动在甘孜经历了群众自发组织和政策实施两个过程。

1952年，城南乡河坝村自动组织了一个有134户476人参加的河坝生产互助组，主要从事开垦河坝一带的河滩荒地。1955年2月，经县委研究，批准河坝村自发组织的临时性换工互助组建立常年性互助组。初建时入组21户77人，有劳动力44人，耕地140亩。

1957年，全县建立起118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入组744户2976人。1959年发展到453个，入组2475户9056人。

1957年春，试办了3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38户136人。1959年发展到49个，入社2287户，12771万人。

1958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个，入社943户4216人。1959年发展到9个，入社1622户6286人。至1965年公社化前夕，高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68个，入社6666户2.4934万人，占全县80%以上农户，有劳动力3370个、耕地3.48万亩，牲畜

3912 头。

###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 年“四反”运动结束后,响应“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号召,于 1960 年建立起雅砻江人民公社,包括绒岔、城南、城北、呷拉、色西底、柯则、拖坝、庭卡、斯俄 10 个乡,总计有 2849 户 1.1506 万人。建社后,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和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

在“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影响下,全县农村办起了“常年性公共食堂”159 个,共 5400 户 2.2485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1%。其中:雅砻江人民公社 82 个,2849 户 1.1304 万人;绒坝岔区 59 个,1992 户 8829 人;东谷区 18 个,559 户 2392 人。“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1958 年,全县农村 26756 万人口中,人均有粮 330 斤,加上非农业人口,全县人均有粮不足 300 斤。

1960 年冬开始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全县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进行“大划小”、“高改初”。1961 年将雅砻江人民公社所辖的色西底划改为色西底人民公社,包括 9 个生产队,254 户 970 人。1963 年又将色西底人民公社整改为 9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雅砻江人民公社所辖的原 8 个乡也进行了整改,同时对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存在的问题逐步进行了处理。全县各地农村都对实施“一平二调”期间给群众造成的损失进行了处理和赔退。并给社员适当划拨自留地,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65 年,全县农村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1966 年建成人民公社 24 个,共计 203 个生产队,入社 7711 户 3.3518 万人。除继续贯彻高级农业社的办社方

针、政策原则外,实行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72年6月开始进行了“整社”,1975年实行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经过建立、整改、化改、再建立,一直持续到1983年全部结束。

#### (四)生产责任制

人民公社期间,主要是评工记分来计酬,生产责任制有过初步摸索和实践,也是后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初级阶段。

1973年以来,为了加强集体生产的管理,一度推行过“分组作业,定额评分”。

1978年冬,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短产受惩”制度的生产队101个,占生产队总数的56.48%。

1979年,全县农村实行“五定”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22个,占生产队总数的12.3%。

1981年,州委工作组在来马公社的3个生产队进行“联产到劳”试点,根据农村实际,具体划分、落实种植面积、计划产量、牧、林副业任务奖赔制度,并以户按劳签订合同,取得了成功经验。

1982年初,来马公社5个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到年底,全县已有33个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产量3772万斤,比上年增产13.78%,获得了显著成效。

1983年,在贯彻甘孜州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同时,传达贯彻了中央、省委的两个一号文件和州委《关于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队处理若干问题的试行意见》。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全县25个农牧业公社的221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同年底,甘孜州委《关于放宽农牧区几项经济政策的规定》实施后,农村生产资料全部归承包者所有,粮食生产收益除按规定上缴国家外,不再

提留储备粮或储备金和公共积累中的公益金。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 (五)专业户

农村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为各类专业户的生产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983年,全县专业户从无到有,发展到313户,占农牧业总户数的3.14%。1984年增加到711户,占农牧业总户数的7.66%,其中种植业149户,养殖业313户,运输业104户,加工业32户,商业54户,还有的从事医药、修理、服务业等行业。1985年,全县专业户已发展到1071户,占农牧业总户数的10.88%。农牧民已从单纯的粮食、牧业生产向农、工、副等各行业找出路。

随着专业户的不断涌现,乡镇企业同步发展。1983年,全县有乡镇企业28个,总产值54.65万元。1985年发展到224个,总产值165.36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46.35%。1990年,乡镇企业产值完成239.84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1%。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活跃了农村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受单一的粮食生产的束缚,纷纷向其他产业转向。从1985年起,外出经商、务工的劳动力每年在4000人以上。向粮食生产的投劳逐年减少,但粮食产量稳步上升。

## 对粮食生产的投入

### 一、劳动力的投入

甘孜县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再加上宗教意识浓厚等原因,向粮食生产的劳力投入较低。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统计,全县3826户1.9468万人,分布5区13乡390甲,有耕地10.8492万

亩,抛荒地 6.4513 万亩,如果按估计劳力 1.2 万个计算,劳平负担 8 亩以上。但全县寺僧达 8013 人,因寺僧宗教活动多,参加农业劳动少,粮食生产严重缺乏劳动力。

解放后的 1950 年,对拖坝如西点调查结果表明,人平占有耕地 5.2 亩,人平占有耕地最多农户达到 17.1 亩,最低的 1.2 亩。耕地占有量不平均,劳平负担差别就大,也影响劳动力对耕地的投入。

民主改革后,分田到户,耕者有其田,消除了土地占有量的不平等现象。据 1958 年资料全县有耕地 14.659 万亩,农村人口 2.6756 万人,人平占有耕地 5.1 亩,劳平负担 8.5 亩,反映出农村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公社化时期的 1976 年,全县农村人口 3.2363 万人,农村劳动力 1.8145 万个,耕地面积 14.7339 万亩,人平耕地 4.6 亩,劳平负担 8.1 亩。

联产承包到户的 1990 年,全县农村人口 3.688 万人,农村劳动力 1.5242 万人,耕地面积 19.1765 万亩,人平耕地 5.2 亩,劳平负担 12.6 亩,再加上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工、商、副等其它行业转移,耕地的劳平负担呈逐年上升趋势。

## 二、农田基本建设

### (一)垦荒兴农

1952 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求“扩大耕地面积 10% 以上,以达到增产粮食的目的”的指示下达后,甘孜县于 1954 年调剂公私荒地 5200 亩,分给 572 户无耕地的农民垦荒耕种。1955 年,动员调剂公私荒地 9794 亩,其中分给无地缺地农民 827 户共 4535 亩。1952 年至 1955 年,全县共垦荒 1.0116 万亩。1960

年垦荒 2,136 亩,1965 年垦荒 2,345 亩。到 1990 年,全县实有耕地面积达到 19.1765 万亩。在 1950 年 12.7742 万亩的基础上扩大 6.3851 万亩,增加耕地 50%。播种面积在 1950 年 10.112 万亩的基础上,1990 年已达到 13.9526 万亩。

解放前,城南乡一带的河滩地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草坝子。1952 年,3 户农民为生活所迫,到河坝落户开荒,当年开垦荒地 10 亩。1953 年增加到 14 户农户,共垦荒 30 余亩。1954 年以后,无地农民逐年在河坝开荒定居。经过多年的开垦深耕,熟化了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为粮食生产创造了条件,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建立起河坝新村,如今已是集农、工、副、商一体的新型农村。

1990 年以后,甘孜县因人口增加,全县人平耕地在 1950 年 5.8 亩的水平上减少到 5.2 亩,土地增加数平均比较小于人口增加数。

## (二)深耕改良

从 1953 年开始改革原始落后的藏式犁。到 1965 年,已推广使用新式步犁 917 部,当年用新式步犁耕地 2.1175 万亩,普遍深耕达到 6 寸左右。

1960 年,农村已拥有各种新式步犁 1020 部,推广套耕 6810 亩。由于新式步犁逐步代替了藏式犁,不仅加深耕作 1 至 2 寸,而且能消除土埂,减少杂草,熟化土壤。这些优点使新式步犁的使用在农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1966 年以后,随着农村各型拖拉机和配套农用机械的使用和发展,深耕深度普遍达到 7 至 8 寸。1965 年机耕面积 205 亩,1970 年已达到 4820 亩。到 1981 年增加到 8.9092 万亩,创历史最高纪录。联产承包到户以后,大型农用机械的使用管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机耕面积有所下降,1988 年,机耕面积下降到 4.099 万亩,以

后都呈逐年下降趋势。

甘孜县改良土壤的基本要求遵照上级指示,实行“三改三结合”,即坡改梯、薄改厚、沙改壤同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修筑机耕道路相结合。1966年,“农业学大寨”示范改土106亩,全县动员、全面动员,脱离甘孜县实际,据农业部门有关人员估计浪费劳力约20万个。1979年,全县完成“三改地”350亩,到1989年共完成“三改地”4650亩。1987年统计结果,甘孜县自解放以来,平整土地,清理地边地角杂草乱石、灌木草丛、土地连片等综合性改土累计完成7.8236万亩。

### (三)农田水利建设

甘孜县农田水利建设根据当地自然条件,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出发,把水利建设的重点放在高山宽谷地区,坚持以引水为主、辅以提灌的水利建设方针,集中主要人力、物力、财力,开展打火沟堰、苦多堰、麻书堰、当打堰等几条主要渠道的建设,综合治理80条水利建设小渠,逐步提高有效灌面,以保证冬灌和春灌,促进稳粮增收。

1955年,全县有效灌面为2.5万亩,保证灌面实现1.3606万亩。1970年,有效灌面增加到3.9万亩,保证灌面实现2.2万亩。到1980年,有效灌面增加到5.05万亩,保证灌面实现3万亩。1985年以后,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劳力结构和土地分散到户的新变化,现有渠道的管理利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资金投入多,劳力投入少;有偿劳动多、义务投劳少;建设渠道多,巩固利用少。1981年,有效灌面虽然增加到5.1万亩,但保证灌面只有1.2万亩。1987年有效灌面下降到2.41万亩,保证灌面仅1.37万亩。

### (四)农用机械

由于生产技术比较落后,1960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农用机

械。1962年,全县共有9台农用排灌机171千瓦特。1972年,大中型农用机械设备8台322千瓦特;农用排灌机也增加到29台202千瓦特。1980年,已拥有大、中型农用拖拉机128台528千瓦特;小型手扶拖拉机119台1,049千瓦特,比1980年增加168台;载重汽车13辆,比1980年增加9辆。

甘孜县雅砻江流域主要产粮区地势平坦,土地连片,比较适宜大型农用机械从事耕作播种收割脱粒等农业劳动。承包到户以后,未能很好解决大型农用机械使用管理这一实际问题,使大型农用机械难显“英雄本色”,以致部份大型农用机械一度闲置不用或报废。小型拖拉机虽然拥有量大,但多数被用来跑运输,直接投入粮食生产的有限。这与农业基础地位脆弱,农民对粮食生产投入观念不强有一定关系。

### 三、农用肥料

农业土壤普查资料显示,全县19万余亩农耕地面积中,缺磷面积14万多亩,占耕地面积的83%,其它有机质含量普遍偏低或严重不足。根据这一实际,农业肥料的投入使用,立足于增施有机肥料和追施磷肥。

有机肥料的来源以牲畜肥料为主。1950年,全县牲畜总头数为11.2658万头(只、匹),1990年发展到29.3451万头(只、匹),其中农村牲畜总头数为13.3469万头(只、匹)。但农村普遍以牛粪作燃料,给肥料的利用带来严重影响。猪粪的肥效好,但农村养猪的比重在各类牲畜中居于次要地位。1950年,全县有能繁母猪322头,1990年为758头,增长速度较慢。这与农民不喜食猪肉,不喜欢养猪有一定关系,而且养猪多为散放养殖,不利于收集猪粪,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肥料来源。人粪尿是肥效优于畜

肥的有机肥料,但在解放前,人们视人粪尿为不洁之物,忌用人粪尿给庄稼施肥。解放后,党和政府动员农民群众挖坑建厕。到1976年,出现了“家家户户建厕所,普遍施用人粪尿”的新气象。采青积肥、土块熏肥、泥炭制肥等其它有机肥源也经常宣传倡导,但目前在农村仍不能普遍推广。

解放以后,有机肥的推广使用发展迅速。1953年,平均每亩粮食作物仅有有机肥料200多斤,相当多的土地白地下种,出苗后也不追肥。以后,经过全县农村广泛的积肥运动,到1958年,施肥面积增加到6.6万亩,占粮食作物播面的50%,平均每亩施用有机底肥也从200斤增加到1200斤。施用有机追肥1000多斤。到1986年,施肥面积达到9万亩,平均每亩施有机底肥2750斤。农民的牲畜拥有量也得到迅速增长。1957年,全县平均每亩地有牲畜0.43头(只、匹),1966年增加到0.6头(只、匹),1990年达到1.01头(只、匹)。

甘孜县无机肥料的推广使用落后于川内地区,这与农民经济条件和传统观念有一定关系。1965年至1980年,农村施用单一的氮肥,不仅肥料施用量亩平很低,而且土地严重缺磷的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1965年为例,全县施用化肥总量43吨,亩平施用量6两。1977年是解放以来化肥用量最高的一年施用量为743吨,亩平也不到11斤。1989年,化肥施用量下降到95吨。

从1981年起,开始以氮肥为主,结合施用磷肥。但到1986年,又单一地施用氮肥。推广使用无机肥料任重道远。

## 四、良种示范繁殖、引进推广

### (一)青稞

青稞是甘孜县广大农民的当家食品,但解放前青稞品种单一,

只有黑白两类。1955年，州农科所选育繁殖成功六棱黑青稞，经甘孜县良种示范繁殖农场多年繁育推广，现已成为甘孜县青稞作物的当家品种之一。1957年，州农科所从农家品种中经集团选育成功六棱白青稞后，迅速推广。至1960年，全县种植面积达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10%，到1990年，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面20%以上。1957年推广种植的道孚紫皮青稞，到1960年，推广种植面积达到粮食作物播面的2%。1958年以后，州农科所、甘孜良种示范繁殖农场、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县科委等农业科技部门单位先后示范种植的有岷县青稞、西藏青稞、1211青稞、79—177—2六棱白青稞、彭波白六棱青稞、循化兰青稞、四棱黑青稞、79—178—2六棱白青稞、石洛一号青稞、肚里黄青稞、马尾青稞、昆仑青稞、短芒白青稞、黑壳白青稞、藏青320青稞共15个品种，但因土壤气候条件等原因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

甘孜县良种场引进示范繁殖813青稞成功后，1984年推广种植2135亩，1986年扩大种植6577亩。1987年以后，种植面积逐年下降，现今属甘孜县青稞作物中的搭配品种之一。

推广康青3号白青稞是甘孜县近期推广良种的重要项目。该品种于1985年由州农科所在甘孜县拖坝基点引种成功，1986年在拖坝四队示范种植50亩，1987年县良种场示范种植90亩，县畜牧科所示范种植30亩，产量与其它品种比较能增产20%以上。1990年全县普遍种植，达到1.3912万亩。种植康青3号已经成为替代其它品种的发展趋势。

## (二)麦类

解放前，甘孜县麦类作物只有光头小麦和长芒晚麦两个品种。

1953年至1958年，十八军后勤部生产科在拖坝、大金寺一带开荒千余亩，引进了大芒春麦和保定牛肝池波罗小麦。

1957年,甘孜县农业试验站引种“南大2419”小麦获得成功,到1964年,全县“2419小麦”种植面积已占小麦播面的80%,成为60年代的当家品种。玉皮小麦由甘孜县农试站与“南大2419”小麦同期引进,1961年,推广面积为460亩,是小麦生产的搭配品种之一。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和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曾先后引进种植过新龙白小麦和新龙黄小麦,但由于生长期短,怕早霜等原因,到1960年已被淘汰。

甘孜小麦为本地品种,但单位面积产量低,1960年以后已无人种植。

1988年,县农业局从道孚县引进冬小麦,当年推广种植1665亩,1989年扩大种植到3020亩,是近期内小麦作物的主要品种。

1984年以后,县农业技术部门先后引进、种植的麦类作物有“绵阳春11号”春麦、阿波小麦、“川农205”小麦、大头春麦、“川农8号”春麦、友谊麦、“春麦繁20”7个品种。但属零星种植,无推广记载。

肥麦在甘孜县麦类品种中有过辉煌历史。1974年6月,县委书记泽仁扎西在西藏参观学习时,发回肥麦种子一车。县委于9月2日至6日召开了冬肥麦会议,传达学习了西藏自治区种植肥麦经验,拟定了“土、水、肥、深、密、管、压”7项种植措施。9月10日至20日,在全县25个示范点上分3期播种130亩,收获后平均亩产875斤,创下了甘孜县有史以来麦类作物的辉煌纪录。到1978年,全县肥麦种植面积迅速推广到4.1959万亩,分别占粮食作物播面的32.3%、麦类作物播面的99.9%。总产1651万斤,占全县粮食产量的41.3%。以后因品种退化、缺肥等原因,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下降,到1988年,全县肥麦种植面积只有734亩,1989年仅21

亩。

### (三)豆类

甘孜县豆类作物为大麻豌豆、团结豌豆、大白豌豆 3 个主要品种。其中大麻豌豆为本地良种，耐寒、成熟早，是豌豆作物的当家品种；团结豌豆系州农科所从甘孜县拖坝基点引种，推广后为广大农民所喜爱。大白豌豆从泸定引进，生长适应性强，产量高、粉质好，已遍及全县大多数农户。

1990 年，县科委从青海引进“青海草原 10 号”白豌豆，结夹大、籽粒多，有待推广。其它零星种植的有白根白豌豆和小麻豌豆，现小麻豌豆已被淘汰。

### (四)薯类

甘孜县薯类作物为紫皮洋芋、大白洋芋两个主要品种。紫皮洋芋由州农科所育成，粉质细腻产量高，为农民所喜爱。大白洋芋结块多，食味可口，是本地当家品种。其它如小白洋芋、红皮洋芋、大山王洋芋多为零星种植。

洋芋在甘孜县粮食作物中占有一定位置。1950 年播面 1705 亩，1990 年达到 4807 亩。

种子有退化趋势，但薯类在甘孜县增产潜力大，发展前景好。

## 五、科技兴农

解放前，甘孜县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是一片空白。解放后，党和政府为发展粮食生产作了大量科技成果应用推广等工作，除前面曾提到的资源开发、良种示范繁殖、引进推广等外，还开展了一些相关项目研究、推广和开发应用工作。

1960 年，全县建立种子基地 1.1555 万亩，其中有青稞 7992 亩，小麦 232 亩，豌豆 1242 亩。种子基地发中包括良种基地 3530

亩,其中有青稞 2485 亩,小麦 654 亩,豌豆 331 亩,洋芋 60 亩。1978 年,通过农村科技网点建设种子基地 1.9288 万亩。1984 年,全县有 17 个乡建立起良种生产基地 7798 亩。1989 年,全县调整、巩固种子基地 1.5846 万亩,其中青稞 9546 亩,小麦 413 亩,豌豆 4563 亩,洋芋 1342 亩。1990 年,建立麦类作物良种基地 1.119 万亩。通过种子基地的充实、调整、扩建以及对种子的提纯复壮等一系列措施,使主要良种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与此同步进行的科学播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始落后播种方式。从 1965 年起,州农科所拖坝基点开展了科学播种试验,进行以播种时间、播种量、播种方式为主要课题的试验研究。研究对象为青稞、麦类、洋芋、豌豆四个类型的粮食作物。推广应用较好的是播种方式,逐步以条播替代了过去的撒播。1982 年,全县机条播面积曾达到 7.6765 万亩,占粮食作物播面的 58%。

加强病虫害防治,保护粮食作物生长发育,达到增产增收目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部门长期以来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解放以来,经过一系列防治病虫害的宣传教育,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消除了杀虫伤生害命的迷信思想。农业合作化以来,广大农村普遍采取了秋翻、春耕、灌水的办法,取得了既是耕作措施,同时又冻杀或引诱天敌以消灭庄稼害虫的防治效果。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大力推广使用赛力散、西力生、二硝散拌种,以防治麦类作物的黑穗病;用各种剂型的“666”、DDT 等汞氯制剂毒土,以防治地下害虫。1979 年到 1980 年,完成了甘孜县主要农作物病虫害普查工作。此间共采集病虫害标本 10 余类,各目昆虫标本 279 种。基本上摸清了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种类,区域分布,危害程度以及农作物天敌种类。重点进行了冬麦潜叶蝇生活史研究。1982 年,国务院为保护人民健康禁用氯制剂的规定颁布以后,甘孜县于 1984 年开始

引进新农药。当年推广辛硫磷等农药毒土 1.549 万亩；多菌灵、粉锈灵拌种 8900 亩；喷撒乐果乳剂防治蚜虫 4824 亩。到 1990 年，已先后推广使用的农药有敌百虫、敌敌畏、乐果、“1605”、硫酸铜、多菌灵、粉锈灵、辛硫磷共 8 种。

## 六、粮食生产基地建设

根据甘孜县在全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粮食生产资源条件，适宜建立商品粮基地和青稞商品粮生产基地。

1983 年，州科委、州农贸办、州农牧局联合在甘孜县拖坝区州农科所攻关点开展了青稞高产栽培协作攻关试验，为发展粮食生产提供了技术措施和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1984 年，县委提出了《发挥自然优势，发展商品粮生产的建议计划》，《计划》提出了“七五”期间发展粮食生产的设想，受到省、州各级领导的重视。

1987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甘孜县列入“七五”期间全省重点分期扶持的 82 个粮食生产基地县之中。1987 年至 1990 年 4 年间共拨出专项发展资金 108 万元，另外，省、州两级财政先后拨款 50 万元，以上两项资金共 158 万元直接用于发展粮食生产。成立了甘孜县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并建立了专门办事机构。

1990 年，甘孜县被列为青稞商品粮生产基地县，纳入“八五”计划攻关项目。

为建设和发展省粮生产基地县和青稞商品粮基地县，1987 年至 1990 年，大力推广了农业增产技术措施 10 多项，主要包括秋施底肥、深耕细作、尿素基施、配施化肥、良种推广、病虫害防治等。特别是推广康青 3 号良种效果显著，4 年来推广种植 2.93 万亩，产量 88.162 万斤。培训农村技术骨干 1881 人次，农牧区经营管理骨

千 220 人次。建立了 7 个乡农技站,修建了县种子站仓库、技术检验室、收购门市,建立了以乡农技站为重点的专业植保队伍。国家补贴农民添制了手扶式拖拉机 40 台,畜力播种机 250 台,双轮双铧犁 50 部,8 寸步犁 270 部等农用机械。

粮食生产基地建设使粮食较大幅度地增产。1988 年全县粮食总产 3943.5 万斤,比 1987 年的 3162 万斤,增 781.5 万斤,增 24.71%,平均亩产增 19.83%。其中青稞产量 2327.4 万斤,比 1987 年的 1863.4 万斤,增 24.9%,平均亩产增 16.9%。1990 年在粮食作物播面比 1989 年减少 3411 亩的情况下,总产量达 3928.2 万斤,平均亩产 298 斤,其中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分别比 1987 年增 24.23%和 23.13%。青稞播面虽然比 1987 年减少 2943 亩,总产量仍然达到 2293.6 万斤,平均亩产 316 斤,总产量比 1987 年增 23.09%,平均亩产量比 1987 年增 21.5%。

## 七、扶持生产

### (一)无偿发放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发展粮食生产,逐步改变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1952 年至 1974 年的 23 年时间里,向广大农民群众无偿发放了大量生产工具,小到镰刀锄头,大到六行播种机共 22 个品种 29.845 万件。合作化以前直接发放到户的共 1.8647 万户 2.8188 万件,合作化以后到公社化时期,还无偿提供了联合收割机、履带式拖拉机等大型农用机械若干台套。

为了解决农民因缺种子、缺口粮,无力春种秋收的实际问题,还向广大农民群众无偿发放了大量种子、口粮。据 1952 年到 1984 年的统计结果,33 年中,共无偿发放种子 193.9613 万斤,口粮 541.7634 万斤。

对农村中因各种自然灾害,老弱病残等原因造成的困难,党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物资,广泛开展了社会救济,救济物资有种子、口粮、茶、盐、农药、化肥等。据1954年到1990年间16个年份的不完全统计,各种救济物资折款943万元。

农田水利建设、抢险救灾等各种投入都需要大量资金。由于甘孜县地方财政十分困难,投入粮食生产的资金也就十分有限,大部份资金要靠上级财政扶持。为了给粮食生产创造条件,逐步改善和提高农业的基础地位,各级财政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以发展农业。例如,1954年提供防洪经费1.85万元;1958年至1961年提供农田水利事业费13.7196万元;1967年至1977年四个年份的支农款292.5万元;1986年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3万元、小型农田水利款2.45万元、救灾款3.8万元;1971年至1979年农机化补助款70.897万元。

## (二)有偿借贷

有偿借贷是促进粮食生产的措施之一,也是发展粮食生产的经济投入途径之一。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采取措施,通过农业银行向广大农民发放各种农业贷款。由于从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利息利率远远低于农村民间借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促使农村中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寺庙之间以及民间的各种自由借贷利息利率发生了根本变化,遏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村自由借贷利息利率逐渐降低,由借二还三减到借三还四,少数已减少到借四还五。据1952年到1960年9个年份的统计,农业银行向农民贷放了种子145.1277万斤,口粮49.6876万斤、牲畜1172头,农具15万元,副业2.2万元。

## (三)调减农业税

民国时期,广大农民承受着双重农业税。一方面,按照国民党

政府《粮税差役章程》规定交纳农业税，税额以种子数量计算：上等地一斗征收一斗二升，中等地一斗征收一斗，下等地一斗征收八升。收税额大约为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一，并规定交纳青稞、小麦，也可折钱交纳。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允许土司头人、寺庙征收定额的粮税贡赋，其收税额约为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以上两项农业税赋占去农民粮食收入的 20%

解放以后，对农业税进行了多次调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实行了农业税折合人民币，改征购粮食为交纳代金等较为灵活的征购办法。

1952 年，西康省人民政府关于农业税减免办法实施后，当年全县征收公粮 66.5829 万斤，占粮食产量的 6%。

1952 年至 1962 年的 11 年时间里，农业税额低于民国时期 10% 以上，是解放以来农业税第一次重大调减。

1963 年，根据甘孜州委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精神调减农业税以后，当年全县公粮征购任务为 29.6859 万斤，占当年集体生产粮食总产量的 2.21%，同时还取消和压缩了提留粮、饲料粮、机动粮。从而使农村集体口粮留量有所增加。

1971 年，实行农业税一定 3 年不变。调整后，当年农业税为 105.8 万斤，占粮食总量 2384 万斤的 4.4%。1972 年实征公粮 104.194 万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 2450 万斤的 4.3%。

1979 年，甘孜县委调整农业生产方针后，对农改牧的扎科、泥科两乡免征免购，农业税改牧业税。全县半农半牧区的 35 个生产队产粮 444.0876 万斤，公粮征购任务 14.4107 万斤，改为交代金，减轻了半农半牧区群众的粮食负担。

1980 年 12 月 25 日，甘孜州人民政府下达了 1980 年至 1982 年农业税和粮食征购任务的规定，核定甘孜县 3 年内每年征购公

粮 66.7 万斤，公粮转超购折交代金 16.3 万元，在原来基础上调减了 8.26%。

1981 年，州人民政府〔1981〕73 号文件通知，“甘孜县调减去年安排的公粮超购粮部分 18.7659 万斤，人平负担超过 90 斤的部分 4.6 万斤。”合计调减 23.4459 万斤。同时规定公转超购粮调减后的部分折交代金。

从 1980 年起，全州实行农业税征减三分之一和牧业税减半征收的政策。

1984 年，甘孜县委《关于贯彻中央〔1984〕1 号文件的意见》中规定，从 1984 年起，全县公粮改为按平价折交代金。通过以上调整，征购任务明显小于过去，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以 1984 年为例，绒坝岔区由 103.85 万斤降为 46.4875 万斤，降 55.24%；生康区由 58.58 万斤降为 29.2394 万斤，降 50.1%；雅砻区由 49.79 万斤降为 25.4885 万斤，降 48.8%；甘孜镇由 28.3 万斤降为 9.1463 万斤，降 67.68%；拖坝区由 145.46 万斤降为 60.649 万斤，降 58.31%；东谷区由 14.54 万斤降为 8.9893 万斤，降 38.18%。

1990 年，全县征收农业税代金折青稞 91.316 万斤，占全县粮食总产量 3928.2 万斤的 2.32%。

## 粮食生产效益

### 一、粮食产量

#### （一）总产量

解放前，原始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生产关系，

严重束缚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虽然地域辽阔,适宜耕作的土地较多,但劳动力投入低,耕作粗放,缺肥少种,土地抛荒多,播种面积少,再加上地区高寒、土地贫瘠,一年一熟,致使粮食产量不高,单位面积产量也很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全县粮食作物播面7.3万亩,总产量630万斤,平均亩产86.3斤。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全县粮食总产446.3万斤,人均有粮300斤左右。劳动人民常年不得温饱。

解放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技术不断提高,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生产迅速发展。其间,因民改前后,合作化、公社化、联产计酬、承包到户等各个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村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效益。

1950年至1951年,正值解放初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几千年来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生产水平仍然低下。全县粮食生产总播面不足11万亩,总产量不足1000万斤,平均亩产低于100斤。1950年粮食播面10.32万亩,总产量948万斤,平均亩产92斤。1951年播面10.119万亩,总产量977万斤,平均亩产96.5斤。

1952年至1956年,粮食生产有所增长,粮食作物播面接近12万亩,总产量已超过1500万斤,平均亩产接近150斤。到1957年,粮食总播面已从1952年的10.232万亩增加到11.8274万亩,总产量从1952年的1068万斤增加到1554万斤,平均亩产量从1952年的102斤增加到132斤。年均递增率比较稳定,呈现不断发展的势头。

1958年至1966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极不稳定,甚至有的年份严重下降。1958年,粮食作物播面虽然已经达到12.017万亩,总产量反而下降到914万斤,比1950年的948万斤还低34万斤;

平均亩产仅 76 斤，比 1950 年的 94 斤还低 18 斤。是解放以来粮食生产最低的一年。1959 年，粮食总产量回升到 2402 万斤，平均亩产也回升到 174 斤。但是 1962 年粮食总产量又下跌到 1096 万斤，平均亩产量仅 82 斤。1965 年，经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划小”、“高改初”等一系列政策调整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播种面积增加到 14.1229 万亩，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 2000 万斤大关，实现 2186 万斤。1966 年，粮食总产量又上新台阶，实现 2500 万斤，平均亩产 184 斤，是解放 16 年来的最高年产量。

1967 年至 1976 年“十年动乱”期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基本保持在 14 万亩在右，1967 年播面积为 14.116 万亩，总产量 2405 万斤，平均亩产量 150 斤。1973 年播面积为 13.4429 万亩，比 1967 年减少 6731 亩，总产量首次突破 3000 万斤大关，实现 3158 万斤；平均亩产首次突破 200 斤水平，实现 210 斤。1976 年粮食播面积为 14.0116 万亩，比 1967 年减少 1044 亩，总产量 3401 万斤，比 1967 年增加 996 万斤，平均亩产量 242 斤，比 1967 年增加 92 斤。十年中，除 1969 年总产量曾下跌到 1873 万斤外，粮食生产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势头。

“文革”十年对甘孜县农村冲击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这一阶段由于狠批“农村资本主义道路”、“唯生产力论”以及生搬硬套改土造田等一系列脱离甘孜县实际的“大寨经验”，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干扰和影响。同十年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相衡量，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很慢的。

1977 年至 1981 年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内，甘孜县粮食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1978 年，全县大面积种植肥麦，获得粮食大丰收。这一年，虽然粮食作物播面从 1977 年的 13.991 万亩减少到 12.8829 万亩，粮食总量却首次突破 4000 万斤大关，达到 4076 万

斤；平均亩产首次突破 300 斤，达到 308 斤，人平生产 2412 斤。无论是粮食总产量、平均亩产量还是人平生产量，都是 1950 年至 1990 年 40 年的最好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落实了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家庭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甘孜县农业基础脆弱，粮食生产投入少、产出低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与川内粮食生产的高水平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从 1982 年至 1990 年的 9 年时间里，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 3000 至 4000 万斤之间。1986 年因春旱严重，粮食产量跌落到 3090 万斤，平均亩产 230 斤。其间最高年产量为 1989 年，粮食总产量 39896 万斤，平均亩产 294 斤，人平生产 2190 斤。

## （二）青稞产量

甘孜县藏族群众的饮食结构以青稞糌粑为主要食品，青稞生产在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常年播种面在粮食作物总播面的 60% 以上。这是由于青稞作物生长的适宜条件，决定了人们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全县青稞播种面积 4.4 万亩，占粮食作物总播面的 60.3%，总产量 420 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 63.4%。

1950 年至 1954 年，青稞播面从 6.355 万亩增加到 6.6117 万亩，总产量从 598 万斤增加到 916 万斤。平均亩产从 92 斤增加到 138 斤。1955 年，播种面积上升到 7.673 万亩，总产量上升到 1530 万斤，亩产量上升到 184 斤，是此前的最好水平。但青稞生产起伏波动较大，1958 年，虽然播面达 7.2102 万亩，但总产量却只有 580 万斤，平均亩产 80 斤，低于 1950 年的生产水平。1960 年到 1990 年的 30 年中，青稞作物播面在 5.9 至 8.4 万亩之间。1962 年曾达

到 9.3729 万亩,占粮食作物播面的 69%,但当年青稞总产量只有 760 万斤,平均亩产 82 斤,呈现广种薄收的反常状态,与当年粮食产量全面减产同步下跌。最高年产量为 1989 年,该年青稞播面 7.6426 万亩,居常年播面的中等水平,但总产量却达到 2307.4 万斤,平均亩产 302 斤,比当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高 8 斤。1990 年大面积推广康青 3 号优良品种,播面 7.2767 万亩,总产量 2293.6 万斤,平均亩产 316 斤。显示出了青稞生产有较大的增产潜力。

### (三)小麦产量

小麦是甘孜县人民生活中的搭配食品,生产比重低于青稞、豌豆,居粮食生产的第 3 位。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全县小麦播面 1.4 万亩,占粮食作物播面的 19%;产量 98 万斤,占粮食产量的 15.5%。

1950 年至 1959 年,播种面积从 1.555 万亩增加到 1.7212 万亩;总产量从 82 万斤增加到 245 万斤;平均亩产量从 52 斤增加到 142 斤。1960 年,播种面积迅速上升到 2.34 万亩,总产量 300 万斤,平均亩产量 128 斤。1961 年到 1976 年,小麦生产呈起伏不稳定状况。1968 年,播种面积达到 2.36 万亩,但总产量只有 218 万斤,平均亩产仅 92 斤。此前的 1962 年,播面 1.0998 万亩,总产量仅达到 54 万斤,平均亩产仅 48 斤。1976 年的播种面积虽然只有 2.0734 万亩,总产量却上升到 544 万斤,平均亩产 262 斤,是解放 16 年来的最高年产量。肥麦良种于 1974 年从西藏引进后,1977 年至 1983 年的 7 年时间里,甘孜县大量种植肥麦。播种面积从 1976 年的 2.0734 万亩猛增到 1977 年的 3.4565 万亩,1982 年达到 3.853 万亩;总产量从 1976 年的 544 万斤上升到 1977 年的 1112 万斤。1978 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扩大到 4.1959 万亩,其中肥麦占小麦播种面积的 99.9%,总产量 1650.8 万斤,平均亩产 384 斤。

创下了辉煌纪录。

1984年至1990年，甘孜县小麦生产下滑。1984年小麦播面从1983年的3.5395万亩下降到2.8387万亩，总产量666万斤，平均亩产234.6斤。1989年又下降到1.5633万亩，总产量455万斤，平均亩产292斤。1990年播面回升到1.622万亩，总产量486.6万斤，平均亩产300斤。

#### (四)豌豆产量

甘孜县的土壤结构和气候条件适宜豌豆作物的生长。豌豆作物既是粮食作物又是农民的经济作物，在粮食生产中，豌豆仅次于青稞，占居第二位。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资料，全县豌豆播面1.5万亩，占粮食作物播面的20.6%，总产量112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17.8%。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发展豌豆生产以扶持农村经济方面作了很大努力。1991年办起了县粉丝厂，为搞活市场，促进农村经济，增加群众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

1950年至1952年，甘孜县豌豆作物播面在2万亩以下，总产量低于300万斤。1953年至1963年十年中，播种面积从2.0023万亩上升到3.0928万亩，但这一阶段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上升幅度不大，总产量最高的1955年也仅有443.06万斤，平均亩产量最高的1954年也只198斤。1964年，豌豆播面迅速上升到4.3056万亩，到1975年的12年时间里，生产量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只是1969年有所下降，该年播面3.1482万亩，产量568万斤。平均亩产量180斤。1966年的播面曾达到5.0231万亩，占当年粮食总播面的38%，是从解放至1990年以来播种面积最大的一年。1976年以后，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提高。其间，1989年播面4.0012万亩，总产量1071.4万斤，平均亩

产 268 斤,是历史最好水平。今后随着豌豆市场销路逐渐拓宽,生产量有可能回升。

### (五)洋芋产量

洋芋集粮食作物、蔬菜作物、经济作物于一体,是甘孜县 4 大农作物之一,常年播种面积一般在 2000 至 4000 亩之间。解放 40 多年来,洋芋种植面积和产量不很稳定,与洋芋种子质量和抗病能力以及自然灾害有一定关系。

1950 年播种面积 3410 亩,总产量 32 万斤,平均亩产 94 斤。1990 年播种面积 4307 亩,总产量 154.4 万斤,平均亩产 358 斤,增产幅度较大。

最高年产量是 1987 年,播种面积 3457 亩,总产量 240.3 万斤,平均亩产量达 695 斤。最低年产量是 1962 年,播种面积 1029 亩,总产 4 万斤,平均亩产 38 斤,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减产。

1985 年以后,随着蔬菜作物价格不断上扬,洋芋生产量大幅度上升,播种量常年维持在 4000 亩以上,总产量一般都在 140 万斤以上,亩产量在 300 斤上下徘徊。

洋芋种子退化严重,单位面积产量较低,如果按四比一折纯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不超过 100 斤。如何改良品种,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任重道远。

## 二、粮食产值

甘孜县是农业县,粮食生产占主要地位。但是甘孜县土地贫瘠,资源贫乏,冬季严寒,海拔高等诸因素,制约着粮食生产。再加上粮食价值地位的影响,粮食产值远远低于牧业。解放 40 多年来,粮食生产经历了 5 个阶段,产值和地位以这 5 个阶段作比较较为合理。

第一阶段,从1950年到1959年。十年中,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四反运动”,取得了民主改革的决定性胜利,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3.8%,年均递增4.1%。粮食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分别增长153.4%和85%,平均年递增分别为15.3%和8.5%。

1950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县域工业是一片空白,全县农业总产值从769万元增长到833万元。粮食产值从134万元增加到139万元。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7.43~17.89%。

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从892万元增长到1233万元;粮食产值从183万元增长到212万元,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7.19~20.52%。工业开始起步。粮食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5.7~18.89%。

1958年到1959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农业总产值分别为1233万元和855万元,粮食产值分别为158万元和126万元,粮食产值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14.74%和24.47%。

这一阶段产值变化有一定起伏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发展基本顺利,增长相对平稳。

第二阶段,从1960年到1962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这阶段由于盲目冒进,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全县遭到建国以来第一次严重挫折,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急剧下降。1962年与1959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下降39.9%,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40.8%,粮食总产值下降54.4%。全县农村缺粮4741户1.894万人,占入社人数的76%,缺粮数达226.638万斤,平均每人缺粮119.7斤。处于3年严重困难时期。

第二阶段,从1963年到1966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这一阶段,由于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得到纠正,全县农业生产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4年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5.8%,平均每年增长11.44%。其中,1965年粮食总产值实现32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6.42%,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5.94%。产值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实现了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农民生活明显好转。

第四阶段,从1967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其间经历了“三五”、“四五”两个五年计划。“十年动乱”中,粮食生产的总趋势是生产平稳,增长速度缓慢。粮食产值在260万元至472万元之间起伏。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0.47~34.3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01~32.71%。1973年引种冬小麦成功后,粮食产量迅速上升,1976年达到3410万斤,比1966年增长36.4%,为1950年的359%。农业总产值1397万元,比1966年的1211万元增23%,工农业总产值1484万元,比1966年的1165万元增28.7%。

第五阶段,从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到1990年,经历了“五五”、“六五”、“七五”三个五年计划,农村生产关系也经历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核算、定额管理到联产计酬、包干到户一系列变革,甘孜县粮食生产的产量、产值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到不断深入,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县域工业不断壮大,粮食产值和地位也随着农、工、牧、副、粮各类产品价格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农业总产值在“五五”期间年均递减0.72%，“六五”期间年均递增10.2%，“七五”期间年均递减0.58%。粮食产值从1976年的472万元上升到1990年的726万元。15年间,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5.29~35.74%;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1.98~32.97%(均为1980年不变价)。

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527万元,为1950年的329%。其中,农、牧、林、副产值达2059万元,为1950年的268%。粮食产值726万元,为1950年的542%,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73%;占农业总产值的35.26%,人平纯收入达482元,为1982年的398%,1975年的435%,1963年的916%。

# 忆炉霍大地震

王宜之

1973年2月6日下午6点45分，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发生了7.9级强烈地震，十几秒钟之内：县城的房屋99%倒塌，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的损失。

震前几分钟，我独自一人在宿舍睡觉后刚醒不久，突然烈士公墓方向几声巨响，仿佛天崩地裂，起身往窗外看，满天黄尘弥漫，立即意识到发生地震，顾不上穿衣服鞋子，慌忙推开窗子跳出。听到县委宿舍大人呼救、小人啼哭，急忙跑去救出被困在废墟中的几个大人和孩子后，回邮局又听到杨××呼救声，与几个武警中队战士奋力抢救，救出了受伤的杨××，挖出他女儿的遗体，就急忙回到邮局。看到自己亲人无恙，又投入抢救被埋在废墟里的同志和挖掘遇难者的遗体的工作。

当时我在炉霍邮政局作邮政管理员工作（邮、电两家分设），除本职工作外，还兼邮件封发、档案查询等工作。由于当天炉霍到甘孜的过境邮车已发班，色达返康定的邮车当天未住宿炉霍，所以应发班的邮件都发走了，剩下少数邮件，经过全局职工奋力抢救，邮件、档案都从残垣断壁中的破烂柜里全部抢出，没有受一点损失。

地震当天晚上，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倒塌的房屋中拿出一些被褥给小孩、伤员、妇女在露天遮露气避寒，未受伤的职工、家属大都围着火堆过夜。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滴水成冰，冻土如铁，炉霍二月的寒冬，在室外过夜，其滋味是可想而知的。震后受伤的伤员没有药，遇难的遗体停放在露天空地上，哭声、呻吟声、叹

息声在各个角落时起时落。就这样坐到东方发白。

地震后电信全部遭到破坏。几天后才听说这次地震灾情惨重。从离城 30 公里的仁达乡就开始大面积倒塌房屋和死、伤人、畜，沿鲜水河直上至朱倭、充古乡乃至甘孜的东谷区，直径 90 余公里，纵 10 余公里都是重灾区。全县倒塌房屋 8700 余幢，伤亡人数 5 千余人，死亡的牲畜和损失的财产，更无法计算。电信局职工死 1 人，伤 5 人；邮政局职工家属死 7 人，伤 4 人。

震后，党和政府都极为关怀。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革委立即发来慰问电，州委、州革委、州邮政、电信局闻讯后立即派来救灾工作团，调拨救援器材。中央军委立即派来中国人民解放军 7854 部队，昼夜兼程赶赴灾区，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同时派出空军运载急需药品和急需物质救灾。灾后不久成立了以成都军区谢副司令员为首的“炉霍抗震救灾指挥部”，救灾物品、油毡、黄席、棉絮、棉毯、棉布、棉衣、锅、碗、农具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灾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派出以沙风部长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北京、上海、昆明、重庆、成都、昌都等省市派来军、地医院，医疗队、组达 53 个，免费为受伤的群众治疗。使全县藏汉同胞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一方受灾，八方支援”，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震后，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队，解放军指战员，医护人员，工人等大批进入灾区帮助抗震救灾，这是好事，但邮电业务量也因此大幅度增长。加上春节前一部分邮电职工回内地探亲未归，在家邮电职工受伤的多，业务工作的重担就落在剩下职工的肩上。从祖国各地寄来成千上万的慰问信、救灾款、包裹和大量报刊，大量的来往电报、电话，任务繁重。邮电职工不顾疲劳，日夜奋战。从废墟中挖出、安埋了自己亲人的遗体，又投入了抗震救灾的战斗。一面要搭

生产、生活的简易棚，一面还要工作，疲倦了找个地方打个盹，饿了啃几口馍，喝几口水。

炉霍县全县 3 万多名群众、职工、干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帮助下，在省、州和“抗指”的直接领导下，在本州各兄弟县、兄弟同胞的大力支持下，在英雄的解放军的努力帮助下，上下一心认真贯彻中央“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 16 字方针和省委、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的“七点指示”，以震不倒、难不住的英雄气概，同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县农牧业和邮电建设都恢复和超过了原有的水平，初具规模的崭新的炉霍新城也建立起来了。

炉霍大地震离现在已过去 20 多年了。死难的同志虽然长眠在炉霍的土地上，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使我永远难忘。“何处不可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他们把一切都献给了炉霍的民族建设事业。

我永远也忘不了炉霍在苦难的日子里党中央、国务院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帮助，也忘不了千里之外奔赴灾区的白衣战士、修路工人，特别是人民子弟兵 7854 部队和其他部队，他们想灾区人民所想，急灾区人民所急，奋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不怕苦、不怕累，有的甚至为救灾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虾拉沱临时空投场牺牲战士两名），直到 5 月中旬完成春耕工作，部队才撤回原地（崇庆）。炉霍的人民、炉霍的土地永远忘不了他们……。

---

注：伤亡人数、房屋倒塌数字根据《炉霍史志资料》初稿第九期。

# 甘孜地区森林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

刘建邦

甘孜林区是四川西部林区的主体,是四川省重要木材生产基地之一,是长江上游防护林区的水源涵养林。林业是甘孜州的支柱产业。“八五”期全州民族工业虽有很大发展,但森林工业在整个民族工业中的比重并没有降低,仍保持在60%左右,是全州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道孚、炉霍、新龙等县林业工业的总产值已分别占该县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林业在全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仍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它产业仍无法替代。因此,总结森林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掌握其发展规律,对今后甘孜州森林工业的发展与建设有其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 一、森林资源

甘孜藏族自治州,辖18个县,解放前为西康省的康属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但由于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社会不安定,林业工作基本没有开展,森林资源不清,从未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勘测,历史上纵有一些记载,也是粗略的估计数字,不足为凭;且森林火灾频繁,资源变迁很大。

民国十九年(1930年),我国著名林学家郑万钧教授考察雅江、泸定、九龙、丹巴、康定、道孚等6县森林植被,对松杉植物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为他在建国后主编《中国植物志》裸子植物

部份打下了基础；当时并受政界一些人士以调查该区森林见嘱，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也只作一些概况调查。郑教授在其《西康东部森林之初步观察》的序言中写道：“各县森林之广袤，林木之巨大，为内地所罕见，殊足令人惊羨。惜因交通不便未尽利用，此不能不引为痛惜者也。”“森林水平分布，东起飞越岭，西止雅江县，南迄九龙，北达丹巴，除康定附近，多为童山外，其它各县，茂密的森林，所在多有，各县森林之面积，约占土地40%”。民国二十年（1931年），冯云仙《西康特区十四县调查表》，曾叙及西康森林资源概况，文字叙述都语焉不详。如“道孚森林约占全县十分之四，多生于山阴处，枞极多，松、柏、桦次之。”“新龙，遍地皆木，故林业甚有可为，自雅砻江面上起，到海拔3600米处，山岩壁立未耕种之部，莫非森林。”1940年，金陵大学朱惠芳教授率同左景郁、孟传楼、吴中伦（现任林业部总工程师、中科院院士）等在九龙洪坝林区实际调查7月之久，著有《西康洪坝之森林》一书。其序言中写道：“西康森林为我国西部大林区之一，率多分布于青衣、金沙、雅砻及大渡河诸流域，诚为我国今日至可贵之森林。”并测定洪坝林区面积为364.48平方市里，蓄积量为437.7万立方米，绘制有森林基本图、解析木图表等。这是老一辈林学家的艰辛成果，对今天开发洪坝林区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1958—1984年，四川省第一、第二森林勘察大队，参与甘孜州开展的各类森林资源调查、总体设计、专业调查等工作，计3500多人次，为丹巴、康定、道孚、翁达、新龙、雅江、白玉等县的林区开发、企业建立提供了设计资料和资源数据。

1976年完成了以县为总体的全州森林一类清查，称为“四五”清查。主要成果：

林业用地：418.8万公顷，占全州总面积28.8%。

有林地:137.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9.44%。

活立木蓄积:3.7亿立方米。

优势树种:6冷3云1落1油。

1984年,完成了以省为总体的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工作。全州17个县7个州属采伐企业,抽调技术干部300余人,耗资600余万元,在省林业设计院和森勘二大队的参与和指导下,经过7年的内外业工作,于1993年调查资料汇总结束,验收合格。

林业用地:436.59万公顷。

有林地:153.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0%,其中丹巴县为36.3%,泸定县为30.6%,石渠、色达分别为0.3%和0.6%。

活立木蓄积:35792.3万立方米。

自1958年甘孜林区开发以来,一面进行采伐利用,一面加强营林更新工作,成立营林专业机构,建立专业生产队伍,从事采种、育苗、更新和幼林抚育工作,试验成功大棚育苗、“高更技术”,并在全州推广应用。1995年全州进行了人工幼林普查,更新造林成效总面积为:89.3686万亩,蓄积为17.8168万立方米,更新跟上率100%。即是说森工采伐后的迹地,除目前生产合理占用5.69万亩外,全部进行了人工更新,恢复了森林。这一成绩确是来之不易,广大林业职工经过30多年的努力,用事实回答了那些对林业建设很不理解的人认为森工企业“只砍不造”的流言蜚语。

## 二、民国时期的林业生产

民国时期,西康东部地区森林的开发利用,无国有企业经营,纯属资本家或当地豪绅集资开发,组织私人木业公司,掠夺资源,

肥私利已。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泸定县参议长陈德滋,组织裕康伐木公司,在泸定县三区新兴乡雅家埂设立办事处,集中采伐雅加埂林区木材,并在康定老陕街137号设点经营木材销售业务,公司由十大股东组成,每股投资大米一百石(每石450斤),初有民工数十人进行伐木、鐮板、搬运,最盛时期民工增加到四五百人,大都来自成都、邛崃、雅安等地。木材运输除人力搬运外,还用牦牛、骡子驮运到康定销售。采伐的树种主要是两河口一带的云杉、铁杉,每天有50台平锯生产装板、寸板、枋料、椽子,同时还生产檩子、楼欠、棺木等。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停办,历时16年。据1935—1939五年间的统计,采伐木材15万立方尺。

民国三十一年(1942),资本家刘航琛(泸县人,工商金融界人士,1927年任川康商业平民银行董事长,后任四川省财政厅长,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集资800万元与汉源县羊仁安组织益和木业有限公司,砍伐桂花坪、湾东、洪坝等处森林,1943年生产原木3000件,经营3年后,因资金缺乏停办。所采木材多数运成都、乐山、西昌出售,少数则丢弃林间,任其腐朽。特别是直径一尺五(50cm)以上的圆柱及见方一尺以上长一丈二尺之木墩,皆未运出而弃之沟壑。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泸定县陈德滋等人又在雨洒坪、小王岗坪办康庄木厂,由西康省参议员山栋任总经理,康定专署专员赖执中任董事长,雇用来自河道七场(今挖角坝)、新民、安顺场、西油房、农场(今石棉)等地农民600余人进行采伐、漂运。历时3年,大部分木材流送到乐山出售。后因越界采伐,被汉源县周海清控告到西康省政府而停办。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邱述铃《九龙全境视察记》记载:洪

坝大沙木坪，长 40 里，宽 10 余里，有杉木（注：指云、冷杉）30 万株以上，直径大者有四尺。1938 年安顺场赖执中以烂枪一支强售给乡民，强占此片森林，谎言奉命砍伐枕木，树尽还山，并强迫当地群众修路运输木材，计砍树木 1000 余株。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交通部、农林部拟筹建林木公司，以保育森林开发木业为宗旨，组织西南林区交通用材勘察团，川康队有柯病凡、朱惠芳、陈绍珩等林学家参加。（川康勘察团 1942 年 8 月 15 日从乐山出发，10 月 5 日抵九龙之冰东，6 日到达洪坝，7 日至大杉木坪……）在其调查报告中称：“洪坝杉木坪为赖执中占有，洪坝各支沟森林为赖执中等私有。”洪坝森林后又经福中木业公司采伐，经营 4 年，因缺乏伐木器具而停止，所伐木材约 10 万立方米，多数丢弃，少数原条及枋墩运往乐山出售。

生产工人，按件给资。采伐、造材，斧锯并用。砍伐直径 1 尺以下的树木，用斧子于四周砍成圆锥形直至将树木砍倒，木材浪费很大；砍伐直径 1 尺以上 2 尺以下的树木，先将其树放倒之方向砍一缺口，再于背面稍下处继续砍伐，直到砍倒为止；直径 2 尺以上的树木，则多用锯伐，工人为了便于操作，站着砍伐，留下伐桩高达 1 米，资源浪费严重。

### 三、建立国营采伐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木材。民主改革结束后，1958 年建立康定、丹巴森林工业局；1966 年建立翁达、炉霍林业局；到 1995 年止，全州建成州属采伐企业 7 个，地方小型采伐企业 22 个。为国家提供木材 2000 多万立方米，实现产值 25

亿元,上交税利6亿元,为支援国家建设,繁荣甘孜州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82年省森工企业下放给州管理的14年间,实现税利两亿多元。1995年全州林业总产值达3.5亿元,占全州工农业总产值的25.68%;林业工业产值2.4亿元,占全州工业总产值的41.38%;林业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65%。

林业促进地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是举足轻重的。到1995年底止,州属林业企业共修建林区公路3000多公里,大中型桥梁35座,水电站40余座,装机容量一万多千瓦,兴办林区中小学23所,医院、卫生所36个,为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一)、州属森工企业

#### 1、丹巴林业局

丹巴林业局建于1958年,局址在丹巴县<sup>①</sup>。原属省林业厅领导。1983年5月下放给甘孜州,更名为甘孜州丹巴林业局。建局后先后建成大桑、磨子沟、边尔、党岭、丹东、沙冲等六个林场(伐木场),以及二瓦槽流送工队和林业管理站。

职工来源:建局初期从黑水森工局调来200名工人,在射洪县农村招收合同制工人1229人,后又从道孚铁矿、道孚森工局、小金森工局、卧龙森工局调来职工400余人,以及从三台县招收固定工人120人,巴中县招收亦工亦农制工人80人;1971年丹巴营林处与森工局合并,职工人数达3200余人。由于资源枯竭,80年代以来,大部职工调出、转产、退休,到1990年全局职工为1139人。

丹巴森工局从1958—1995年的37年间,共生产木材23万多立方米,最高年产量是1974年,完成交材量128034立方米,最低年产量是1993年,仅生产木材23327立方米。

主要实物工程量:公路105.4公里,渠道99.8公里,缆车道

7.585 公里,平车道 16.5 公里,索道 9.35 公里/116 条,河道整治 100 公里,小水电站 286 千瓦/5 座,房建 55961 平方米,电话通信线路 107.7 公里,汽车 49 辆,推土机 5 台,检修设备 12 台。

营林生产:采种育苗工作始于 1959 年,建成大桑、磨子沟、边尔、党岭等 9 个苗圃,可供育苗面积 303 亩,出圃苗木 7748 万株,到 1994 年迹地更新有成效面积 10.4 万余亩,更新跟上率 100%,30 多年来所采伐的森林,已全部恢复,幼林已成长起来,早期更新的云、冷杉幼林,平均高达 10 米、胸径 20 厘米。边尔苗圃 1966 年塑料温室育苗率先获得成功,为后来塑料温室育苗在全州推广和在四川以及西南、西北有关省、区推广提供了技术资料。

## 2、康定森工局

康定森工局建于 1958 年,局址在康定县姑咱。局办公楼、职工宿舍、医院等,是在一片乱石、杂草荒芜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在的州卫校、州林科所、鱼通区人民政府、电影院等都是在原森工局的基础上扩建、改建而成。森工局的建立为姑咱新市镇的形成和繁华奠定了雏形。全局职工 1600 余人,主要来自石棉、宝兴森工局,属四川省林业局领导。经营范围包括康定、泸定两县国有林区。在康定县境内有孔泥坝、门坝、龙玉、下索、金汤、刮刀沟等 6 个伐区;在泸定有磨西、雅加埂、湾东 3 个伐区。正式开发的只有龙玉伐区(311 场)、下索伐区(312 场)、雅加埂伐区(313 场)。

1971 年因开发林区森林资源枯竭,停止了木材生产;其它林区因交通、投资以及林区分散等因素,一时不能开发,经省决定撤销康定森工局建制,保留康定营林处,继续进行采种、育苗、迹地更新、幼林抚育和次生林改造等工作。

康定森工局从建立到撤销经历 13 年,完成原木生产 588626 立方米,总产值 2283 万元,完成税金总额 8 万元。

1980年,省计经委决定:康定营林处撤销,职工调道孚林业局新建甲斯孔林场。所属林区森林、林地、人工幼林全部移交给康定县林业局经营管理。

1979年,全省森林更新普查:康定林业局采伐迹地面积59951亩,更新有成效面积57978亩,更新跟上率96.7%,幼林长得郁郁葱葱,采伐后的森林已经得到恢复。

### 3、翁达林业局

翁达森林工业局筹建于1965年,初期有职工400余人,大部来自宝兴森工局。局址在色达县翁达沟口,属四川省林业厅领导。后又从三台县招工500名,巴中县招收亦工亦农工人500名,并先后从丹巴、石棉、马尔康、观音桥、凉北、炉霍、康定等森工局调来部分职工,人数达2215人。1982年下放给甘孜州领导。1984年因资源枯竭,大部份职工调白玉林区筹建白玉林业局,将翁达林业局改为经营林场,从事少量木材生产,主要任务是营林更新工作。

该林区属高原丘陵区,气候恶劣,林木生长缓慢,主要树种云、冷杉分布在海拔3000—3900米之间,从建局到1983年撤销建制止,18年间建成河西、明达、吉格、绒科、磨子沟等5个林场,生产木材208万立方米,上缴税利2250万元。

翁达林区地处色达草原,森林生态极为脆弱,森林采伐后更新十分困难。尤其是河西林场,海拔3800米以上,1975年采伐结束后,有采伐迹地1.4万余亩,更新后又经多次重更补植,森林植被仍无法恢复,水土流失严重,生草化程度加深,森林向高山草甸方向退化,有的已沦为牧场。应吸取其教训,这样的高海拔草原森林,不宜实行采伐作业,应规划为草原防护林。采伐后在更新上的投入和生态损失超过了采伐木材的经济效益,得不偿失。

### 4、炉霍林业局

1966年8月成立四川省炉霍林区建设指挥部,地址在鲜水河畔的炉霍县城。1969年投产,命名为炉霍森工局,属四川省林业厅领导。1971年更名为炉霍林业局,1982年下放给甘孜州管理,又更名为甘孜州炉霍林业局。

炉霍林业局的经营范围为雅砻江支流鲜水河林区,除炉霍县境内林区外,还包括道孚县的约维林区。全林区由朱倭、将达、珍都、罗柯马、日都、仁达、宗墨、约维等林区组成。经过25年的开发,截至1990年止,已建成红日、泥巴沟、日科沟、下罗科马等5个林场,年生产能力12万立方米,截至1990年为国家提供商品材216.6万立方米,产值1.3亿多元,完成林区公路建设204.5公里,桥梁6座,电站3座(1100千瓦),上交税利4100余万元。

#### 5、道孚林业局

道孚林业局筹建于1958年,1962年困难时期下马,只留各卡林场负责处理未运出的木材和育苗更新工作。1971年再次上马,局址在道孚县城关,属四川省林业厅领导。职工主要来自康定森工局,并由原康定森工局革委会正副主任行使局领导职权。1982年道孚林业局下放给甘孜州领导,更名为甘孜州道孚林业局。

道孚林业局属雅砻江流域上游支流鲜水河林区。经营范围除道孚林区外,还有新龙县、乾宁县(现已与道孚县合并)部分林区。主要由麻孜、甲斯孔、木茹、各卡、扎宗寺、瓦多、扎坝等林区组成。年生产木材8.8万立方米,到1990年累计完成木材生产206万立方米,产值1.04亿元。全局有林业职工2753人,其中干部414人。退休人员和抚恤人员1129人,营业外支出负担重。

#### 6、新龙林业局

新龙林业局建于1972年,初期仅有职工300人,局址在大盖区(上占),后迁到离县城25公里的博孜乡朱倭,属四川省林业厅

领导,1982年下放给甘孜州领导。

新龙林业局区划范围,南从鲜水河与雅砻江汇合处起,北至甘孜县与新龙县交界处的石门坎的雅砻江东西两岸的大小支流。雅砻江流经林区 255 公里,木材漂流方便。

1990 年有职工 2722 人,其中干部 272 人,已离退休和抚恤人员 1247 人。经过 20 多年的开发建设,已建成仁达、大盖、切衣、泽西、甲拉西、博美、龙拉西、霞坝等 8 个生产林场。雄龙西、绕鲁、君坝等 3 个林场已规划理塘县和新龙县经营。

新龙局累计完成国家建设投资 6790 万元,修建林区公路 453 公里,建设水电站 4 座,总装机容量 770 千瓦。到 1990 年止,完成木材生产 228 万立方米,产值 1.48 亿元,完成税利 7170 万元。

#### 7、力邱河林业局

力邱河林业局筹建于 1976 年,局址在康定县营官区呷巴,命名为康定呷巴林场,属甘孜州领导。1981 年扩建,改为力邱河林业局。

该局位于雅砻江支流力邱河营九公路 9 公里处,经营区北接道孚,南界九龙,西连雅江。1980 年州自筹资金上 400 工人,在呷巴等林区进行采伐,年生产木材 3 万立方米。

该局分两级管理,建有 101(九龙沟)、102(未固定)、103(桂花桥)、104(苦西龙)、105(沙德)等 5 个直属队。初期,职工来自州公路工程支队、州属雨洒坪林场;1983 年又从丹巴、道孚林业局调入职工 400 余人,到 1990 年有职工 543 人,其中干部 164 人。有林区公路 164 公里,完成木材生产 20 万立方米,工业总产值 2176 万元,上交税利 389.7 万元。

#### 8、白玉林业局

白玉林业局是 1983 年开始筹建,1985 年投产,初期主要是采

伐利用麻绒林区的火烧木。局址设在县城南面 25 公里的欧曲河右岸,属甘孜州领导。

白玉林业局施业区在金沙江中、上游地段,建设规模为年产 12 万立方米,其中上调 10.2 万立方米,总投资控制在 6000 万元以内。

经营范围主要是赠科、拉龙、先锋、麻绒、绒盖、盖玉等 6 个国有林区,用材林蓄积量 1814 万立方米,经济出材量 1051 万立方米。到 1990 年止,白玉林业局已形成年产 4.3 万立方米的综合生产能力,已完成木材生产 20 万立方米,实现工业总产值 1720 万元,实现税利 754.6 万元。由于长途反向运输(白玉林区运到新龙水运交材点往返 380 公里),木材生产单位成本达 165.65 元。1993 年金沙江(甘孜州段)首次木材试漂成功后,木材成本有所降低(白玉局在白玉县金沙江边与云南省金沙江林产品公司对检对交下河试漂木 21000 立方米,共 56000 多件。3 月初(利用枯水季节)开始赶漂,3 月 18 日到 4 月底全部顺利通过巴塘县竹巴笼大桥,6 月底到达金沙江畔的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

几年来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2129.08 万元,修建公路 102.4 公里,桥 5 座,100 千瓦电站 2 座,购置汽车 50 台,房建 23299 平方米。

## (二)、县属小型采伐企业

小型采伐企业是区别州属重点森工企业而言,主要由县林业局领导的伐木场对县境内的国有林、集体林进行木材生产,名称不一样,有的叫伐木场,有的叫林产公司,有的叫综合林场,有的叫林工商联合公司。“七五”期间,雅江、九龙等小型采伐企业,由州属森工企业调入部分职工建立了固定的采伐、更新专业队伍。

甘孜州最早的小型采伐企业是泸定县雨洒坪林场,1974 年有

职工 330 人,年生产木材 0.5 万立方米。80 年代新建的各县伐木场,基本没有固定工人,只有少数管理人员组织当地农牧民做临时工或进入林区的合同工进行生产,因此生产成本较低,管理粗放,对采伐、清林、更新等无严格的技术要求。直到 1985 年以后,小型采伐企业的采伐管理、森林更新才得到加强。

到 1990 年甘孜州的小型采伐企业已由 1985 年的 16 个发展到 22 个,每县有 1—2 个小型采伐企业,职工近 3000 余人,其中已有固定职工 1600 余人,年生产木材 49.6 万立方米,为全州木材总产量的 54.5%,有运材汽车 69 辆,集材拖拉机 4 台,手扶式拖拉机 16 台、绞盘机 13 台,架空索道 4 条,修建运材公路 972 公里。

#### 1、年产 5 万立方米以上的县林场

县属采伐企业年产木材 5 万立方米以上的有雅江、道孚、炉霍、新龙 4 县的采伐企业。1990 年 4 县共产木材 23.5 万立方米,占非重点企业的 47.4%,1991—1994 年上述 4 县共生产 926229 立方米,平均每县年生产木材 57889 立方米。其中道孚县 1993 年生产 81495 立方米,超过了力邱河、炉霍、白玉、丹巴等州属森工企业木材产量。

#### 2、年产木材 2 万—4.9 万立方米的县林场

1990 年年产木材 2—4.9 万立方米的县林场有康定、泸定、九龙、理塘、巴塘等 5 个。九龙县有两个县林场,即鸡丑林场和洪坝林场。1990 年年生产木材 48352 立方米,工业总产值 1294 万元。1991—1994 年,生产木材 158584 立方米,年均生产 39646 立方米。康定县林场,原建在甲根坝,力邱河林业局成立后,1985 年迁到金汤区,开发铜林沟林区,1990 年生产木材 23486 立方米,工业总产值 665 万元。1991—1994 年,共生产木材 107664 立方米,

年均 26916 立方米,相当于州属丹巴林业局的木材生产量。理塘县林场,1990 年以后,木材生产上升,1991—1994 年共生产木材 245587 立方米,年均 61396 立方米,与州属炉霍林业局木材生产持平。高于力邱河、白玉、丹巴等州属森工企业。

### 3、年产木材 1 万——2 万立方米的县林场

1990 年年产 1 万——2 万立方米的县林场有丹巴、甘孜、德格、色达、乡城、白玉等 6 县,共生产木材 75565 立方米,占全州木材产量 8.3%,工业总产值 2026 万元,占全州森工总产值 7.7%。1991—1994 年,上述 6 县木材生产:丹巴 79699 立方米,年均 19924 立方米;甘孜 52272 立方米,年均 13068 立方米;德格 67439 立方米,年均 16859 立方米;色达 62617 立方米,年均 13654 立方米;乡城 55053 立方米,年均 13763 立方米;白玉 86887 立方米,年均 21721 立方米,生产略有上升,年产达 2 万立方米以上。

### 4、年产 1 万立方米以下的县林场

1990 年生产 1 万立方米以下的县林场有石渠、稻城、得荣 3 县林场。年共产木材 8493 立方米,仅占全州木材生产总量 0.93%。这些县的林区特点是森林资源少,地处边陲,交通不便,运材距离远。1991—1994 年上述三县木材生产分别是:石渠 1634 立方米,年均 408 立方米;稻城 33519 立方米,年均 8379 立方米;得荣 15214 立方米,年均 3803 立方米。

## 四、生产方式的演变

### (一)采伐方式

甘孜林区有组织地开发利用始于民国三十二年(1933),即裕康伐木公司在泸定雅加埂林区采伐。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省政府公布《四川省国有林伐木规则》:“实行天然更新,凡林木之胸径未满30厘米者不得砍伐;砍伐必须斧、锯并用,树桩不得超过2尺……,集运材时,切实保护幼树、母树及有萌发性之根株……,”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川省政府公布施行《四川省岷江流域公私有林管理规定》:“采伐面积5亩以上,10亩以内者,先填具伐木申请书,呈经林管区核准,发给许可证,始得实施采伐;采伐面积在10亩以上者,应递呈省政府核准后行之;本流域公私有林采伐时,其森林可以天然更新者,每亩至少须留存生长优良之母树10株,以备天然下种。”这些规定,虽不完备,仍有一定合理性,但树桩不得超过2尺,实属伐高桩,浪费极大;只强调天然更新不进行人工更新,实际上只采不更,森林无法恢复。更严重者,当时刘航琛、赖执中、陈德滋等人在九龙、康定、泸定办伐木公司都是我行我素,抢占森林资源,乱砍滥伐,不执行任何规定,所采林区都是“剃光头”,大小林木一扫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西南伐木总公司、西南森林工业管理局、川康森林工业管理局、四川省林业厅,都制定了有关采伐方案、采更规程,采更方式不断改进和日臻完善,甘孜林区1958年开发后,基本上按这些规定施行,要求作到采更并举。现将有关规定综述如下:

(1)采伐国有林必须经省林业厅(或授权与专署或自治州)批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擅自采伐国有林,采伐后应及时清理林场,并按规定交纳育林费。

(2)冷云杉林一律实行择伐,土壤瘠薄,岩石裸露,更新困难地区不予主伐,采伐径级针阔叶树均从 20 厘米起开始采伐。下列森林不准主伐:省道以上汽车公路上侧 150 米和下侧 100 米范围内之森林;省道以下之汽车公路(森工运材简易公路例外)上下侧各 100 米范围内之森林;正河两岸 100 米范围内之森林;大山脊背 60 米和小山脊 30 米范围内之森林,乔木生长界限下方 100 米范围内之森林,林内岩石裸露之森林,水土冲刷严重地区流沙周围 30 米范围内之森林,森林与农田、果园等交界之林缘 30 米范围内之森林。

(3)高山丘陵区(1982 年后),实行小面积皆伐,伐块下限最低点在海拔 3500 米以上者,伐块面积不大于 3 公顷,伐块下限最低点海拔 3500 米以下者,伐块面积不大于 5 公顷。第一伐块的横向宽度不得大于 100 米,两伐块间人工划留不小于 100 米宽的保留林带。

高山峡谷区,阴坡、半阴坡冷、云杉等各类森林实行块状皆伐。根据自然地形、纵坡区划伐块。凡伐块下限最低点海拔在 3500 米以上者,伐块面积不得大于 5 公顷,每一伐块的横向宽度不得大于 150 米;凡伐块下限最低点在 3500 米以下者,伐块面积不得大于 10 公顷。两伐块间如无大小山脊间隔的,人工划留宽度 50 米以上的纵向保留带。

## (二)生产工具与机械设备

1958 年康定、丹巴建局初期,采伐工具主要是弯把锯、中钢斧,比解放前沿用的旧式斧、锯,在安全生产和提高工效上都有很大进步。1963 年丹巴森林工业局派人去川西森工局学习油锯操作

技术,并购置 051 型 3 马力油锯 11 台,投入采伐作业,平均每台油锯年生产木材 966 立方米,人均日工效 3.01 立方米;1965 年油锯采伐达到建局以来最好水平,平均每台油锯年采伐量 2272 立方米,提高工效 1.35 倍。到 1973 年该局有油锯 110 台。到 1990 年,全州重点森工企业使用油锯 237 台,年可采木材 50 万立方米,使采伐作业基本达到机械化。

山场集材,民国时期刘航聚等木商在九龙县洪坝林区采伐时,山场集材主要是以人力为主,利用人力背运出林和利用自然地势人力撬动顺坡滑木至小沟,待山溪水涨时,利用洪水放运木材。新中国成立后,甘孜林区山场集材主要是索道、渠道、缆(平)车道、拖拉机等方式,减轻劳动强度,生产比较安全,工效高,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1、滑道运材:丹巴、康定等森工局建立初期,因受交通、机械设备等条件的制约,曾采用滑道运材。滑道运材的优点是就地取材,以土运木、以木运木,运材结束后,又将滑道的木材撤取利用。运材成本低,工效高,修建简易;但致命的弱点是滑速很难控制,木材损失大,严重时可达 20—30%。

2、索道运材:甘孜林区使用架空索道运材始于 1965 年。第一条索道是丹巴森工局 111 场竹子沟索道。以后逐步推广到甘孜州各森工企业,计全州有架空索道 130 多条,其中动力架空索道 121 条,有绞盘机 133 台。运距一般为 500—800 米,台班工效 50—80 立方米。

3、渠道运材:1959 年丹巴森工局 113 场在边尔沙冲沟修建全省第一条渠道,全长 7 公里,总投资 27 万元,由伐区山楞直接将木

材转运至正河。优点是：修建时就地取材（土、石、木），造价不高，运材能力大，对完成任务有保证，木材损失小，人工修堰蓄水设闸门控制水流量，不受一般洪水 and 枯水的影响。

渠道类型分为石渠、石木混合渠、木渠 3 种。道孚林业局扭日河渠道、木茹沟渠道，运距都在 16 公里以上，为保证渠道水流量稳定，尽量设法防止水的渗漏，而且中间设木材中转堰、加水堰，不断增大流量，使木材畅通无阻。每条渠道年运材达 1—2 万立方米，直接由伐区山楞运到鲜水河交水运部门检收。

#### 4、缆（平）车道运材

缆车运材：丹巴林业局竹子沟施业区，沟窄水急，乱石嶙峋，坡坎大。经设计，采用缆车运材，1968 年竣工，全长 7.6 公里，总投资 82.2 万元。投产后山楞木材直接转运至正沟，再流送到大渡河。该缆车道 1978 年运材 12253 立方米，集中运材月突破 5000 立方米，日班生产能力达 166 立方米，劳动力比滑道运材减少 40%。这种运材方式，在道孚、炉霍林业局都得到推广和广泛应用，并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平车运材：丹巴林业局丹东平车道是甘孜林区唯一的一条平车道。1965 年动工，1968 年竣工投产，全长 16.5 公里，总投资 91 万元。平车道承担了 115 场全部木材的转运，月运材量达 1.5 万立方米，机车时速 15 公里。丹东正沟木材，经过小沟、渠道运至 115 场场部装车堰再上平车，当天即达一道桥正河，再流送至大渡河交材。

#### 5、拖拉机集运材

全州重点森工企业有 J—50 型和 J—80 型拖拉机 58 辆，主要

在坡度 25 度以下林区中应用于集运材,拖拉机集运材的特点:一是能将原木拉到楞场造材,运量大,工效高,木材损失小;二是拖拉机道路简单,修建费用小;三是除用于集运材外,还可收集散材和在林区运载生产、生活物资。

## 6、汽车运材

70 年代中期,森工企业在运距为 20—100 公里的小沟内采用汽车运材,将木材运往大渡河、雅砻江推河交材。炉霍林业局翻越老则山把雅砻江水系的木材运到大渡河水运交材点,白玉林业局反向运输把金沙江水系白玉林区的木材运往新龙地区雅砻江水运交材点,往返 380 公里。1985 年起,力邱河林业局将省统配材运交大渡河水运局,翻越折多山把木材运交康定瓦斯沟口的大渡河边推河,年交材 1 万立方米左右。丹巴林业局 70 年代起开始用汽车运材,1977 年建成燕窝沟公路,全长 18.2 公里,把木材从山楞运到正河;1979 年建成沙冲沟公路,全长 19 公里,从沙冲沟运木材到大渡河交材点;1983 年将丹巴至党岭的林区便道改造成三级公路,该线运材由水运改为汽车运材,实现了全局运材机械化。

近年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水运交材减少,加之水运交材后,价款难以收回,形成严重的三角债,造成企业生存危机,所以企业生产的木材开始自组车队或利用昌都、康定的返空车,将木材长途运输到成都自设销售点,自行销售,或直接运交木材用户。所以汽车运材当前大有代替水运交材之势。

全州重点企业有运材汽车 254 辆,主要型号为“东风”牌 EQ—140,解放牌 CA—10B,以及进口“奔驰”、“五十铃”。60 年代道孚、炉霍等林业局曾进口“斯塔尼亚”大型运输车 10 余辆,有自动装卸

设备,单车运材一般在 20 立方米左右,工效高,但配件补充困难,并要求路况十分良好,因此,不久即转让给其他部门。

## 五、对甘孜州林业建设的估价

1989 年由四川省林业科研、教学、生产、管理等部门的专家,还有由中国林学会推荐的云南、辽宁、黑龙江和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共 25 人组成的考察团,历时 20 天,对甘孜林区的重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在其考察报告中,,对甘孜林业建设作了较全面的评估。

(1)在指导思想,已基本上从原木生产为主转移到以营林为基础,合理采伐,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轨道上来,营林生产有了明显的进步。林区在采伐后,留有保留带,随处可以看到森林骨架的存在,保持了一定的森林环境,为迹地更新创造了有利条件。丹巴林业局磨子沟、边尔、大巴口等伐区,道孚林业局的各卡林场,炉霍林业局的红日林场,经过 20 来年的更新抚育,已经郁闭成林,伐区内青山滴翠,已经形成第二代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

(2)重视、依靠科学技术,探索出了塑料大棚育苗和高海拔迹地的更新经验。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赞扬这是我国高山森林经营中的重大突破,也是西南高山森林更新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光辉一页,这项成果无论在生产实践上还是高山采伐经营学的理论上都有重要价值。

州委刘发生书记在 1996 年全州林业工作会议上指出:“八五”期间,全州林业发展可以说上了一个新台阶。营林更新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至 1995 年，迹地更新首次还清了历史欠帐。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在原有基础上，扩建苗圃，推广塑料大棚育苗，开展高海拔林区迹地更新试验，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八五”期全州民族工业的发展，全州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林业在整个民族工业中的比重并没有降低，仍然保持在 60% 左右，仍然是甘孜州主要财源之一，林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并没有变。

阿称州长的讲话中也指出：林业对全州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促进作用。1958 年开发我州林区以来，共生产木材 2000 多万立方米，实现工业总产值 25 亿多元。从 1982 年省属森工企业下放给州管理的 14 年间，实现税利 2 亿多元。1995 年，全州林业总产值 3.5 亿元，占全州工农业总产值的 25.68%；林业工业总产值 2.4 亿元，占全州工业总产值 41.38%；林业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 65%。

林业促进地方社会事业的发展。到 1995 年底，州属林业企业共修建林区公路 3000 多公里，大、中型桥梁 35 座，水电站 40 余座，装机容量 10000 多千瓦，建立中、小学 23 所，医院、卫生所 36 个，为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林业“两制”的落实，县属小型采伐企业的兴起，州属林业企业的管理人才和技术分别向地方企业输送和推广，既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又繁荣了地方社会事业。

广大林业职工为开发林区、支援国家、支援藏区作出了奉献。1958—1990 年，因工死亡的林业职工达 588 人，重伤 478 人，他们为甘孜林区的开发、建设献出了生命和热血。还有许多工人、大、中专毕业生，他们在林区工作数十年，默默无闻地为甘孜州砍树一辈子，栽树一辈子，爱林护林一辈子，把青春和毕生精力无怨无悔

地献给了林海雪原。社会上曾有人指责林业职工是“败家子”，林业职工是“吃祖宗饭”，这种说法是对历史、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森工行业的特殊性缺乏了解，或者说是带有偏见。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近十年来，加强了营林更新工作，更新跟上率已达到100%，即是说采伐的迹地已经人工植苗更新起来，森林已经恢复，随着幼林的成长，逐步发挥其生态作用，被称为“吃祖宗饭”的人又将变为祖宗，他们是第二代森林的创造者，为子孙后代造福，为后人留下一片又一片新的绿林。

---

### 参考资料

[1]郑万钧：《西康东部森林之观察》，《边政》第八期，1931年。

[2]朱惠芳：《西康洪坝之森林》，1941年。

[3]刘建邦：《泸定县林业志》1990年。

[4]刘建邦：《甘孜州林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

[5]许金铎：《甘孜州塑料温室育苗技术应用与发展》《甘孜林业科技》第一期，1985年。

[6]王金锡等，1995年《长江上游高山高原林区迹地生态与营林更新技术》中国林业出版社。

[7]四川高山森林经营学术考察团：1990年《甘孜州高海拔林区采伐更新及森林经营学术考察报告》《甘孜林业科技》第一期。

[8]刘发生：1996年《全州林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阿称：1996年《全州林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人 物 春 秋

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的文史资料中就不可以缺少关于曾经活跃在康巴历史舞台上各位人物的记述。这些人物的命运与前途、成长与变化,同整个国家、四川省(原西康省),特别是甘孜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息息相关,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的场景。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认识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求中国”这一真理。

在已出版的《甘孜州文史资料》共14辑中,已先后刊载了格达活佛、阿旺嘉措、马骏、周奕廷、朱刚夫、王寿昌、罗洪则拉等人物的传略。这一辑中我们把降央伯姆、夏克刀登、刘家驹、格桑泽仁四位知名人物的传略献给各位读者。如果史料内容有遗漏,甚至错讹的地方,请不吝赐教。

——编者

### 降央伯姆

(1913年——1988年)

降央伯姆,原名泽雍巴姆,藏族,女,1913年11月25日出生于青海省囊谦县,是囊谦土司的女儿。1937年与康区德格家族第十四代法王、二十一代土司尼麦泽汪邓登结婚,婚后于1940年生一子名乌金尼麦呷翁德钦(又名乌金霞、乌呷)。

德格土司原为康区四大土司之一,统治着康区邓柯、德格、白

玉、石渠和金沙江以西的江达等5个县,约7万多人口。

1940年泽旺邓登病逝,因嗣子年幼不能袭土司职理政,由涅巴召集土司下属头人和土司五大家庙的活佛举行最高会议,商议决定土司的继位人。当时由于德格家族内部及与下属头人之间,为争权夺利早已形成派系之争。以降央伯姆、俄马相子为首的一派,力主在土司嗣子未成年之前由降央伯姆或八邦寺(土司家庙)司徒活佛摄政;以夏克刀登为首(德格土司聂清、玉隆头人)的一派,则坚持由昂翁降白仁青(德格二十代土司多吉僧格之弟)的儿子噶仁翁堆(任西藏地方政府军队代本)与降央伯姆成婚袭任土司。两派各持已见互不妥协。为避免酿成纠纷影响地方安宁,德格县政府及国民党德格县党部插手调解。迫于官方压力,双方协议由降央伯姆代行土司职位摄政,待其子乌金霞成年再袭土司职。

降央伯姆接任土司后,亲信俄马相子与夏克刀登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即所谓德格家与夏克家的纠纷)。相互明争暗斗,其间发生了亲夏克家头人赠伯拉甲被枪杀;亲德格家头人结穷、索莫两家的被赶走的事件。仇怨越结越深,已到了誓不两立的地步,促使双方不断扩充实力,并开始集结兵力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械斗。幸运的是时值康区解放,终未能酿成战乱危害地方。因此在降央伯姆代行土司摄政期间,地方动荡不安,从未得到安定。以后她在回忆自述中说:“1942年我丈夫去世,我代行他的职位,在地方封建割据,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政治舞台上搏击了近十年的时间,直到1950年康区解放我才获得了新生”。

1949年12月,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通电宣布西康起义,青海玉树地区亦和平解放。降央伯姆为大势所趋,即派专人到玉树向共产党特派员卢德表示归向拥护之意。康区解放后,她又受到德格县第一任军事代表的帮助,逐渐理解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消

除了思想上的一些疑虑。特别是国民党妄图挑拨离间，散布解放军将支持夏克家反对德格家的谣言，经过军代表的驳斥使她释去心理上的重负。以后又亲眼看到解放军进藏过境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仅保护藏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而且积极为解除人民疾苦，修筑公路，废除乌拉差役等等，与国民党军队对群众欺压掠夺奴役凌辱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活生生的事实，使她不能不信服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

1951年，党和政府贯彻“团结上层为主”的民族工作方针，安排她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任职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昌都部队副政委兼昌都地区党委书记王其梅同志和副司令员陈明义同志对她经常进行启发教育，进一步促进了她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为协助党和政府宣传民族、宗教政策和做好安定人心稳定地方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还在其辖区（德格土司辖区）内组织调派牛马支援进藏部队，担负部分运输任务。

1952年9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州组织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她担任观礼团副团长。在重庆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司令员及王维舟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参观团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锦旗。降央伯姆还得到毛主席赠给的一件紫红色锦缎藏袍，使她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她回忆说：“我从未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欺压剥削人民的封建土司，竟能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军政首长的亲切关怀，给予很高荣誉，使我终生难忘。”

在北京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接见她的时候，针对她因为和夏克刀登之间的矛盾而在思想上存在的疑虑，耐心地帮助她说：“共产党是光明磊落和主张促进团结的，决不会做拉一家打一家那

种不公正的事情”，“解放康藏是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也是为了帮助和支援藏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彻底解除人民的疾苦。”还鼓励她说：“只要我们为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使降央伯姆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了不负党和政府的希望，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尽力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返回德格后，她为支援解放军十八军进军西藏，尽全力保证了从德格马尼干戈到昌都以西的察雅、吉塘一线的支前运输。并响应德格县工委和县政府关于减免差赋的号召，在德格土司辖区内减去了农牧民 50% 的差赋。还与夏克刀登等共同签订“爱国团结公约”，促进了地方的团结稳定。

1955 年底，党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藏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在甘孜州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她带头交出了土地、枪支、弹药，遣散了娃子，放弃对差民压迫剥削的特权，把仓储余粮卖给了国家。

1956 年她被选为自治州全国人大代表。在出席全国第一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的接见，并聆听了总理对藏区民主改革作的重要教诲，使她认识到：民主改革是为了改变藏族地区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是为了使广大藏族人民彻底翻身，真正享有平等的地位。这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广大藏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作为爱国人士，一定要遵循总理的教诲，相信党的政策，起到桥梁作用，积极协助地方政府搞好民主改革。

通过几年来多次到内地参观、开会，接受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的教育帮助，她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协助党和政府宣

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协调地方矛盾，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民主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对金沙江以西西藏自治区江达县个别不明大义参加叛乱的分子，进行说服帮助，使其改恶从善回家生产，取得了好的效果。

民主改革期间，她的儿子乌金霞去西藏，在途中被德格家在江达参加了叛乱的一个管家接去，参加叛乱队伍后被俘。是贺龙元帅命令部队保住乌金霞的生命并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下得到了新生（乌金霞以后担任了省、州政协委员和省政协社会法制处副处长）。她说：“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有我们母子的今天。”

正由于党的教育和党的政策的感召，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虽然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她始终相信这决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共产党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1978年中共甘孜州委为她平反纠错，补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扣发的工资，清退了被没收的财物，继续担任人大政协的职务，重新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

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任西康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康定地区民族协商会副主任，西南民主妇女联合会委员，西康省妇联副主任，全国民主妇联执委，西康省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甘孜州政府副州长，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妇联执委，四川省妇联副主任，政协四川省第一、四、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历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8年9月27日，降央伯姆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省人民医

院逝世，终年 75 岁。

## 夏克刀登

(1900 年——1960 年)

夏克刀登，藏族，1900 年出生于四川省德格县的夏克家族。他的祖父夏克白马伦朱是德格十九代土司切麦打比多吉的“聂清”（即大管家）。祖父死后，由他的父亲夏克扎西郎加继任“聂清”，因在德格土司家族中阿甲（即第二十代德格土司多吉僧格）和八巴（多吉僧格的弟弟昂翁降白仁青）为争夺土司权位的斗争中支持八巴，遭到支持阿甲者的毒害。其父死后，他的母亲泽旺志玛承袭了丈夫的头人职位（以精明强干和甘孜孔萨第七代土司拥金堪珠、瞻化（即今新龙）上瞻土千户甲日其麦志玛同被人们称为“康区三大魔女”），指挥夏克家族的势力支持八巴，转战石渠一带。当阿甲依靠清朝庭，借清军赵尔丰部打败八巴后，泽旺志玛携子女随八巴逃往西藏。

最初，受甘肃拉卜楞寺降央协巴活佛引见和托付，得到十三世达赖在藏北那曲草原划的一块草场，安置了八巴、夏克、赠伯（支持八巴的德格土司下属赠科头人）三家。夏克刀登就在这藏北草原上度过了童年。

后来八巴、夏克、赠伯把随从们组织为德格武装，参与了藏军抵抗清军的战斗并获胜，受到达赖的嘉奖，八巴被西藏噶厦政府赐予四品爵位，夏克、赠伯两家各得到一座“谿卡”（庄园）和十多户“科巴”（差民），跻身于西藏地方的贵族阶层。

1918年，达赖应夏克家的请求，给西藏驻昌都总管噶伦喇嘛写信，要藏军支持恢复夏克家原在德格的权势，免除其一切乌拉差役。夏克家由拉萨到江达后，因慑于德格土司阿甲在位的威胁，不敢贸然过江，就在同普汪布堆地方临时安了家，夏克刀登和他的哥哥夏克泽郎又重返拉萨，进入拉萨贵族学校读书。

1922年，夏克刀登结业于拉萨贵族学校。其时德格已被藏军控制，德格第二十代土司阿甲已被藏军解递拉萨，新承袭第二十一代土司的泽汪邓登的衣食住行亦受到藏军的约束。夏克刀登即以德格头人的身份返回德格，投奔驻德藏军代本穷热，但未受到信任，仅让他当了一个“邓果”（小头人）。1929年藏军驻德格代本换任克默。克默原是夏克刀登在西藏结识的熟人，上任后立即起用夏克刀登处理了一些紧急公务。因办事精明干练，得到克默的器重。夏克刀登32岁时，升任为德格土司的“聂清”，执掌处理日常公务的大权。1933年，藏军与刘文辉的24军作战失败退守金沙江以西。夏克刀登为壮大实力，又娶德格土司下属玉隆拉日大头人拉日伯格的女儿四郎群措为妻，以后拉日头人的独子因赛马摔死，又以入赘的身份住进玉隆头人的官寨，并掌握了玉隆头人的权力，拥有一千多户差民，从此玉隆成了他发展势力的地盘。同时为拉拢外部势力，他尽力利用已取得的地位和实力，促成亲戚头人的子弟入赘甘孜孔萨、麻书土司下属大头人，进而得到甘孜地区土司头人对他的支持。这样，夏克刀登逐步得到德格土司的信任和外部一些势力的支持，实力和声望也得以与日俱增。同时也引起德格土司亲信俄马相子、四郎泽仁等人的忌恨。

1935年，诺那活佛奉国民党中央的派遣，任西康宣慰使，组成宣慰使公署到康区代表中央宣慰，图谋与刘文辉争夺治康权力并配合地方势力阻击红军。诺那到康定后，即积极联络地方势力，借

宣慰之名，召集康区有实力的土司头人、喇嘛活佛到康定开宣慰大会。夏克刀登作为德格有实力的头人（德格土司首席军事涅巴），在政治上颇有抱负，参加诺那的宣慰大会后，表示愿意接受诺那的领导实现“康人治康”，并支持诺那解除 24 军的驻康武装。据说夏克刀登与邦达多吉、诺那、邓德杰等还秘密结成了“和睦四友”。

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途经康北，国民党重庆行营授命诺那策动地方武装配合堵击进入康区的红军。诺那纠集地方武装先后在道孚、炉霍阻击失败后，退到甘孜，又急令德格土司增援。夏克刀登受命率领二千多名武装人员，在甘孜绒坝岔对红军进行阻击，又被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击溃，夏克刀登和头人曲朱土登等人被俘。

夏克刀登负伤被俘后，被送到甘孜县朱倭官寨，红军为他精心治伤。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领导人亲自和他谈话，向他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甘孜绒巴岔的藏族群众，也把红军对他们的态度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之处，告诉了夏克刀登等人，希望他们不要与红军作对。通过反复的宣传解释，夏克刀登对红军有了认识并有所感动，于是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绒坝岔，命令集结在那里的德格土司武装不要再和红军作战，立即退回德格。1936 年 4 月 23 日夏克刀登在德格土司授权下，与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

夏克刀登在甘孜期间，德格土司派乌金泽登到甘孜探望。夏克刀登与乌金泽登还受到朱德总司令和王维舟等首长的接见，朱总司令嘱咐乌金泽登回德格后转告乡亲：“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不是国民党诬称的土匪，夏克刀登的伤好后就回去，请乡亲们放心。”还庄重地说：“红军的目的是要解放全国的穷苦百姓，我们现在不能久留，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十到十五年后，我们还会回

来,那时我们共同建设美丽的康巴地区。”〔见《中国西藏》1992年夏季号〕

1936年5月,康区和大小金川共16个县的代表约700多人齐集甘孜,参加波巴全国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下设民政、农业、畜牧、军事、外交、司法、民族、财政、宗教九个部,夏克刀登任军事部部长。他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红军北上,除了协助安置伤病员外,还送给红军150多头牦牛、50多匹马和一部分粮食,受到朱总司令的嘉奖,并以银元和枪弹作为对他的回赠。

1937年,夏克刀登意欲去西藏,经刘文辉派白玉县长范昌元说服后接受安抚,1938年入刘文辉举办的西康保安行政讲习会。

1939年发生“甘孜事变”,班禅行辕、孔萨土司解除了24军驻甘孜部队的武装,撤换了甘孜、炉霍、道孚等县刘文辉所委派的县长,由行辕另选人员接任。当时班禅策动夏克刀登出兵相助,并许以夏克接任德格县长,但都未能得到他的同意。此后即被刘文辉先后委以西康特别保安副总队长、省参议员、德格县参议会议长、副总保等职。在他任职期间对地方兴学、办理邮电、修筑公路(康青路)等也积极予以支持。

1940年,德格土司泽旺邓登病逝,涅巴召集土司大小头人、5大家庙活佛举行最高会议,商议关于土司继位人的问题。作为涅巴之一的夏克刀登提出由昂翁降白仁青(又名八巴)之子噶仁翁堆,与降央伯姆成婚后袭任土司的主张,遭到德格俄马相子一派的反对。俄马相子等人支持降央伯姆代行土司职权,待嗣子成年后袭职。

降央伯姆掌权后,比较信任俄马相子和麦宿头人索莫、结穷等,实权也落到俄马相子手中。夏克刀登受到排斥引起忌恨,和俄

马相子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因此夏克刀登常住玉隆官寨并大造舆论，号召差民起来废除乌拉差役，拒绝纳粮支差，借以对抗德格土司。

1946年7月，赠伯拉甲被亲德格土司的头人索莫家伏击枪杀。这一事件使夏克刀登与德格土司的矛盾发展到誓不两立的地步，因为赠伯家和夏克家是清末在阿甲和八巴争夺土司权位的斗争中，追随八巴同去西藏的患难之交，与夏克刀登有通家之好。夏克刀登在赠伯拉甲被杀后，即派武装袭击麦宿头人，将已逃亡的结穷、索莫、雪塘3家的土地、房屋、牲畜、粮食全部分给麦宿的差民，又将紧随3家的80多名差民强行搬迁至玉隆，分散安置在他的辖区里。为了不断扩充实力，夏克刀登还派人策划鼓动德格土司所辖白玉县的差民起来造反，赶走了德格土司委派的头人，并欲相继在石渠、邓柯等县采取同样的手段排斥德格土司的势力。

1949年德格土司的势力逐渐衰败，所辖邓、德、白、石、江达5个县中50%的寺庙，60%的头人为夏克刀登所控制，双方的矛盾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都在集结武装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所幸的是当时解放军已解放大西北，毗邻的青海省玉树地区已和平解放，大势所趋，夏克刀登和降央伯姆闻讯后都主动派出代表去玉树表示对人民解放军的拥护和欢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2月夏克刀登派他的“仲译”（秘书）汪甲作代表，同格达活佛、邦达多吉的代表柏志和翻译泽郎同去北京向中共中央敬献哈达，表达他们对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拥护和敬仰，在北京受到朱总司令的接见。

1950年3月康区获得解放，夏克刀登在康定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庆祝大会。3月27日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夏克刀登被安

排为副主任。接着西南军政委员会又邀请他和格达活佛等康区进步人士到重庆,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领导的接见,听取了他们对建设康区支援解放西藏等方面的意见。夏克刀登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在康定召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夏克刀登当选为副主席,同时当选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夏克刀登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务。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使夏克刀登的政治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他全力为维护康区稳定和支援十八军解放西藏进行工作。与德格土司的矛盾也在党和政府的帮助调解下得到彻底的化解。在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转运军需物资的繁重工作中,他与降央伯姆合力组织了上万头牦牛,组成运输队,保证了从马尼干戈到昌都一线交通的畅通和军用物资运输。以后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军需运输任务更加繁重。1951年底夏克刀登再次在玉隆、石渠、邓柯等地组织了万头牦牛,由他的侄儿押运,抢运了一批急需军用物资到拉萨,及时缓解了进驻拉萨部队的困难。

康区解放后,夏克刀登在党的领导下,为康北的稳定、建政和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贡献。1960年初夏克刀登不幸患急性黄色肝萎缩症,经四川省人民医院抢救医治无效于4月2日逝世。4月6日四川省党政领导廖志高、天宝等在成都殡仪馆参加了夏克刀登的追悼会。

## 刘 家 驹

(1900 年——1977 年)

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男，巴塘县人，生于 1900 年。1905 年入巴安官话学堂学习汉语文，至 1919 年先后入巴安县立高等小学及巴安华西学校初中学习。在此期间，还拜师学习藏文及汉文对联。由于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曾一度边读边教，担任华西学校初小国文、图画教员。1920 年至 1929 年在巴安原籍从事文教工作，先后担任华西学校校长、巴安县立小学校长、巴安县教育科长。为了发展地方文化事业，还曾开办平民益智书报社，同格桑泽仁、江安西发起成立“巴安青年会”，组织地方青年参加社会活动。

1930 年刘家驹受格桑泽仁邀约，到南京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科员和《蒙藏周报》社藏文股主任。1931 年升任蒙藏委员会第三科科长。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由格桑泽仁发起的“西康青年励志社”，举办“西康青年杂志社”。还兼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国民党中央党校的藏文教师，班禅驻京办事处教务科长、藏文秘书。任职期间他悉心研究康藏历史和现状，于应邀出席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时，将写成的《康藏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发给与会人员，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康藏问题。

1932 年 12 月 12 日，九世班禅应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派员邀请，由绥远到南京，设行轺于蒋介石的陵园官邸。刘家驹专任行轺秘书长。12 月 24 日，国民政府任命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西陲宣化使就职典礼，由刘家驹译读了

班禅的答词。并于1933年2月随班禅经北平返回绥远百灵庙，参与了班禅在内蒙的宗教与宣化活动。当时内蒙德王受日本人的诱惑，倡议“蒙古自治”，班禅又派刘家驹同罗桑坚赞赴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内蒙形势危急的情况。1934年元月班禅到南京参加追悼十三世达赖的活动；2月20日举行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的就职典礼；1935年1月26日班禅到内蒙阿拉善旗定远营，设行辕宣布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在此期间，班禅与国民政府往来的函电文件均由刘家驹草拟、翻译。

193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赵守钰为专使，率仪仗队护送班禅回藏，于同年12月18日到达青海玉树。西藏噶厦在得知班禅已由国民政府派员护送回藏的情况后，曾先后派遣代表到甘肃、青海组织迎接，但不同意班禅带“蒙汉官兵入藏”。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蒙藏委员会电嘱专使赵守钰“挽劝班禅，务以大局为重，暂缓回藏”。班禅因回藏受阻，忧郁成疾，于1937年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圆寂。国民政府令撤销西陲宣化使公署和护送专使行署，并同意班禅行辕将班禅遗体移送甘孜暂住。刘家驹作为班禅行辕秘书长随堪布会议厅的职员及家属，亦移居甘孜。

1938年8月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为致祭专使到甘孜致祭班禅期间，班禅行辕欲与刘文辉分庭抗礼。通过甘孜地方香根活佛和女土司德钦旺姆向戴传贤提出，请求将康区北路甘孜、德格、瞻化（即新龙）、邓柯、白玉、石渠6县划为班禅行辕治理的驻地。国民党中央虽然对刘文辉不满，但这6县系西康建省委员会辖地，为避免与刘公发生摩擦，影响后方稳定，戴传贤没有表示允

许。此后刘文辉与班禅行辕为争夺地方土司势力，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1939年12月以女土司德钦旺姆与行辕卫队分队长益西多吉的婚事受刘文辉阻止，并拘押德钦旺姆为导火线，引起双方武装冲突，酿成“甘孜事变”，24军驻甘孜815团被行辕缴械。甘孜为行辕控制后，身为秘书长的刘家驹经行辕堪布会议厅委任为保安司令，德钦旺姆为副司令。准备统率地方武装一举驱逐刘文辉在康区的势力，并积极与瞻化（新龙）、炉霍民族宗教上层串联，东下占领了炉霍、道孚两县。委任了甘孜炉霍、新龙的县长，欲以“康人治康”，改变西康政局。但由于地方武装缺乏组织训练，刘家驹、德钦旺姆不是军人，军事指挥亦不得力，加之炉霍道孚等县的地方武装未全力支持，抱守观望态度，因此对刘文辉在向国民政府报告，请中央派员调查的同时所采取的武装反攻未能克敌致胜，以致班禅组织防御的地方武装节节溃败。不得已，刘家驹及德钦旺姆随班禅行辕的全体人员撤离甘孜转移到青海。

1940年4月经西藏噶厦政府的允许，班禅堪布会议厅派秘书长王乐阶等400余人，从青海玉树护送九世班禅的遗体回藏。刘家驹则奉行政院电令回重庆述职，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顾问并兼任班禅驻渝办事处处长，同时还担任格桑泽仁为旅渝巴安人组织的“东隆会”副会长。

1941年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任为少将参议，着手编写《班禅大师全集》。同年11月返回巴安途经云南时，又被国民党11集团军委任为高级参议。

1944年刘文辉为巩固统治，笼络地方知名人士，通过巴安驻

军团长傅德铨从中圆和,不计前嫌,委任刘家驹为西康省政府顾问,参与了西康的政治活动。

1946年11月,刘家驹作为1937年选出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期间,还应聘担任中央大学边政系教师和教育部蒙藏教育司高小语文教科书的藏文翻译。

1947年复任中央蒙藏委员会委员,从事西藏政教史和康滇民歌的研究、著述。

1948年2月,刘家驹经国民党中央核定遴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于同年5月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全体委员会。

1949年刘文辉为安定后方稳定康区,除启用部分康籍知名人士担任地方县长外,并托刘家驹起草《藏族自治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由格桑悦希等进行筹备工作。并在康定成立了“西康藏族自治促进会”,由格桑悦希、刘家驹、杨仲华、王孟周等担任主要领导。当时刘家驹在巴安与地方士绅代表到波密调解巴安与邦达昌之间的旧怨纠纷,未能参加成立大会。同年12月,刘文辉通电西康起义,刘家驹在巴安参加了“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青”召开的各族各界人士迎接解放的会议。

康区解放后,刘家驹于1950年7月奉康定军管会苗逢澍主任函调到康定参加工作,从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文件的藏文翻译和康定民族干部学校的藏文教学。1952年至1953年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翻译室的藏文翻译。1954年至1958年,由于他具有较高的藏汉文水平,先后在北京为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次会议翻译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会议文件；在至1958年，由于他具有较高的藏汉文水平，先后在北京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次会议翻译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会议文件；在省、州为自治州人民政府文教处、四川省教育厅民族教育科翻译教科书。他在从事翻译工作的同时，1956年曾去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7年偕同省教育厅工作干部到甘孜州道孚、炉霍、甘孜等县调查小学教育情况和征求对藏文课本的意见。同年9月调四川民族出版社任藏文编辑室主任。1958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党和政府肯定了他在翻译工作中作出的成绩，并于次年到北京出席了民族出版工作会议。

1959年至1966年，刘家驹先后任四川省政协第二、三届委员、民族宗教组成员，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66年调甘孜州政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押回巴塘劳动，只发给生活费。1969年甘孜州革命委员会为他补发了工资，仍回康定继续在州政协工作。1974年因病经组织批准回巴塘原籍休养，1977年病故，终年77岁。

刘家驹生前的著述有：《康藏》、《康藏过去和现在》、《班禅大师全集》、《西藏政教史略》、《康滇藏歌谣集》、《汉藏合璧实用会话》等书。撰写有《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在巴塘的传教办学行医活动》、《赵尔丰对川边的统治及措施》、《雪域杂记》、《近百年来的康藏》、《藏区童谣》、《歌颂新社会反对旧封建》、《基督教在西康地区的活动情况》、《天主教在西康地区的活动情况》、《理塘毛垭坝大温泉的由来记》、《甘孜事件的起因及其经过纪实》、《巴塘民团与边军杨团之战》、《巴塘制革工业的兴衰》、《西康诺那事件》、《格桑泽仁提缴

马成龙团枪械始末——兼述藏军犯巴被击败史实》等文史资料。翻译有《时轮金刚》经典及《西藏情歌》等。对宏扬藏族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

本文参考资料：《巴塘县志》

《班禅额尔德尼传》

《甘孜州文史资料》

## 格桑泽仁

(1904年——1946年)

格桑泽仁，汉名王天杰，又名王天华。藏族，巴塘人(1908年巴塘改为巴安，1951年又改为巴塘)，生于1904年2月19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四)。父亲王兴邦原是巴塘县总保，其先辈原籍云南省丽江，后迁至四川巴塘，历世五代。

1906年，清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设“川边学务局”，在巴塘创办初等小学。格桑泽仁入学为小学第一期的学生。辛亥革命后转入美国耶稣教会在巴塘开办的华西小学第一期。毕业后，于1917年考入云南省昆明中学，经过学习具备了汉语文等基础知识，而且精通汉藏两种语言。

1924年，刘禹九任西康屯垦使，为了培训干部，网罗人才，创办“西康文官仕学馆”及“陆军军官学校”。同年格桑泽仁考入陆军军官学校，并被委任为屯垦使署宣慰员。

1926年，格桑泽仁以精通汉藏语言，深悉汉藏政治情况，为九世班禅管家公登扎西赏识，约任为翻译，同赴西康15个县访问（目的是调查康藏情况，试探九世班禅有无回藏可能）。公登扎西访问结束回南京复命途经成都时，又将格桑泽仁推荐给已接管西康的24军军长刘文辉，被委任为24军边务处参议名义，每月支给薪俸大洋8元，有职无权无事可干便不辞而去，经重庆到了南京。这时正值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筹组中央政府，建立各种机构。其中设置蒙藏委员会，为开展蒙藏工作，亟需通晓汉藏语文的翻译，这样格桑泽仁又经公登扎西推荐被委任为蒙藏委员会翻译。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班禅驻京办事处的翻译。他任翻译期间，译语流畅，译文准确，在汉藏交往中，深受双方重视。他自称是康藏全权代表，并受到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召见。格桑泽仁平时留心时事，对康藏问题有所见解，在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中间时，被视为藏族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经班禅驻京办事处和戴传贤的推荐，擢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兼任藏事处处长。蒙藏委员会为加强国内蒙藏地区的联系和宣传工作，组建《蒙藏周报》社，由格桑泽仁兼任副社长。此后还先后担任过国民党陆海空军司令部参议，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少将参军等职。国民党当局为治理边疆，培植人才，像格桑泽仁这样的人物，在当时是很受器重的。在吸收他成为国民党党员后，准备相机委以重任。

格桑泽仁在政治上身居要职，亦欲有所作为，主张多培养一些康区藏族青年，以便为地方政治经济建设出力。1928年秋，他派人回巴塘把他亲友中有才能的人接去南京。当时被接去的有刘家驹、王天福、杨怀森、方崇汉……等人，除任命刘家驹为《蒙藏周

报》社藏文编辑外，其余的人也都作了适当安排。同时还积极鼓励藏族青年到内地求学。后来去内地的藏族青年多了，经他发起组织“藏族青年励进会”，自任会长。格桑泽仁以“励进会”笼络人才，并以蒙藏委员会的名义将西康藏汉青年分别保送到南京蒙藏学校、东北讲武堂、太原军官学校、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后来，国民党为培养开展西康党务建设人才，经格桑泽仁通过蒙藏委员会并得到考试院长戴传贤的支持，在中央政治学校内开设一个西康班，在南京、北平、东北、太原等地学习的西康籍学生中，挑选熟悉西康情况，有活动能力并忠实于国民党的青年共20余人集中在该班受训10个月。入学后集体参加国民党，还组织他们到浙江等省参观。

1929年，刘文辉鉴于格桑泽仁以康藏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南京活动，受到国民党中央的重用，而且组织西康青年充实政治力量，是其主持康政的后患。为了把格桑泽仁打下去，刘文辉指使他开办的边政人员训练所毕业学员组织了一个“反对格桑泽仁冒充康藏全权代表大同盟”，“大同盟”致电国民政府的各部、院、会，请予支持并另选马泽昭、丁子沛二人为西康“真正”的民众代表去南京抵制格桑泽仁的活动，力图消除格氏的影响。但刘文辉的反对，并未影响国民党中央对格桑泽仁的信任，国民政府还任命格为国民政府参议。

1931年蒋介石为控制西南，削弱刘文辉在西康的军阀势力，欲以发展西康党务建立组织为突破口，着手与刘抗衡，国民党中央党部遂任命格桑泽仁为西康党务特派员，率领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的毕业学员分两路回康开展建党工作。一路由杨仲华、何德润、秦俊豪、李俊明、周伯先、吴象安等人经四川成都去康定筹建党务

特派员办公处；一路则由格亲率巴安籍王天福、杨怀森、何世麟、贾炳坤、赵跃中、方崇汉等人携电台一部，取道云南经昆明直接去巴安，避免同刘文辉见面，并了解康南情况。

格桑泽仁途经昆明，以中央党务特派员身份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举行过一次会谈。双方都认为云南与巴塘相邻，彼此相互支援于双方有利。实际上各有图谋，龙云想利用格桑泽仁扩大防区、扩展实力，格桑泽仁则想利用龙云支持反刘文辉。于是龙云为拉拢格桑泽仁授予他“滇边宣慰使”的职衔，并赠给他步枪100支。

格桑泽仁等声势煊赫到达巴安县属盐井和东南区时，盐井权势较大的贡噶喇嘛和巴安东南区六玉十五村的总保茨朗罗绒等都组织僧俗群众盛情接待，并派马队沿途护送。巴安地方乡亲，亦对巴籍青年荣归还乡表示热情欢迎。但是也引起24军驻巴安官兵的不满，并大肆进行诽谤。

格桑泽仁审时度势，认为自己来康是受命中央，现结有外援龙云的支持，又联系有地方群众基础，加之24军部队与藏军在康北相持不下，康定又发生驻军马旅兵变，趁局势混乱正是反刘时机。即以“康人治康”的口号，号召僧俗各界起来反对刘文辉，并宣布了“实行地方自治；力图民族平等；废除乌拉差役；改进耕作技术；发展文教事业”的政纲。同时策动原驻军连长杨朝宗（格少年时的同学，任过驻军马团连长）组织武装，提缴了24军驻巴安40团两个连的枪支（当时40团团长沙成龙正率该团大部分兵力在康北抵御藏军，还有一个连驻守盐井），宣布成立了“西康省防军司令部”，格自称总司令（此后人称“格司令”）。司令部以下设立群众武装指挥部，任命吉村曲批为总指挥，还任命杨朝宗为防军团长，赵跃中为

团参谋。还任命了巴安县、得荣县的县长(他的秘书黄子冀为巴安县县长)。又将巴安城内的街名分别更名为中山街、博爱街、自由街、平等街等。

格桑泽仁意欲趁此驱逐刘文辉在康区的势力,他即密令盐井贡噶喇嘛,将24军驻盐井的40团一个连的枪收缴,孰知贡噶喇嘛拒不执行。为解除后顾之忧,格即派武装攻打。贡噶和盐井地方势力自感难以对付,向藏军求援。藏军对格早已心存戒备,遂派兵包围巴安,与格部作战,相持3个多月。此时,刘文辉对格桑泽仁解除其驻军武装亦深感不满,于是发动康定城区青少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格桑泽仁”的口号,同时以格桑泽仁破坏康区治安为由请求国民政府将格调回南京。刘文辉还以藏军占据巴安为借口,令马成龙团星夜由康北进军康南,还调动靖边军孙子汶一个团准备进攻巴安。格桑泽仁率部在藏军包围下,已弹尽粮绝。现又得知24军调动部队来攻,自感大势已去,于1932年9月自动离开巴安,经云南返回南京。他抵南京后,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边务委员等职,后因染患肺疾,先后在云南昆明、丽江等地疗养。

格桑泽仁离开巴安后,藏军撤退至金沙江以西,巴安复由24军马成龙团所控制。并对格派下属进行打击报复,杨朝宗被逮捕处决,吉村曲批等则逃往农村躲避。后经巴安地方乡绅和康宁寺活佛、堪布出面调解,才制止了马团的镇压。

1938年格桑泽仁到重庆,为组织慰劳抗日将士,派刘曼卿(原国民政府文官处职员,1929年以文官长古应芬的名义派她去拉萨试探达赖的态度,是格的妻姐,为清末驻藏大臣手下一文案刘华轩之女)和贡噶活佛等人去西康募捐,组成“西康民众慰劳抗日前线

将士代表团”，格自任团长，刘曼卿任副团长。先在重庆展览了慰劳物品，然后去汉口等地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返回重庆后，格桑泽仁还向蒋介石献了锦旗和哈达。

1939年格桑泽仁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了锦旗和哈达，受到了接见，并聆听了教诲。同年在重庆他还号召旅渝的巴安人组成了以巴安城东部的“东隆山”为名的“东隆会”，格自任会长，刘家驹、江安西任副会长。

1939年元月，西康正式建省，成立了以刘文辉为主席的西康省政府，并筹建西康省临时参议会。根据《省（县）参议会组织条例》，参议员的产生应同地方士绅协商，格桑泽仁与刘文辉彼此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消除隔阂，刘文辉推举格桑泽仁为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但因病未能参加会议。

抗战时期，格桑泽仁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的鼓舞下，1940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东方文化之再造》的文章，主张维护国家独立和东方文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宣传抗战到底。1941年，格桑泽仁偕妻巴月照由重庆经云南回巴安后，又组织地方群众和学生，在龙王塘修建了一座“抗战建国纪念塔”。并请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将巴安的“丁宁寺”改名为“康宁寺”，并由戴送了一块匾额。

1942年格桑泽仁派其弟格桑悦希在康定筹建成立康藏贸易公司，自任董事长，其弟任总经理。并分别在成都、重庆、拉萨、昌都、甘孜和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等分支机构，经营边茶、绸缎、布匹、药材、皮革、羊毛、黄金等的进出销售和硼砂的开采。

1943年，格桑泽仁同西藏格西东本和巴安康宁寺格西阿聪等到康定与西康省在康的军政高级官员往来接触，密切关系。次年春，刘文辉特邀格桑泽仁在一次省会机关的大会上讲演，《西康日报》以《民族团结的交响曲》为题摘要发表了他的讲演内容。格桑泽仁还在夏天联络康藏大商号邦达昌、足萨仓、桑都仓等在康定南门外飞机场，设帐宴请刘文辉及省会高级官员。

1944年国民政府授予格桑泽仁三等紫星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格桑泽仁任国民政府，设帐宴请刘文辉及省会高级官员。

1944年国民政府授予格桑泽仁三等紫星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格桑泽仁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参加了第四届国民政会。

1946年他在四川灌县青城山疗养，终因病重，医治无效而去世，终年42岁。国民政府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蒋介石送了“勤贤足示”的挽幛。遗体运回巴安路过康定，刘文辉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国民政府还拨款为他在巴安修建了墓园。

格桑泽仁生前有《边人刍言》、《新康藏歌》、《巴塘月令曲》、《康藏最近之情形》等著作。

---

〔资料来源：《西康史拾遗》、《巴塘县志》、《四川近代人物传》〕

（邓俊康 李昆璧 整理）

# 旧西康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三青团

高秉鑫

## 第一章 国民党

### 一 起源

国民党的前身是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同盟会。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成立,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组成。推孙中山任理事长,实际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党务。其政纲为:“促进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主义”、“维护国际和平”。1913年初在国会选举中获多数席位,为袁世凯所忌,派人将宋教仁暗杀。宋被刺后,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同年8月被袁世凯通令强行解散。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部分国民党党员成立中华革命党,但部分支部仍用国民党名称。1919年10月统一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举孙中山为总理,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 二 西康特别区党部

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所向披靡，四川军阀纷纷易帜。1925年北京政府改川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1926年12月驻雅安之原西康屯垦使刘成勋(禹九)，在雅安宣布脱离北洋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3军军长，并成立国民党西康特别区党部，由刘及其部师长孙涵(养斋)、刘国孝任常务委员。次年夏，刘成勋被刘文辉击败下野。这个首次以西康名义出现的国民党组织亦随着刘成勋的倒台而告终，仅是昙花一现。

### 三 西康省党部

#### (一) 筹建经过

西康早在清朝末年便有建省拟议，但辖区仅康属(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一隅，必须将四川之第十七、十八两行政区(即建省后的雅、宁两属，今之雅安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划入，始具规模。但遭到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反对。1938年1月刘在武汉死亡，减少了划出四川之两行政区凑成西康建省阻力，西康建省成功在望。中央党部随即派CC系骨干叶秀峰、周学昌、骆美轮、戚彬如、武文、王守诒等到康定组建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以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和周学昌、骆美轮三人为常委，戚彬如为书记长，武文、王守诒……等为委员，开展党务工作。

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成立，省党部筹委会改为省党部，以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以下简称主委)。同年冬

刘辞主委兼职，推荐其大邑同乡、同盟会会员冷曝东继任主委。1946年冷离康，又由刘文辉以中央委员兼任主委，直至1949年12月起义。

## （二）组织人事

按照规定，省党部应设执行、监察两个委员会，两会委员均由全省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未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之前，省党部仅设一执行委员会，对上对下行文均用中国国民党西康省执行委员会名义，委员由中央党部简派，并在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一监察处履行党内监察职能。从1938年筹建至1947年春召开全省党员代表大会的这段时期，先后曾任执行委员的有：

叶秀峰，省政府建设厅长，离康后曾任中统局局长。

周学昌，后去南京汪伪组织当汉奸。

骆美轮，西康公路局及川康公路管理局局长，离康后任全国公路管理局局长、立法委员。

戚彬如，两任省党部书记长，河北省的国大代表。

杜履谦，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秘书长。

崔子仪，中政校康定分校校长，后离康。

谭其沅（字剑之），西康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1941年在康定落水身亡。

张廷蛟，第二任（代理）省党部书记长，后离康。

武文，第三任省党部书记长，后离康。

任映苍，第四任省党部书记长，后离康。

刘静之，省党部组训处长，离康后任成都县党部书记长兼成都市社会服务处总干事。

颜泽南，省党部宣传处长，后离康。

方兴成，省党部监察处长，国立康定师范学校校长。

谭祖烈，省医院院长。

王守诒，省党部雅安办事处处长，离康后任浙赣铁路管理局特别党部书记长。

高上佑，省党部组训处长兼省参议会副议长、代议长。

王孟周，省党部宣传处长兼省政府社会处长、国大代表，后任省政府建设厅长。

张坦如，省党部宣传处长，西昌办事处处长，后任省政府教育厅长。

杨仲华，省参议员，后任立法委员。

张为炯(字少杨)，先后以省政府秘书长、民政厅长代行省主席。在刘文辉任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期，并兼代省执行委员会主委，是刘在省会康定的代理人。

张辑(字敬熙)，省精神动员委员会主任、国民参政员，后任省政府建设厅长。

陈耀伦(字仲光)，24军少将副官长，西康铁业公司总经理，后任省田粮处长。

胡恭先(字礼安)，省参议会议长，后任立法委员。

1947年春由第 届全省党员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委

员、监察委员会委员是：

执行委员：张为炯、张缉、任映苍、戚彬如、胡恭先、高上佑、陈耀伦、张坦如、方兴成等连任。

新选的有：

袁永馥(字念勤)，三青团西康支团干事长。

徐廷林，省党部科长，后任国大代表。

叶大谦，省党部科长，后任冕宁县长。

侯补委员：李涛(汉源县党部书记长)、杨廷梁(字梓楠，会理县党部书记)……等。

继由中央党部增派王孟周为执行委员。

监察委员：

王靖宇(字治人)，主持全省保安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省训团教育长。

周馥昌(字儒海)，常务监察，省参议会秘书长。

麻倾翁，藏族，省参议员。

杨致中(字子和)，省训团副教育长，后任全省保安司令部少将警保处长。

周福元(字殿华)，省政府会计处会计长。

后由中央党部增派杨仲华为监察委员。

(以上执、监委员因无资料可稽，势难全面、准确，仅供查证参考。)

党团合并后，由三青团西康支团干事会干事、监察会监察转任

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后文三青团一章另有记叙，此处从略。

执行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书记长一人襄助主任委员总揽全省党务（党团合并后，增设副主任委员、副书记长各一人）。下设秘书、组训、宣传、监察四处（监察委员会成立后，撤销监察处）和一直属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调查统计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妇女等运动委员会。处之下设科、室，科、室之下设总干事一人，干事、助理干事、办事员数人。

书记长：初为戚彬如，继为张廷蛟、武文、任映苍，最后仍为戚彬如。

秘书处：由书记长兼处长，下设秘书、人事、会计三室和一事务科。

秘书室秘书：初为高明，继为高上佑、任汉光、蒋化西等。

人事室主任：相继为甘鹏、阳昌伯、邓俊康等。

会计室主任：先后为杨穆谦、巨成玉、庞应藻等。

组训处：处长初为刘静之，继为高上佑。下设组织、训练两科。

组织科科长：相继为陈铨（字训慈，离康后，任上海市警察局的分局长）、徐廷林等。

训练科科长：相继为林澈澄、叶大灏、邓俊康等。

宣传处：颜泽南、王孟周、张坦如相继任处长。下设编审、指导两科。

编审科科长：先后为李开泽、朱兆贵（李之前的科长不详）。

指导科科长：先后为邓俊康、冯有志（邓之前的科长不详）。

此外，曾任组训、宣传两处科长的还有万腾蛟……等。

监察处：处长方兴成。下设稽核、审查两科。稽核科长先后由王传燿、吴传江充任。审查科长先后由吴正江、阳昌伯充任。另设一名秘书。

调统室主任：初为袁逸之，1941年为刘汇川，1942年为蒋华选，1944年为吴汝成，后为王安文。该室名义上属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人事、经济等均隶属中统局。中统局改为内政部调查统计局后，该室并入设于雅安的内政部调查统计局西康调查处，由余仲饒、王安文分任正、副处长。

妇女运动委员会：由刘文辉的夫人杨蕴光和川康边防副总指挥唐英之妻蒋兰芬挂名正、副主任，由省财政厅会办李先春之女李敦权（名华章）主持工作。

政治、经济、文化等运动委员会人员由省内高级官员挂名。如省参议会议长胡恭先、省政府财政厅长李万华、教育厅长向理润等均兼任过这三个委员会的挂名主任。

党团合并后，增设青年运动委员会。以原三青团西康支团书记、省党部副书记长方采芹任主任。

### （三）派出机构

西康幅员辽阔，交通梗阻。为便于开展党务以及就近指导下属各县、局工作，乃分设雅、康、宁三属党务督导员，由省党部科长陈铨、林澈澄、万腾蛟分别兼任。嗣以督导员权力有限，且无办事机

构,乃增设雅安、西昌两个省党部办事处。抗战胜利后一度撤销,1948年又恢复,直至起义。

办事处设处长、秘书各一人,下设总务、组训、宣传三科,科之下设干事、助理干事。因经费不足,人员设置并未齐全。

雅安办事处:前期处长为王守诒,秘书毛云相。后期处长陈耀伦。因陈时任田粮处长,又非党务从业人员,而由副处长刘懋椿主持工作。因秘书郭建藩、总务科长周乐君各有兼职工作,实际是刘懋椿一人唱独角戏。

西昌办事处处长前期是张坦如,后期是省党部代主任委员张为炯之弟、国大代表张为煊(字汉璧)。

#### (四)宣传机构

省党部成立后,中宣部随即爰各省先例,在首府康定创办《西康国民日报》,作为省党部的机关报,人员、经费均由中宣部派任、划拨,日出一中张。1942年夏中宣部派来段公爽任社长,陈立峰任总编辑,改出一大张,每周并增刊一小张藏文版。1944年段调成都任中央通讯社成都分社社长,由陈代管社务。不久,中宣部派丛啸侯为社长。丛原搞事务工作,不熟悉新闻业务,因其裁减人员及扣减职工夜宵费,引起职工不满并以罢工对抗。丛请省党部解决,未能奏效,乃借口回重庆请求中宣部处理而一去不返。兼以报纸空泛说教,内容枯燥,且纸张粗糙,字迹模糊,不受读者欢迎,除省级机关和各县县党部以公费订阅外,几乎无一家自费订户,失去宣传效果,因而停刊。

### (五)培训干部

建省前之西康，并无党部组织。新划入之雅、宁两属的14县两个设治局中，建立县、区党部的亦寥寥无几，开展党务，干部严重不足。为培训干部，省党部先后开办了三期党务人员培训班和一期高级党干班，统称西康党训。

第一期：1939年冬在康定举办，班主任刘文辉、副主任周学昌、骆美轮，教育长高明，军训大队长杨致中（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招考学员约60人，训练时间两个月。毕业后，少数由省党部留用，绝大多数派往各县。因一期党训系刘文辉所办，与刘建立了师生关系，得到青睐，其后大多成为西康的党务骨干，并涉足行政和特务领域。如徐廷林、叶大谦成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并分别兼组织、训练科长，掌握全省组训、人事实权，起义前又分别出任冕宁、盐边县长（徐未到职即起义）；王安文任调统室主任，主管全省“中统”特务工作；杨廷梁、李涛任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杨并任会理县党部书记长达十年之久；周英俊任西康省军队特别党部宁属保安司令部区党部中校总干事等等。其余任县党部书记长的黄秉权、夏光远、王祉善、蒋永和……等更是不胜枚举。

第二期：1941年春在雅安西康省训团举办，班主任冷曦东，教育长刘静之，军训大队长杨致中，招考和调训学员108人（人称“一百单八将”，其中女生达十人）。训练时间两个月。在训练中，中统西康调统室主任刘汇川、军统雅安特别站站长丁国保利用在训练班任职、任教机会，吸收学员加入中统或军统。其后，毛云相、张文

可兼任中统雅区主任。

二期因是冷曦东主办,不为刘文辉重视,并受一期学员的压抑,地位和影响均逊色于一期。但因其人数较多,以及工作需要,仍有 30 多人担任过县委书记或设治局直属区党部书记,如毛云相、余乃襄、熊大武、邓守勋、唐绍炯、余启恩、周乐君、李烈、廖大勋……等。李开华并长期担任 24 军政工处中校科长,吴香兰任国大代表等等。

第三期:附设于 1943 年举办的西康省训团第五期,称省训团党干班。主任教官王守诒(省训团只刘文辉称团主任,其下的专业班、组负责人均称主任教官),训导毛云相,训练时间两月,学员有罗正昌、周辉武、张体煜等约 30 人。因其人数较少,影响不大。

高级党训班:由于各期党训主持人的不同,学员各有倾向,不能协调一致。兼以任映苍任书记长后,亦欲树立其势力;并使党务骨干都成为刘文辉的学生,溶三期党训人员于一体,便于推动党务工作,于 1947 年暑假雅安省训团地址,开办高级党训班,调省、县两级党务骨干约 80 人入班,施以一个月的训练。班主任刘文辉,副主任任映苍、袁永馥,总务长陈耀伦,训导长王孟周,军训大队长曹惠文(雅属区少将保安副司令)。

以往党训均由党务人员主持,向无三青团人员参与。此次高级党训,以三青团西康支团干事长袁永馥为副主任,支团干事会第三组组长(相等于省党部宣传处长)沈桃源为驻队训导,初具党团联合雏形,为即将进行的党团合并创造了条件。

## (六)代表大会

省党部分别于 1945 年和 1947 年原雅安县参议会会址召开了两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的主要议题是选举出席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六全大会”)代表。第二次的主要议题是:听取和审议省党部工作报告;选举省党部执行、监察两会委员。两次大会我都以省训团直属区党部代表参加,经历了一些人当面称“同志”,背地搞阴谋的争权夺利斗争。

### 1、六全大会代表选举

1944 年抗日战争已近尾声,胜利在望,国民党中央决定于 1945 年 5 月在陪都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按照党员人数,西康应选出代表五人。省党部于同年冬通令所属县党部和直属区党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出初选代表,于 45 年春齐集雅安,举行复选。中央党部派监察委员杨虎来雅监选。大会选举刘文辉、张缉、武文、王守诒、冷曦东五人为代表。

### 2、第一届全省党员代表大会

省党部自 1938 年建立筹委会起,直至 1946 年的九年中,因未召开过全省党员代表大会,省执行委员会成员一直由中央派任。而后起之三青团西康支团则分别于 1943 年、1946 年召开了两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选举和改选了支团的干事、监察两会。在体现党内民主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反而落后于团。因此,经书记长任映苍征得刘文辉的同意并由省执行委员会决定,订于 1947 年 3 月假雅安县参议会会址召开第一届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议

程是：听取和审议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省党部执行、监察两会委员，中央派执行委员会委员陈访先来雅监选。会中对第一个议程因是例行公事，没有大的争议。对第二个议程则出现打击原省执委委员王孟周和杨仲华并使之落选的斗争。会后，经王孟周去南京活动，由中央增派其为执行委员，杨仲华为监察委员。1948年杨并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其后，王孟周、张坦如亦相继任西康省政府建设厅长和教育厅长。而一些与王、杨二人并无个人恩怨参加这一闹剧的附和者，不免有受人利用于一时而于事于己无益的感叹。

#### （七）党政关系

北伐胜利后，受国民党监督与指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5月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完成，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一党专政。但各地军阀或各自为政、或阳奉阴违，党的地方组织多受制于当地军政首要，党政关系极不协调。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强调党制，调整党政关系，确定三项原则：

- （1）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简称以党统政）。
- （2）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简称党政联系）。
- （3）县市采取党政融化的形态（简称党政融化）。

按照以上原则，党的地方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于联系或融化地位，而无中央的监督、指导权力，仅设立一党政特别小组进行联系。

省属保安、防空、军管区系统的党务，均隶属于中央组织部军

队党务处之西康省军队特别党部及其改称后之全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办理,不受省党部的领导。

原属党部管理的人民团体(注)、社会服务、社会运动等工作,自1942年3月省政府民政厅设立社会科(后扩大为处)后,亦移交给政府部门管理,而由省、县党部委员兼任省、县政府社会处、科之处、科长。

西康是刘文辉的天下,对待中央的态度是:军事关门(拒绝中央军队进入西康),经济开门(允许中央的财税、金融等部门在西康设立分支机构),政治半开门(容纳部分中央人员来康任职)。在刘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时期,党务受其指挥是名正言顺。在不兼任党的首脑时,党务工作亦是听命于刘。如有不利于刘的言行,轻者冷遇、孤立,重者礼送或撵走。如刘要赶走由冷曝东邀约来西康任省党部书记长的张廷蛟和组训处长刘静之,冷亦莫可奈何,只好从命。致使刘静之由一主管全省组训工作的处长,回川后仅任一成都县党部书记长。再如由中央派遣来康任省党部委员和省政府建设厅长的叶秀峰,因不受刘的欢迎,也只好回重庆另谋高就(后任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因此,西康的党政关系名为联系,实为从属。不仅从属于刘文辉,且从属于刘在康定的代理人——省政府代主

---

① 注:人民团体包括职业、社会团体两大类。职业团体分为:农民、渔民、工人、工商、自由职业五种团体。社会团体分为:文化、宗教、慈善、公益、妇女和体育卫生六种团体。

席、省党部代主任委员张为炯。在主任委员不在时，不由书记长代行，而由委员代理，书记长反而听命于代主委的委员，在全国的各省、市党部中实属少见。

#### (八) 党员素质

按照《党章》规定，吸收党员应按：本人申请，区分部通过，省、县党部批准的程序办理。而在西康，大多是利用政府部门举办各种干部训练机会，如：西康省保训合一干部训练所、西康省财政人员训练所、西康省合作人员训练所、西康省地方干部训练团……以及各县举办的县政人员训练所等，吸收受训人员集体加入。因国民党居于执政地位，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干部的任用、升迁，按常规须报中央铨叙部叙级。如无国民党党籍，铨叙将受一定影响。因此，一些人的入党，并非对其有所认识，对三民主义有所理解，多数是为了工作，有工薪收入吃饭；少数是趋炎附势，谋求个人升迁；有的则是恐不入党而被怀疑为异党分子。在受训期中入党回到原工作单位后，多数未编入区分部组织，参加区分部活动。兹以个人为例：

我自 1940 年夏在中央陆军步兵学校受训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后，直至解放的近十年中，除于 1941 年调入西康省训团受训期中，因在民政组区分部委员选举中得票领先，被省训团区党部指定为民政组区分部书记外，其余时间，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区分部，更未参加过一次区分部活动。组织隶属关系亦不明确。如说我的组织关系在工作单位雅安县参议会，我却代表省训团出席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如说我的组织关系在省训团，我又是雅安县党部委员

和县参议会党团干事会干事。而且作为委员、干事，居然没有参加过一次县党部委员会和县参议会党团干事会。因为县党部委员除个别在党部工作领薪者外，多数是挂名。县参议会党团干事会是县党部应付省党部在未通知组成人员的情况下而上报的名单。如果不是因编写《雅安市人大志》查阅历史档案，我还不知道县参议会有一组织，更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头衔，若非亲身经历，其谁信之！

象我这样一个被视为“党团骨干”的人尚且如此，其他党员便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其基层组织的涣散。党员虽遍及全国各级军政官员和工农兵学商各界，人数众多，貌似强大，但其党员素质则很成问题。如其问某个党员为什么参加国民党？将说不出真实的原因；如再问其《党员守则》有多少条？内容是什么？多数是茫然无知。既无党性，又无原则，党员虽多，但大都图谋私利，对党缺乏向心力；组织虽广，但涣散松弛，缺乏凝聚力，更无战斗力。兼以领导层的腐败，致使一个执政党成为庞然大物，以失败而告终。

#### （九）濒于瘫痪

国民党执政后，其党务经费全由国库拨款并列入国家预算，党务专业人员则以“从政甄审”名义报中央铨叙部叙级，享受政府官员特任、简任、荐任、委任级别的同等待遇。1947年元旦宣布“行宪”，进入“宪政时期”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经费都是自筹，国民党摹仿西方的所谓“民主”，“行宪”后如其党费仍由国库支付，则与其标榜的“民主”及其制订的《宪法》不协调。二是为了装点民主门面，掩饰一党专政，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参加其

政府，如其党费仍由国家开支，青、民两党势必要求沿例。三是因进行内战，军费支出庞大，导致通货恶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国库空虚。因此，国家拨款始而减少，继而停发，要求各级党部自筹。而在西康，刘文辉对国民党党务仅是应付，向不热衷。多数党员鉴于国民党的行将崩溃，更不愿解囊相助。省、县党部难以为济，不得不大量裁员，致使一些“吃三民主义饭，穿三民主义衣”的党务专业人员失业，怨声载道。起义前，省党部只剩书记长戚彬如和干事杨清和等人，雅安办事处仅副处长刘懋椿一人，雅安县党部只有副书记长邓首勋、组织干事余启恩二人，奄奄一息，濒于瘫痪。

#### （十）末日挣扎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在四川彭县会同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后，台湾当局撤销了刘的党政军本兼各职，另委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为西康省政府主席，李狄龙为省党部主委，在西昌另行组织省政府和省党部作末日挣扎。田中田残部窜踞康定时，杨仲华、张坦如、戚彬如等在康定组织“反共救国委员会”，拥退居新都桥之24军康定行营主任、原川康边防副总指挥唐英（永晖）为主委，并由台湾当局委唐为24军军长，拉唐下水。杨、张、戚等复成立“康定政务委员会”，与西昌之贺国光遥相呼应。解放初，西昌办事处处长张为瑄在德昌，雅安县党部委员罗良君在雅安伙同青年党人李楚湘，组织土匪暴乱，均被平定，首要份子伏法。在西康经历了十二个春秋的国民党西康省党部及其下属组织从此消亡。

## 第二章 青 年 党

### 一 基本概况

1923年5月，山东临城发生巨匪孙美瑶纠合土匪一千余人拦劫京沪快车，并掳去中外乘客一百余人（其中外籍旅客二十余人），勒索巨额赎金的临城劫车案。中外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北洋军阀政府。帝国主义趁机掀起反华恶浪，瓜分中国谬论甚嚣尘上。其时在法国的曾琦、李璜等乃于同年12月2日在法国巴黎发起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一般称“国家主义派”）。打着“国家高于一切”以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招牌，宣扬“全民革命”，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

1924年曾琦回国，与左舜生、陈启天等在上海创办《醒狮报》，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故又称“醒狮派”，对其不满者则蔑称为“狗儿派”。1929年在沈阳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始正式定名为中国青年党，其下仍设国家主义青年团作为预备党员。

该党在未投靠国民党之前，被国民党视为“异党”，遭受排斥。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但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对其他各党派也加紧实行“消灭异己”的政策。各党派为谋求生存，由中国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6个

党派联合,于同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该党仍是民盟的团体成员之一。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参与国共和谈。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该党和民主社会党被国民党收买,脱离民盟,公开投靠国民党,参加“制宪国民大会”,为国民党政府装点“民主”门面。仅四川一省由国民党政府名为“遴选”,实为指派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就有:李璜、曾琦、何鲁之、谢秉钧、廖壮成、林立、宋益清、杨永浚、龚从民、闵达、施德全、姜蕴刚、王师曾、刘天枢、吴天墀、廖海涛、张伯伦、郑西屏、李暄荣、易维精、夏其元、陶元珍、祝雨亭、张化初、陈翰珍、刘东岩、周蜀云、陈善新、黄石子、邹梓芳、费明扬、刘泗英、喻孝权等33人之多。1947年公开参加国民党政府出任要职如:曾琦任国民政府委员,左舜生任农林部长,陈启天任经济部长,杨永浚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等。充当国民党附庸。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该党总部亦随之迁台。左舜生并在香港创办反共刊物《自由阵线》。

## 二 杨永浚奠基

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建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委员长,推荐青年党之杨永浚(字叔明)为省建会秘书长,经行政院批准任命。杨遂引荐该党党员王师曾为省建会主任秘书,郑少成为省建会视察员。其后王兼康定县长,郑外放德格县长。

次年省建会移设康定，因刘文辉兼任 24 军军长常驻雅安，由杨主持省建会工作。1937 年初，省建会在康定举办西康省县政人员训练所（以下简称县训），杨利用招生机会，录取该党党员徐思执、高介夫、陈升朝、欧阳枢北（以后自动退出青年党）、许荣范、蓝希夷、刘可道……等入所受训，利用县训训练机会为该党培训骨干，为在西康发展成员及建立组织奠定了基础。其后该党在雅安成立西康省党部，领导成员大多是当年的“县训”学员。因杨利用职权发展青年党势力，受到复兴社成员、24 军 136 师少将参谋长金传九等的攻击，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筹委会委员、CC 系骨干戚彬如等对杨亦有非议。为避免复兴社、CC 系对杨的责难，以及因重用杨而受国民党中央的指责，因此，西康省政府成立时，刘文辉不再推荐杨任省政府秘书长，只安排为省政府委员。从此，杨虽不在西康担任要职，只任过西康省训团政治总教官，但仍继续领导西康的青年党，对引荐青年党人到西康工作，扩展青年党势力发挥重要作用。

### 三 刘文辉支持

刘文辉因早年曾附和唐生智、闫锡山等两次通电反蒋，与蒋介石结下宿怨。后虽在复杂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运用灵活的政治手腕，使矛盾有所缓和并担任要职，但对蒋仍心存芥蒂。为了免遭蒋的宰割，广交政治朋友，对各党各派，只要不反对他，不在其统治区内兴风作浪，都一概兼收并蓄，进而为其所用。青年党由一些政客、

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既无实力，又无地盘。为谋组织的生存和个人的升官发财，早年曾依附云南的唐继尧、东北的张作霖以及吴佩孚等军阀势力。唐张去世、吴遭失败后，各自寻找新的靠山。

杨永浚以清王朝候爵嫡孙、青年党首要投靠刘文辉时，刘正从四川军阀最后一次内战中失败，退居西康僻处一隅的逆境之中，患难相交，倍感亲切，刘委杨省建会秘书长重任，杨则以刘马首是瞻。该党在西康的骨干又多是刘的学生及部属，更是对刘唯命是从，把刘奉为中国的基马尔（土耳其总统，以实行国家主义、资产阶级专政而著名，被称为“基马尔主义”）。因而受到刘的青睐，予以庇护，并在工作安排上优于刘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国民党人。兹略举几例：

（1）1941年西康实行“新县制”，以雅、汉、西、会四县为试点，在刘文辉任命的四县县长中，雅安县长青伟（字成烈，离康后，曾由青年党提名一度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汉源县长刘东岩（字裕常，曾兼任西康省训团训导处副处长，后任青年党中央青年部长）、西昌县长郑少成都是青年党。会理县长聂泗（字叔轩，后病死）虽非青年党，但政治态度倾向于青年党。青伟并兼任省训团一、二两期的新县制讲师，在讲台上大讲新县制的管、教、养、卫、对民众如何管之、教之、养之、卫之，而在私人场所竟讥讽新县制是：“管教养卫四个字、油盐柴米一元钱。”因而引起议论：一是国民党制订的新县制，在西康首先试行的四县中居然由青年党人主持，有损国民党的颜面；二是在全省干部训练团主讲新县制的讲师公然在私

人场所讥讽新县制，言行不一，使新县制减色。1942年8月西康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召开第三次大会，国民党雅安籍参议员李廷俊（字升三）向大会提出《雅安县长青伟违法渎职，应请省府撤职查办，以肃官箴案》，列举了：纵匪殃民，勒发米价，私收公款，擅自派款，巧术挪移，化公为私，侵蚀斗息等七大罪名。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加具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通过，送省府派员查明，依法分别办理。省政府碍于刘的情面，既不查，更不办。由刘改任青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副秘书长，不了了之。使李廷俊和省临参会啼笑皆非。

(2)刘任命的青年党县长中，除上述几人外，还有：

王师曾，康定县长。

徐思执，先后任雅安、荣经县长。

骆政侯，先后任汉源、越西县长。

许荣范，雅安县长。

黄钊（字卓生），荣经县长。

叶大镛（字剑鸣），汉源县长。

吴天墀，芦山县长。

靳鸣霄，宝兴县长。

欧阳枢北，瞻化（今新龙）县长。

任县级设治局长的有赵宗华、蓝希夷等。

在县长主宰县政，不受国民党县党部支配的年代，该党人员有十几人任县长，且多是富庶之区，并在县政府大量安插该党人员。如青伟任雅安县长时之县政府秘书朱植民、民政科长张彦生、军事

科长刘某、教育科长何国俊都是青年党人。财政科长杨茂举虽非青年党，但系该党骨干郑少成的妹夫。

从西康建省至起义的 11 年之雅安 6 个县长中，便有 3 个是青年党，且任期长达 6 年之久。由此可见刘文辉对该党的倾向以及该党在西康的影响。

(3)任用青年党的徐思执、汪潜、吴天墀、欧阳枢北、许荣范等为其秘书，靳明霄为家庭教师。其中许荣范和上述的青伟并为其撰写讲演稿。

他如以青年党的高介孚为省政府秘书，陈升朝为省田粮处主任秘书，邓凯南为省立西昌中学校长等就不列举了。

#### 四 参与国民党人事任命

青伟原依附刘湘，任刘部教育科长，主管刘统治区之教育工作。到雅安任县长后，为取悦于刘文辉，1941 年冬召集雅安各机关法团首脑在县政府礼堂为刘文辉祝寿，刘偕夫人杨蕴光亲临，杨并将祝寿大蛋糕切成若干小块由招待员分送给与会人员，气氛甚为热烈，在雅安亦属创举。而县党部书记长张锡福（字祉滋）的发言却很不得体，引起刘文辉的反感，问青：“此人是谁”？青说：“县党部书记长张祉滋，日本留学生，黄逸民（即黄隐，时任川军邓锡侯部师长兼江防军司令）的妻兄。”刘说：“如此语无伦次，怎能当书记长，另外找人。”青因到雅安不久，提不出适当人选，就商于县财务委员会

主任兼县总工会理事长李桂华和县农会理事长赵学尧。李赵推荐早年曾任国民党雅安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李陶然(名汝皋),并将李之简历书写交青。青即送呈刘文辉。刘命青拟一电稿发给省党部主任委员冷曦东,任命李陶然为国民党雅安县党部书记长。冷不便违抗,只好遵命照办。李就职之日,青亲赴县党部祝贺,给李捧场。

一个执政党的县委书记竟然由当时还被列为异党的人推荐任命,一时引为奇闻怪事。但因是刘的授意,国民党人纵有烦言,亦莫可如何!

## 五 正式出场

该党投靠国民党后,结束了“尤抱琵琶半遮面”状态,成员纷纷亮相,正式出场。首先在雅安苍坪山杨永浚故居由下列人员组成中国青年党西康省党部。

主席徐思执,字允中,崇庆县人,曾任刘文辉的秘书及雅安、荣经县长。

委员兼秘书长高介孚,崇庆县人,西康省政府秘书。

委员兼外事处长郑少成,乐山县人,24军上校副官长,曾任德格、西昌县长。

组织处:委员兼处长陈升朝,字梅庵,金堂县人,西康省田粮处主任秘书;副处长叶大镛,字剑鸣,华阳县人,曾任24军137师少

将参谋长及华阳、汉源等县县长。

宣传处：委员兼处长许荣范，新津县人，刘文辉秘书，后任雅安县长；副处长李楚湘，曾任荣经县政府军法官。

委员邓凯南，西昌县人，省立西昌中学校长，曾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其次是依据国民党政府制颁的《各省市县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请选补充规程》，该党提名叶大镛、靳明霄、杨明耕三人为西康省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于1947年12月由行政院遵拟呈报国民政府核定，使该党人员不经法定选举程序便进入了“全省人民代表机关”参与省政。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时，人民解放军已由全面防御转入全面反攻。国民党为把青年、民社两党绑上反共战车，给予两党近九分之一的代表名额，并制颁《政党提名补充规定》，规定：“如三党党员未经所属政党提名而依法签署者，不得为候选人。”以保证青民两党候选人的获选。该党西康省党部提名徐思执为同普县、高价孚为盐井县、赵宗华为乾宁县、蓝希夷为定乡县、黄钊为天全县代表候选人。其中同普、盐井两县为藏军占领，乾宁、定乡两县少数民族居多，都不经选举便能成为“国大代表”。天全县因刘文辉安排大学教授杨声（字懋实）而以荣经县长与黄钊交换，黄也乐于担任县长实职。但杨到南京后，中央选举委员会却不给杨发当选证书，措词是：“青年党、民社党提名的选区，签署提名当选之国民党员应予退让。”经杨约同西康省政府秘书长

陶世杰和我会见内政部长兼中央选举委员会选举事务总所总干事张厉生说明情况后，张仍感到为难，并说：“按照三党办定，如青民两党提名的候选人缺少一名，他们将全体不出席大会。三位先生最好去找青年党总部，只要他们同意，我立即给杨先生发当选证书。”我们随即去会青年党中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杨永浚。杨得知是刘文辉的安排，便一同乘车去会张厉生，代表青年党同意西康的处理方案。杨声始得出席，并由西康代表团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由此可见这一选举的虚伪以及青民两党乘国民党之危对其施加的压力。

在西康的5名监察院监察委员选举中，该党占有一女性监委名额，但又提不出适当人选，而由杨明耕以亲属关系推荐其婢娘杨琼仙。杨系一家庭妇女，不谙政治，居然成为主管全国监察工作的监察院的一员，从而引起非议，连主持这一选举的省参议会议长胡恭先亦很不为然，解放后曾撰文批评。

建立康定、西昌办事处及市、县党部。康定办事处由国大代表赵宗华负责，西昌办事处由邓凯南主持，雅安市党部以原雅安县国民兵团副团长邓英（字维英）任主席。

吸收24军副官处总务股主任杨国治，137师营长胡德轩、副营长曾朝富，天全袍哥头目高鉴明，芦山县乡长牟国材，雅安县长宋世昌……等加入该党，扩展实力。此外，还由杨永浚直接吸收一个24军高级军官为二级（秘密）党员。

## 六 起义前后

为协调西康的三党关系，给起义铺平道路，经刘文辉授意，1949年春三党省党部各派代表3人在雅安经几度协商，取得了随刘文辉行动、与刘步调一致的共识。因此，西康起义时，该党西康首要徐思执、郑少成、陈升朝、许荣范、叶大镛等都加入了起义行列。杨永浚在刘文辉的影响下，还在四川利用与国民党兵团司令罗广文的连襟关系策反罗部起义。但仍有部分党徒逆历史潮流而动，自取灭亡。如：

高介孚迫于形势在雅安参加起义后，竟潜赴富林依附“西南反共第二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死于乱军之中。

邓凯南在西昌依附贺国光，出任西昌县长。解放后判刑15年。

李楚湘在雅安化名李麟，纠合该党雅安市党部组织科长龚信孚，雅安县民众自卫副总队长罗良君，24军营长胡德轩、副营长曾朝富、连长童定邦，军统特务李国骅，恶霸毕光奎……等组织“反共救国军”，自称“总司令”，杀害人民政府派往区乡的工作人员，并于1950年春节纠集各地土匪、恶霸武装围攻雅安县城，迫击炮弹打到河北车站，气焰甚为嚣张。人民政府运用政治分化、军事打击策略双管齐下，终将匪众击溃，李楚湘、龚信孚、毕光奎、曾朝富、童定邦、罗良君等相继伏法，胡德轩被击毙，李国骅自首被判刑15年。一场暴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 第三章 民社党

#### 一 依附国民党

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是由以张君勱为代表的国家社会党和以伍宪子为代表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原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6个党派成员之一。张君勱并任民主政团和民盟中央常委,1946年1月出席旧政协,参与国共两党和谈。不久,被国民党收买,脱离民盟,于同年11月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扮演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联合角色。国民党则在其政府部门和民意机构中给予少数名额,予以笼络。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在分配给该党的一百名代表中,有的候选人因形象不佳遭到选民唾弃而落选。为使该党和青年党的落选者都能出席国民大会,国民党政府制颁了《政党提名补充规定》,强迫签署提名当选的代表退让,从而引起签署提名当选代表与政党提名落选代表之争,演出绝食请愿、抬起棺材请愿等等闹剧,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副总统选举时,该党推出徐傅霖参加竞选,明知不能当选而甘当陪衬,给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宪政”捧场,充当国民党的小伙伴,直至逃离大陆,流亡海外。

#### 二 进入西康

1947年1月国民党宣布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改选省、市、县参议会参议员，给予青民两党少许名额。该党中央派四川省党部委员闵锡如来康，会同国民党中央所派之熊克武、青年党中央所派之谢慕沙协商三党西康候选人提名工作，并乘机发展党员，在西康建立组织。

闵，四川高县人，早年毕业于24军军事政治学校，曾任24军连、营长，后为宜宾“合叙同”的袍哥大爷，是刘文辉的学生、旧部，与刘部的中、上级军官有同学、同事旧谊。基于这一历史渊源，闵奉派后，遂偕同其秘书李君舫、工作人员张国英等携民社党党章、入党申请书等，于同年夏到雅安，住24军直属工兵营营长刘济民家。首先晋谒集西康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刘文辉，说明来康任务，请刘支持，经刘首肯。然后走访军政首要及各界人士，为在西康开创该党局面创造条件，旋去康定，留李君舫在雅安开展工作。

### 三 党袍联姻

该党在西康既无党员基础，又无党的组织，兼以闵锡如的军政地位不高，袍哥大爷的形象欠佳，高级军政人员及知名缙绅多不愿与之伍，参加该党居闵之下。因此，发展对象只能倾向于中、下层。而当时的军政人员大多参加了国民党，要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就不得不采取各方游说、封官许愿等手段挖国民党的墙脚。从权光

烈参加该党经过，可见一斑。

权光烈，字锡臣，原为屏山青年袍哥首脑，20年代初，随屏山袍哥大头目覃筱楼招安到时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的刘文辉部，入刘所办之“军官传习所”。毕业后，长期任刘部营、团长。40年代初，在雅安成立“忠义社”袍哥组织，任总社长，是较有影响的袍哥首领。1947年3月卸任宝兴县长后，闲居雅安，认为“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常想东山再起。遂伙同雅安县参议会议长孙述尧（名德明）等成立“西康民治研究社”，意图在雅安的“国大代表”等选举中捞取政治资本。因其支持的国大代表候选人王天择为国民党中央朱家骅系人物，遭到选民和西康当局的唾弃而未得逞，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被闵锡如所看重，登门拜访，继又请孙述尧从中撮合，向权说：“闵锡如很敬佩你，打算找你任民社党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权以“我是军人，不懂政治，”婉言谢绝。孙说：“这比耍袍哥要强些。”权遂为所动。后由李君舫访权游说。因李、权二人均吸食鸦片，嗜好相同，李知权常在东大街杨思俊和文毛坝张学荣的烟馆吸烟，便到张学荣的烟馆与权同踞一榻，吞云吐雾，及至烟瘾过足，便谈论时事，彼此逐渐熟悉。一日，李忽然向权说：“现有一桩赚钱生意，你干不干？”权问：“什么生意？”李说：“三票当选监委。”权请道其详。李说：“我党在西康有一监委名额，原来推荐的是刘（文辉）主席的老师刘鸿逵，刘主席已同意。但因刘不是西康人，省参议会不同意。我党还提不出适当人选。你是刘主席的旧属，在雅安居住有年，有房地产，我想，你来干最适当不过了，只要你把履

历交给我寄给闵锡如，由他提交中央党部通过，转三党联合办事处，发还西康省参议会照选。我党在四川支持了青年党，青年党在西康支持我党，有交换条件，选举时，国民党一票，我党一票，青年党一票，这就是三票当选监委。”对选举程序一无所知，竟不知监察委员是由省参议员选举产生，国、民、青三党各一票并不能当选，而又不甘寂寞的权光烈居然心花怒放，立即答应“试试看。”李又说：“有个先决条件，必须先参加民社党。闵锡如早就叫我聘你担任我党西康省筹委委员，因我与你不够熟，曾托孙述尧转达此意。”权说：“好，就这样定了。”一桩政治交易便在烟馆里达成，袍哥首脑的权光烈一跃而成为民社党西康省筹委委员。权并将其忠义社副总社长李忠孝，骨干杨益谦、余乃骧、李云初等安排为民社党雅安县筹委委员，用忠义社充实民社党，扩展他在民社党中的实力。

闵锡如并利用参加西康三党联合监选委员会有利条件，由民社党提名原军事委员会上校参议胡鲁藩为国大代表，经西康省选举事务所安排在藏军占领之左贡县，不经选举，便当上了国大代表，提名雅安《健康日报》经理左东枢、荣经县原财委会主任孙永嵩为西康省参议会参议员，由行政院遴拟呈报国民政府核定，扩大了该党在西康的影响，吸引了一些中级军政人员参加该党，为建立省筹委奠定了基础。

#### 四 省县筹委

1948年4月，在雅安大南街曾铸九住宅（今雅安市工商联）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

主任委员闵锡如。

委员兼秘书长李君舫。

委员兼组织处长权光烈。

委员兼宣传处长刘登礼（原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副官处上校科长）。

委员兼财务处长黄晋侯（24军军需处上校副处长）。

委员曾铸九（原24军某部副官长）、龚耕耘（原24军团长）、杨桂五（康属保安副司令）、陆昌国（省政府财政厅科长）、庾应权（省政府卫生处科长）、张为英（原川军李家钰部副旅长）、胡鲁藩（国大代表）。

秘书韩德志（雅安县税捐处副处长）。

书记张国英。事务宋养廉、曾永全。

雅属党务督导汪铎（又名汪玉华，雅安县参议员，国民党雅安县委委员。）

以上委员，李君舫、权光烈、刘登礼、黄晋侯、曾铸九常住雅安，如闵锡如离雅，即由此5人主持省筹委工作，共同决定重要问题，李君舫并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龚耕耘、杨桂五、陆昌国、庾应权住康定，张为英、胡鲁藩住西昌。设立康定、西昌两个省筹委办事处，由住当地的省筹委委员负责，分别领导康、宁两属党务。其中除陆昌国来雅安开过一次省筹委会外，余均未来过雅安。

省筹委成立后，即四处活动，物色人员，在雅属 6 县建立了县党部筹委会：

雅安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德庄(24 军工兵营军需)，副主任委员李忠孝(24 军特务营副营长)，委员兼宣传科长杨益谦(雅安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委员兼组织科长刘锡昌(西康省田粮处主办科员)，委员余乃骧(西康全省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议)、李云初(袍哥大爷)、胡泰忠(原三青团干部)、叶季文(雅安县警察局科长)、蒋文渊(商人)、刘锡九(商人)、蒲云程(商人)。

天全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明呈(24 军军部副官)，委员黄元钊(思经乡长)、杨光照(永兴乡长)、高荣光(多功乡长)、高乐昌(特种保安中队长)、高汝鑫(袍哥大爷)、王芝槐。

芦山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孟体富。

宝兴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何世映(县参议员)，委员陈开桂(省参议员)、凌会弟(县卫生所所长)

荣经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德超，委员宋金人(学生)、刘树文(荣经城西镇副镇长)。

汉源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羊德清(原川边代理各军总司令羊仁安之孙)。

以上 6 个县筹委，雅安、天全、芦山曾开成立大会，省筹委并派员参加；荣经、宝兴未举行成立大会；汉源受派后并无行动。

## 五 几起闹剧

(1)在省筹委未成立之前，闵锡如来往雅安均住刘济民家，在雅安、荣经开创民社党局面，亦多赖刘之明匡暗助。为表酬庸，闵遂委刘之妻兄孙德庄、族弟孙德超分任雅安、荣经县筹委主委。但孙德庄为一商人，不谙政治，对党务工作更是外行。而雅安是西康门户，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以一商人、营部军需而任县筹委主委，形象既差，更不易开展党务。李君舫仍另觅雅安县立中学校长陆续伦为主委。于是出现一个县竟有两个民社党县筹委主委的双胞案。因孙德庄是刘济民的妻兄，闵锡如不能开罪于刘，改委陆续伦为省筹委直属区党部主委。陆以李君舫出尔反尔，不讲政治信誉，且其兄陆叙伦是 24 军军需处掌握实权的副处长（后升处长），姐夫王玉岗系刘文辉之妻杨蕴光的至戚，又是省会康定握有军事、经济实力人物，本人在政治上并不依靠民社党，拒不接受直属区党部主委的任命，引起纷争，并与民社党疏远，以示抗议。

(2)1948 年秋，雅安县筹委会在大北街天兴茶店举行成立大会，邀请在雅的省筹委全体委员出席指导，而县里仅有县筹委委员参加，无一普通党员，会场冷冷清清，县筹委人员感到很不光彩，临时在街上遇有熟人便拉去开会，并许天兴茶店工人吃油大，参加成立大会，东拉西凑了约 30 人，并照了像。一时传为笑柄，遭到李君舫的指责。权光烈便以充实基层为借口，将其忠义社的部分支社改为民社党的区分部，使一些不知政党为何物的袍哥份子成为民社党党员。党袍一体，成为趣谈。

(3)1948年9月,天全县筹委在文庙召开成立大会,省筹委派权光烈前往参加。乡长、袍哥大爷的县筹委们为了显示力量和欢迎这位袍哥总社长的该党省筹委会组织处长,均带领武装随从参加,与会的一百多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会场戒备森严,比袍哥集会尤有过之,闹得全城惊恐不安。县长王昭文亦大为震惊,惟恐发生事端,影响社会安宁。所幸平安散会,筹委们所带武装各返乡里,仅是一场虚惊而已。

(4)该党提名之省参议员原为孙德庄的族叔孙永嵩(名孙雨膏,永嵩是其字)。孙用孙雨膏名选为“国大代表”后,便将省参议员让与其侄孙德超。省筹委秘书长李君舫因接受了孙德超的贿赂,居然同意孙德超冒名顶替乃叔孙永嵩之名出任省参议员。被知情者传为丑闻,政党奇观。

## 六 三党协商

民社党在西康白手起家,主要是挖国民党的墙脚,拉失意或在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充当该党骨干。此举早已引起国民党的不满。青年党对于闵锡如以一袍哥头目而任民社党西康首脑,不择手段地招收党徒,亦不耻其人。青年党西康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许荣范在遇见闵时,当面点头招呼,一转身则予以讥讽:“异哉,此之所谓党魁也者!”两党头目极不融洽。因之,民社党在天全成立县筹委会闹得满城风雨时,各方皆啧有烦言,天全县长王昭文并向刘文辉

呈述民社党给天全造成的隐忧。因天全地方武装之多，社会秩序之乱，向称雅属之冠，常以私怨而械斗仇杀，闹得县无宁日，人民深受其害。青年党已在天全发展了该县著名袍哥首领高鉴明、徐剑侯（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等加入青年党，笼络地方势力。民社党又去介入，亦以武装头目为对象，势必助长地方势力的纷争，不利于刘文辉的统治及安定地方、和平过渡的起义布署。刘除对权光烈训斥外，并于1949年春指示西康的国、民、青三党在雅安进行协商，协调三党关系，消除西康起义隐患。经商定各派代表3人参加。国民党派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组训处副处长胡泰华，省党部监察委员兼雅安办事处副处长刘懋椿，国大代表高秉鑫；青年党派西康省党部主席徐思执，省党部委员兼外事处长郑少成，省党部委员兼秘书长高介孚；民社党派西康省党部筹委员会委员兼组织处长权光烈，省筹委委员兼秘书长李君舫，省筹委委员兼财务处长黄晋侯。首由国民党西康省党部委员兼雅安办事处处长陈耀伦邀请全体代表在其苍坪山住宅“半随尘居”宴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传达刘文辉指示，要求三党团结一致，共同“应变”。根据刘的指示，确定了两项协商议题：一是三党行动应与刘主席保持一致；二是三党发展组织应互通声气，避免人事纠纷，确保地方安宁。继又在菩提街权光烈家、西城街郑少成家进行协商。因出席代表除李君舫外，均为刘文辉的部属或学生，表面上达成了上述协议。其后不久，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大家都忙于“应变”，三党协商便无疾而终。

## 七 僵旗息鼓

闵锡如既无较高的军政地位，又无雄厚的经济基础，更非学者名流，其所以能在西康创建民社党，主要是靠游说、许愿等手段。一些人参加该党，是企图利用该党登上政治舞台，彼此都是利用。有利则聚，无利则散。李君舫以民社党提名权光烈为监察院监察委员为诱饵，使权上钩，结果权连候选人资格都未取得，自然谈不上当选了。遴选之民社党省参议员左东枢在成都办《社会日报》，未赴康定参加省参议会的监察委员选举；孙永嵩（实为孙德超）的一票以荣经同乡关系选了黄汝鉴。青年党的三名省参议员选了该党提名的杨琼仙。所谓“我党在四川支持了青年党，青年党在西康支持我们，有交换条件”之说，纯属骗局。骗局既被揭穿，权光烈及其同情者自然由失望而不满。开以权已由刘文辉委任为“西康全省保安司令部雅荣天芦边境联防司令”，政治上对民社党的期望不大，不愿再为民社党党务而尽力。荣经的孙雨青利用民社党取得国大代表后，便不予理睬。荣经的民社党也就仅有其名。因孙是刘济民的妻叔，闵锡如对之莫可如何。这样内部发生裂痕。

由于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刘文辉对西康民社党不予支持。一些人亦不愿为右翼政党殉葬，大都想另谋出路，黄晋侯、杨明星、汪铎、刘锡昌……等参加了民革。

经济上亦感拮据，连省筹委会工作人员的伙食都难于维持。陆

昌国在康定曾以“打会”方式筹措了约值黄金 10 两的经费，权光烈、黄晋侯、刘登礼、曾铸九亦曾多次接济，但终非长久之计，闵锡如、李君舫实难再开口筹钱，罗掘已穷。

基于上述多种原因，闵锡如自知前景堪虞，遂于 1948 年冬以筹集党费为名赴成都，一去不返。省筹委会工作人员张国英、宋养廉等也离雅他去，一走了事。丢下李君舫一人形影相吊，一愁莫展。曾铸九因出卖了住房，催李迁搬。李连吸鸦片的钱都时有困难，那里还有钱佃房居住，只好于 1949 年夏离雅赴蓉。成立仅一年余的民社党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还未来得及正式成立，就偃旗息鼓了。

1949 年闵锡如回川南高县，以袍哥身份，纠合一批地痞、流氓，依附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胡长青，被委任为新九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时，在川南负隅顽抗。解放后，难逃人民法网。

## 第四章 三青团

### 一 创建与夭亡

三青团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 年 7 月 9 日在武汉成立。团长蒋介石，书记长相继为陈诚、朱家骅、张治中，实权由先后任组织处长的康泽、蒋经国掌握。自称是：“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国民党的新血液”。成立的目的是：“国民革命新力量之集中，以求三民主义的具体实现。”组织系统是：全国设中央团部，办事机构为处；省和特别市设支团部，办事机构为组；行政督察区和省辖市设区团部，办事机构为科；县和大专院校以及重要机关设分团部，办事机构为股；分团之下设区队或直属分队，区队之下设分队。中央团部及支、区、分团部均设干事会和监察会（筹备期间只设干事会），区、分队设正、副区、分队长。组织庞大，团员遍全国。

1947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并入国民党，取消三青团名义，团员一律登记为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青年部，以陈雪屏为部长，后由蒋经国主管。出生仅10年的三青团就此夭亡。

## 二 西昌区团

西康建省后，蒋介石即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监视刘文辉和云南之龙云。1939年9月中央团部派原复兴社中层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西昌人陈志明为三青团直属西昌区团筹备处主任，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张敦品、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秘书长杜履谦、西康省保安团队特别党部书记长张练庵、24军参谋长伍培英、彝族实力人物曲木藏尧和雷孝实、季福生等为筹备处干事，聘请刘文辉和行辕主任张笃伦、西康技专校长李书田为筹备处指导员。筹备处设主任、书记各1人，科长3人，

办事人员若干人。

干事兼书记季福生。

第一科(主管总务)科长廖永康。

第二科(主管组织、训练)科长张伯伦。

第三科(主管宣传、社会服务)科长王隆映。

筹备处成立后,即在西昌开展组织宣传工作,首先在技专及中等学校建立区队,吸收各校学生入团,继又将技专校区队扩大为分团,并组建西昌分团,由季福生、王隆映分别兼任两个分团筹备处主任。

因区团工作范围仅限于宁属,不能涉足雅康两属。1940年3月中央团部乃将直属西昌区团升级为西康支团筹备处,区团结束。

### 三 西康支团

#### (一)支团迁雅

随着区团的升级,陈志明亦由专区一级的区团主任升为省一级的支团筹备处主任,支团指导员仍是刘文辉等3人;干事除季福生一人外,余均连任,并由中央团部增派省党部委员周学昌、24军驻西昌之军直属旅长刘元瑄为支团筹备处干事。筹备处骨干亦有变动:书记罗舜琴,第一组组长张勉庸,第二组组长张伯伦,第三组组长袁在予。

当时的西康交通不便,没有汽车运行,如由康、雅两属属县赴

西昌，一般需 10 日旅程，有的需 10 余日，不利于支团与康雅两属新建分团的工作联系。雅安是西康门户，省、军一级机关较多，刘文辉又常驻于此。因此 1942 年经中央团部批准，将原设西昌的支团筹备处迁移雅安苍坪山明道院址。

支团迁雅后，周学昌因叛国投敌当汉奸被免去支团干事，书记罗舜琴转任省政府民政厅社会科长。于是中央团部指派 24 军政治部主任丁国保为支团筹备处干事，魏进轩为筹备处书记，其下骨干再度调整：秘书康润，第一组组长李春恒，第二组组长胡泰华，第三组组长沈桃源，电台台长张声俊。

## （二）干部来源

支团仅在康属之康定、泸定两县以及宁属、雅属各县建立分团，县级组织不象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的县县遍设，所需工作人员不如省党部的多。除于 1942 年 9 月在西康省训团附设一青干班，调训分团股长和一般干部近 30 人，实行两个月的团务专业训练外，没有举办过团的干部训练班。其干部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原复兴社人员。如支团领导陈志明、张练庵、袁永馥以及兼职干事张敦品、丁国保、金传九、陈怀勋、李君果、徐渭璜等。

二是中央训练团青干班毕业生。如支团书记魏进轩、方采芹，组训组长张伯伦、胡泰华等均出身于中训团青干班，并与复兴社有历史渊源。

三是上述省训团青干班人员。如雅安分团股长穆联魁等。

四是以同乡、同学关系引荐。如支团监察会监察兼组长刘懋

椿,雅安分团书记刘懋松,芦山分团书记吕耀彬,泸定分团书记李培源等都是胡泰华以雅安同乡、高中同学或先后同学关系介绍入团并成为骨干的。其中刘懋椿、刘懋松还分别调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和青干班培训。

五是就地任用少数知识青年充任办事人员。

此外,延揽当地地位较高的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挂名分团领导,由书记负责。如雅安分团先后以雅安团管区司令余安全、省参议员李廷俊任筹备处主任,雅属区保安司令、省训团副教育长杨致中为干事长,德昌分团以省政府代主席、省党部代主任委员张为炯之弟张为煊(后任国大代表、省政府顾问)为筹备处主任等。利用这些人的地位扩大三青团的影响,以利开展工作和吸收团员。

### (三)代表大会

支团分别于1943年春和1946年夏在雅安苍坪山支团部召开了第一、第二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议题都是:听取和审议支团工作报告;选举支团干事会干事、监察会监察以及出席第一、二次全国团员代表大会代表。两次大会我都以雅安分团代表参加,亲历其事,并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受人利用,作了反对支团筹备处主任陈志明的“打手”。

#### 1、第一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

由陈志明主持召开,中央团部派干事会干事、中央军校政治部中将主任顾希平来雅监选。会中发生张练庵联合丁国保等攻击陈志明,意图取陈而代之以的权力冲突。

陈志明早年毕业于四川外语专门学校，投靠复兴社后，曾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往澳大利亚悉尼办报，从事新闻宣传。只到过澳洲，而陈却在其办公室的世界地图上题写：“廿年辛苦，十载壮游，相识四海，阅历五洲”的诗句，自我吹嘘，欺世盗名。知情者背地均称之为“妄人”。兼以陈与其爱人李希莹常闹家庭纠纷，有时甚至动武，将陈的手皮、脸皮抓破，有碍观瞻。陈爱好小提琴，但琴技平平，而在三青团组织的文娱晚会上，每到必演奏一曲，搏取与会者应付场面的掌声，缺乏自知之明。因此，形象欠佳，引起非议。更因少同驻雅之军政首要交往，人际关系不广而孤立于社会上层之外。

张练庵在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早年曾在雅安宁雅邛联合中学任教，三青团骨干胡泰华、刘懋椿、刘懋松、陈曜斗（时任汉源分团筹备处主任）都是张的学生；张又是康定分团的创始人，在支团和代表中有相当的潜在势力，且时任西康省军队特别党部书记长，主管全省保安、防空、军管区三个系统的党务；其堂兄张缉又是刘文辉联络地方人士的代表、刘拟定的省政府厅长人选；张得乃兄的疏通，同刘文辉及主持全省保安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王靖宇相处融洽；社会关系亦较陈志明广。鉴于陈的领导形象不佳，萌发取陈而代之野心，遂联合丁国保和部份代表企图利用选举机会将陈选掉，赶出西康。

陈是西康团务工作的开拓者，早在区团时期即已奠定其人事基础，扩大为支团后，权力随之上升，在团务骨干和出席代表中占有相当的此重。如支团书记魏进轩、秘书康润、组长李春恒、会理中

学校长蒋璧泽……等都是陈的忠实追随者。双方势均力敌，都难操在选举中击败对方的胜券。由于出席代表中的伍培英、金传九、兰悦忠……等持中立态度，双方的候选人都选，因而没有胜负，只不过得票率少于中立代表，使中立代表得票领先，坐收渔人之利。

选举揭晓后，张练庵、丁国保尤不甘心，立即搞了一个《清查帐目，以释群疑》临时动议案。因张、丁不便赤膊上阵，胡泰华、刘懋椿、刘懋松等都是团务专业人员，不敢与陈公开对立，乃由胡泰华用私情鼓动我和汪铎作此案的提案人。因胡、刘、刘、汪都是我的“拜把”弟兄，张、丁同我的关系亦好，丁还是我恋爱婚姻的挂名介绍人，便明知受人利用而感情用事，签名提出，在大会闭幕前通过。陈志明恼羞成怒，叫主管组长李春恒将帐据取出交其往主席台上一丢，并说：“请代表们严格审查，以明心迹。”即由大会主席团将帐据封存，交监察会审理。

因陈工作清廉，没有贪污，从经济上的查帐是搬不倒他的。而况监察会的审理有待时日。因此，张练庵、丁国保又鼓动我和汪铎率领 10 个出席代表走访以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署川康党务视察员的魏廷鹤，历数陈的不是，请其转呈中央团部将陈调离西康，避免因领导不得人而影响团务工作。魏处事圆滑，最初对我们慰勉有加，最后竟暗示我们不要受人利用，甚至说：“支团人选中央自有安排，诸位应以团结为重，维护团的声誉。”给我们泼冷水。使我们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为了阻止对陈志明的攻击，刘文辉约见我进行告诫：“人家青

年团的事你不要介入，以免引起你是受我指使的误会，陈志明固不足道，但康兆民（即康泽）是不能得罪的。”给我敲起警钟。

离开刘处后，我即去张、丁两家，转达刘的告诫，对陈志明事就此止步，请他们谅解。他们也未强人所难，并说了不少慰勉的话。一场闹剧就此谢幕。但丁国保因此而吃了苦果，遭到康泽的训斥和冷遇，训斥丁：勾结地方势力打击中央人员，丧失立场。其后，丁因私设秘密电台，被刘文辉派人抓获，免去 24 军政治部主任。去重庆找康泽，康竟不予理睬，使丁以一有才干的黄埔二期生仅得一军委会政治部少将部附的空头名义，不得不仍回雅安写完其《世界大同之道》一书并付印出版后离去。

大会选举陈志明、伍培英、张练庵 3 人为出席第一次全国团员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以上 3 人和金持九（24 军 136 师少将参谋长，康定分团筹备处主任）、兰悦忠（荣经中学校长，荣经分团筹备处主任）、刘元瑄（见前，未到会）、岭光电（彝族土司）、曹善群（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少将军务处长）、陈怀勋（24 军 137 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丁国保（见前）、李君果（24 军 136 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等为支团干事会干事，以陈志明任干事长。其下书记、秘书、组长仍旧。

选举骆美轮……等为支团监察会监察，以骆美轮任常务监察。因骆时任川康公路管理局局长，由中央团部增派苏元良为监察兼书记，主持监察会工作。监察会设两组：稽核组长余光汉，审查组长

刘懋椿。

## 2、第二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

1945年冬陈志明和支团书记聂情超去职。中央团部派袁永馥继任干事长,方采芹任书记,同年11月初,袁、方和秘书何蔚文来雅到职。次年夏在支团部召开第二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因袁是康泽的安岳同乡,曾任康之机要秘书,又是中央团部干事,来头不小;方早年在雅安宁雅邛中学读书时与胡泰华、刘懋椿同学,都是张练庵的学生,从而促进了张、胡等同袁永馥的合作共事关系。故在袁主持召开的代表大会中没有出现问题,顺利完成了预定议程。选出的代表、干事、监察是:

出席第二次全国团员代表大会代表:袁永馥、张练庵、伍培英。

干事:袁永馥、方采芹、伍培英、刘元瑄、岭光电、何蔚文、金传九、曹善群、胡泰华、沈桃源、徐渭璜(24军少将政工处长)、向理润(省教育厅长)、高上佑(省党部委员兼组训处长)、王孟周(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王惠琼(女、省立雅安女中校长)。推选袁永馥为干事长,其下之书记、秘书、组长,除由唐继如任第一组长兼电台台长外,余均连任。

监察:张练庵、苏元良、陈耀伦(24军少将副官长)、刘懋椿、余光汉。推选张练庵任常务监察。因张早已就任常务监察,其下专业人员未变,仅陈耀伦一人是新选出的,监察会可谓全部留任。

### (四)部分活动

#### (1)区、支团设西昌时期

- 举办高中、初中英语补习班，辅助学校教育之不足。
- 出版《西康青年》季刊 3 期，进行宣传鼓动。
- 举办音乐会，演出话剧，提倡正常娱乐。
- 成立抗战宣传队暨社会服务队，鼓动民众抗日。
- 配合乐西公路工程处督催宁属八县民工修筑乐西公路。

## (2) 支团迁雅以后

——继续编辑出版《西康青年》。每 3 个月发行 8 开本 1 册，作为支团的宣传刊物。

——协办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工作，并由胡泰华率领一批从军青年到泸州青年军 203 师入伍。

——协助雅安各界举办文化劳军，鼓励前方将士抗日杀敌。

——成立青年球队、青年歌咏队、青年京剧票社等。在其影响下，雅安相继出现了由各金融机构联合组成的银联球队，基督教浸礼会教友的友谊球队，《建康日报》的建康球队，24 军军训团的军训团球队，盐务局的盐务球队等。各队之间每星期日都有一、二场友谊赛。1943 年春雅安各界举办文化劳军，设置“文辉杯”兰球、足球锦标赛，驻名山之 24 军团长毛国懋亲自率领其铁血球队来雅参加。对推动雅安的文体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开办青年书店，出售青年读物。

袁永馥到雅后，改变陈志明只搞业务，不搞交际，孤芳自赏的作风。首先拜访驻雅的军政首要，拓宽交际领域，协调地方机关与支团的关系，不因支团是中央体系敬而远之，并低价购进已撤走的

美丰银行行址，作为支团团部，以利于各界人士同支团的联系，不因爬苍坪山而怯步。为了同刘文辉的侄儿、24军驻雅师长刘元琮搞好关系，缓解地方同中央的矛盾，主动在其住所宴请刘及其谋士、24军少将高参张孟韞和团长黄以仁，邀徐渭璜和我作陪，方采芹、何蔚文参加。投桃报李，刘亦在其公馆设宴回请。徐渭璜和我也盛宴捧场。此后并发展为每月一次的“转转会”，8人轮流作东，把酒言欢。有时还打扑克，搓麻将。由于袁永馥与刘元琮拉上了关系，同雅安的军政首要相处融洽，何蔚文10年前曾在雅安任过四川省第十七行政督察区禁烟专员，同雅安的军政人员有过交往，且善于交际。因此，袁在雅安的近两年中平安无事。后在成都、南京等地相遇，还设宴接待。

#### (五)分团人事

支团自1939年9月在西昌建立区团起，至1947年7月奉命撤销的8年中，先后在雅属之雅安、荃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6县及西康省训团，宁属之西昌、会理、德昌、越西、冕宁、盐源、盐边、宁南、昭觉9县及西康技专、甘相营、西昌学校，康属之康定、泸定两县建立了共21个分团筹备处或正式分团，各分团的主要人事(不全)是：

雅安分团：筹备处主任初为余安全，继为李廷俊；干事长杨致中之后为何蔚文；书记胡泰华后为刘懋松、闵敏。

荃经分团：筹备处主任兰悦忠，干事长谭君劬。

汉源分团：筹备处主任相继为李自伟、陈曜斗、聂情超，干事长

刘宇庄、康绍彬，书记李曙东、姚润之等。

天全分团：筹备处主任杨国治，干事长刘懋松，书记周则人。

芦山分团：筹备处主任祝寿，书记吕耀彬。

宝兴分团：筹备处主任陈曜斗。

西康省训团分团：筹备处主任张练庵，书记相继由胡泰华、沈桃源、余光汉兼任。

西昌分团：筹备处主任王隆映，后为康润，书记李春恒。

会理分团：筹备处主任周道兴。

德昌分团：筹备处主任张为煊，书记胡泰孝。

越西分团：筹备处主任沈桃源。

冕宁分团：筹备处主任谢云阁。

盐源分团：筹备处主任曹善禄。

盐边分团：筹备处主任张伯伦。

宁南分团：筹备处主任刘光寿。

大凉山分团：设昭觉。筹备处主任初为王隆映，后为李春恒。

西康技专分团：筹备处主任季福生。

甘相营（今喜德）分团：筹备处主任邓宇俊。

西昌学校分团：筹备处主任肖祖杰。

康定分团：筹备处主任张练庵，干事长金抟九，书记张铭传。

泸定分团：筹备处主任黄声高，书记李培源。

#### （六）党团合并

三青团成立后，以“三民主义先锋队”自居，只听命于蒋介石，

不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地方组织也不与当地的省、县党部配合，自行其事。有的分团因延揽当地知名人士担任领导，地位高于县党部书记长，致使县党部的影响逊色于团。如康定分团的负责人张练庵、金传九都是少将，雅安分团的领导余安全、杨致中都是司令等。党团关系极不协调。为缓和内部矛盾，加强反共力量，1947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团员一律登记为国民党员，各级团部的干事、监察一律转为国民党同级党部的执行委员、监察委员，领导骨干转任同级党部的对口副职，取消三青团名义。

支团接到通知后，随即转发下属各分团，并准备结束工作。按照上述规定，西康支团第二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选出的干事、监察均转任省党部的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袁永馥转任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副主任委员，方采芹转任执委会副书记长，何蔚文转任执委会秘书，唐继如、胡泰华、沈桃源分别转任执委会对口之秘书、组训、宣传3处的副处长，张练庵、苏元良转任省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余光汉、刘懋椿转任监委会监察兼科长（监委会不设处）。各地分团均按支团模式并入当地县党部。另在省党部执委会之下设立青年运动委员会，以方采芹为主任，张伯伦、胡泰华、刘懋椿等为委员，主管青年运动。

支团转入省党部人员中，袁永馥、唐继如、张练庵、刘懋椿等未去康定。其情况是：因省党部是由执行委员、省政府代主席张为炯代理主任委员。袁永馥以中央委员兼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反而不能

主持工作，屈居张下，听命于张，因而不去康定升职，赴成都租赁原天全县长李林的桂花巷公馆居住，另谋高就。唐继如去南京找老上级康泽，后任康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电台台长。张练庵在雅安任西康全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长及省银行副总经理。刘懋椿另有雅属区保安司令部总干事实职。其余人员于同年9月由方采芹率领徒步赴康定省党部报到。其中除何蔚文因是康泽的亲戚，早年又在雅安任过禁烟专员，由刘文辉任命为乾宁县长外，其余人员的处境欠佳。如方采芹在支团时除领书记薪水外，还有兼职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西康分会主任外快，到省党部后只有副书记长一份工资，收入减少，工作上还要受制于书记长戚彬如，其下的组训处长高上佑是省参议会代议长，宣传处长王孟周是省政府社会处长（后任省建设厅长），资历都比方深，人际关系尤为广阔，根本不把方放在眼里，处境非常尴尬。副书记长尚且如此，其他由支团并入省党部人员当可想见。到1949年省党部大裁员时，这些人更是首当其冲，无一幸免，只好各回原籍。

※ ※ ※

以上仅就个人“三亲”及参阅资料将西康党团勾一轮廓，以为引玉之砖，遗漏尚多，错误难免，敬希识者补充、批评，以免谬种流传、遗患后人。

1995年春于雅安

## 附 西康省军队特别党部简介

1939年元旦西康建省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即派复兴社中层骨干、西昌人张练庵到康定，在省政府保安处建立西康省保安团队特别党部，开展保安部队党务。张任上校书记长。约在1941年将省军管区司令部和省防空司令部党务机构并入，改为西康省军队特别党部，仍隶属中组部军队党务处。张练庵任少将书记长，党部由康定迁雅安新桥头。抗战胜利后，撤销防空司令部。1946年军队特别党部结束，更名为西康全省保安司令部新闻处，旋改为政工处，直至起义均由张练庵任少将处长。其后期人员有上校科长钱炯尧、罗炯，中校科长李永兴，上尉助理干事谢绪功等。其下属部份组织人事是：

军管区：原设政训科，上校科长杨露（字叔成，后任西昌县长）。并入军队特别党部后，改设总干事，上校总干事王仲柏（后任省田粮处副处长）。

雅安团管区党部中校总干事顾宗禄（现在台湾）。

军队特别党部撤销后，以上两部隶属关系不详。

雅属区保安司令部区党部中校（后升任上校）总干事刘懋椿，并兼三青团西康支团监察会组长，党团合并后，任省党部雅安办事处副处长。

宁属区保安司令部区党部中校总干事周英俊（后调省银行雅安分行）。





## 甘孜州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准印证号:川内证甘孜(97)字第2号

康定县印刷厂 印刷

开本 32开

1997年1月第一版

印数:1—1500册

